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1994-2 总第 123 期

学术研究 (双月刊) 1994年第二期 (总第123期)

刊名题字: 郭沫若

主编: 梁渭雄 副主编: 张硕城 刘斯翰

· 邓小平理论研究 ·

- 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与广东市场取向改革..... 梁 钊 (5)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哲学基础..... 彭立勋 (11)
新时期邓小平领导思想初探..... 张瑞枝 (16)

· 精神文明研究 ·

- 科学——精神文明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关飞进 (20)
弘扬传统美德, 再造精神优势..... 马中柱 (25)

· 哲学·文化·

- 文化建设话“务虚”..... 阮纪正 (30)
论认识的文化本性..... 吴家清 (36)
新儒家: 寻求中的价值重建..... 许 明 (42)
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 从宋明儒家到现代新儒家..... 周炽成 (48)
当代庄学与文化研究的“后现代”误区..... 陶东风 (52)
皮亚杰“活动”范畴的哲学评价..... 周 菲 (56)

· 经 济 ·

论资源配置经济学的方法论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普曼经济哲学述评..... 胡义成 (61)
中西方经济限制比较分析..... 王志华 (67)
区域市场理论再探..... 张可云 (70)
论健全市场中介组织..... 李保民 (76)
二元机制的失灵及其“非凸组合”之谜..... 邹东涛 (79)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潘嘉玮 (83)
信息产业独立为第四产业的现实意义..... 李俊华 (87)

编务主任：黄荣显

论再造特区优势..... 刘文韶 (90)

· 历史 ·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

论明朝对澳门实施的外贸税制..... 杨仁飞 (93)

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 骆宝善 (99)

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及其构成要素..... 张国仪 (106)

探索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深层结构

——读肖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 戢斗勇 (110)

· 文 学 ·

文学“下海”及其它

——与陈若曦笔谈..... [美] 戈云 (112)

略论台湾“文学文化化”的趋向..... 朱双一 (120)

中西小说的渊源与形成过程..... 饶芑子 (126)

论广东文学作品中的“南腔北调”现象..... 罗康宁叶国泉 (134)

试释《文赋》“怀霜”“临云”..... 吴承学 (139)

※

※

※

当代编辑主体的创造意识..... 张建平 (141)

· 学 术 动 态 ·

深圳“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研讨会”述要..... (144)

广东精神文明学会成立..... (145)

广东教育哲学研究会成立..... (145)

第四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在港举行..... (146)

ACADEMIC RESEARCH

No. 2, 1994

CONTENTS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f Market Economy and Guangdong's Market-oriented Reform.....	Liang zhao (5)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Deng's Theory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Peng Lixun (11)
A Trial Approach to Deng's Ideas of Leadership Raised in the New Period.....	Zhang Ruizhi (16)
Science as the First Motive Force for the Advance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Guan Feijin (20)
Enlarging the Traditional Virtue to Reestablish a Moral Superiority.....	Ma Zhongzhu (25)
On the Ideological Guidelines concerning Cultural Construction.....	Yuan Jizheng (30)
The Cultural Nature of Cognition.....	Wu Jiaqing (36)
Neo-Confucianism : a Type of Value Reconstruction Being Sought	Xu Ming (42)
The Moral Knowledge and the Knowledge from Seeing and Hearing : from the 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o the Current Confucianism.....	Zhou Chicheng (48)
A Misapprehended Field of Post-modernism Appearing in Recent Research up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pecially on Zhuangzi (369BC? ~286BC?)	Tao Dongfeng (52)
A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 on Piaget's Category of "Activity"	Zhou Fei (56)
On the Methodology of an Economics of Resource Distribution	Hu Yicheng (61)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Economic Restriction to the Western One.....	Wang Zhihua (67)
Another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Regional Market	Zhang Keyun (70)
The Need and Ways of Perfecting Those Medium Organizations of Market.....	Li Baomin (76)

Being-out-of-order Dualistic Mechanism and the Enigma of Its

“Non-protruding Combination” Zou Dongtao (79)

About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upon the Property Right

Syste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an Jiawei (83)

The Significance of an Independent Information

Industry as the Fourth Industry.....Li Junhua (87)

An Approach to Reestablishing An Advantage for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Liu Wenshao (90)

The Foreign-trade Tax Regulations Carried out upon Macao During

the Ming Dynasty.....Yang Renfei (93)

The Truth of Yuan Shikai (1859~1916) Himself's Voluntary

Surrender..... Luo Baoshan (99)

The System of Chinese National Cohesion and Its Main

Elements..... Zhang Guoyi (106)

A Comment on the Works “Chinese National Cohesion” by

Xiao Junhe..... Ji Douyong (110)

Literature, “Sailing at Sea” , and Others——A writing

conversation with Ms. Chen Ruoxi..... [US] Guo Yun (112)

About the Trend of “Literary Culturalization” in Taiwan

..... Zhu Shuangyi (120)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Fictions : Their

Origin and Forming Process..... Rao Pengzi (126)

The Phenomenon of a Mixed Accent Existing in Guangdong

Literary Works.....Luo Kangning and Ye Guoquan (134)

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与广东市场 取向改革

梁 钊

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个谈话已经过去了两年。这两年是实践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出历史性检验的，最有说服力的两年。这两年华大地发生了伟大的、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浪潮滚滚向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成了亿万群众的行动与心声。

从党的十四大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把基本理论原则具体化和系统化，制定出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蓝图，这是9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纲领。它标志着我国正在加快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回顾邓小平南巡谈话两周年，联系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发展的实际，特别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实践，进一步学习、探讨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深刻认识这一思想的巨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提高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自觉性是十分必要的。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经济特区建设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的重要的精神财富。

市场经济是否只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这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长期困扰着人们思想的重要问题。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曾经把市场经济，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看成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异己的东西。以后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尽管对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的客观存在及其作用，不得不予以承认，但总是处于被动的、不能理直气壮的、不得已的地位。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总是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通常只承认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邓小平同志以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革命胆略和理论勇气，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时代的高度、历史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最杰出的、具有突破性的新贡献。

对于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一思想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逐步深化的；另一种意见认为邓小平市场经济的思想早就形成了，他从1979年提出这一观点之后，一直坚持这个认识，考虑到这是一个重大的思想理论上的转变，为了让全党在实践中去证明，让人们通过实践去总结和提高，没有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全党。我不赞成把两种意见对立起来，其实这两种意见，是完全可以一致起来的。

首先，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战略家，他非常熟悉历史发展的过程，时刻关注着人民的利益，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洞察时代的风云变幻，预见未来的发展。

他早在1979年10月26日，会见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总编辑的谈话时，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方法，基本上与资本主义的方式相似，但也有不同，这有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归根结蒂是社会主义的。”

这时，虽然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但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实际上都没有展开。那么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能够在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异己的时候，能够超前地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呢？这是因为他最早最深刻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痛感“以阶级斗争为纲”，长期闭关锁国，实行一套高度集中的传统僵化体制，造成了对生产力的破坏，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造成了运行机制失灵，丧失激励功能，效率低下，国有企业亏损，使本应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失去了活力。

邓小平同志指出：从1958年至1978年，耽误了整整20年，根本问题出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真正搞清楚。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正是在我们耽误了的这20年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某些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依靠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依靠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完备的法制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实行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任务”。要实现这一任务，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经济之大鹏要腾飞，必须借助改革、开放这两翼。

1979年4月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为突破长期闭关锁国的格局，在听取当时广东领导同志的汇报时提出了试办特区的设想，他指出：“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特区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必须实行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相对接，所以特区的经济发展，一开始就明确地提出了要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指导思想。

同时，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与毛泽东一样，十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

神，将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正确地估计领袖在群众中的作用。他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内，都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是从深刻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冷静思考中形成的。

十多年来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检验，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检验，证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十多年来，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而且不断地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

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在非常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在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同时，坚决地、全面地、深思熟虑地把他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郑重地向全党提了出来，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充实、丰富和完备。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进了党的纲领。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于这个理论，我认为需要着重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完整地、全面地、准确地去把握和理解。

首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要发展生产力，就要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需要发展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也要发展生产力。正是从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出发，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8页）

其次，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实现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总是认为市场经济同公有制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虽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但同时还认为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可见，当时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观点，还未成为全党的共识，经过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373页）直到党的十四大，这些重要思想，才形成了全党的共识。

再次，计划、市场都是方法，都是经济手段。计划、计划经济、计划调节；市场、市场经济、市场调节是两对涵义相近的，密切联系的概念。作为理论研究探讨，可以把经济体制与

方法手段加以区分。但实际工作中，在从资源配置的方式上运用这两对概念时，就难于严格区分了。邓小平同志在他的多次论述中，就是从实际出发运用这两对概念的。他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他又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笔者认为，这里讲的结合，是指方法而不是体制。“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7页）为此，我们切不可只从概念出发，固守在陈旧的教条与概念之中，拘泥于从概念上兜圈子，如果那样，就容易脱离实际，无法解放思想。

广东改革开放搞了一场最大的试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路的试验。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广东实行了**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最早举办**经济特区**，实行综合改革试验，也就是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最重要的是受现代市场经济的影响比较早，比较广泛，比较深入。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实质上就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先走了一步。

经济特区作为改革的试验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逐步实行从内向到外向转变，实际上就是试行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邓小平同志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深圳就是在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出一条新路来的。

早在1980年，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就提出了“对外要更加开放，对内要更加放宽，对下要更加放权”的口号。这个口号以后成了广东历届领导干部的座右铭。这个口号的实质也就是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大胆地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因为对外更加开放，就是向现代市场经济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这是为了要改变高度集权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只有放宽、放权才能够坚持市场取向改革，走市场经济之路。

广东把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概括为“放得开，搞得活，上得快”，其核心就是要大胆地“放开市场、放开价格、搞活流通”。在市场取向改革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取得成功，改革不断地推进，不断地深化，每一步都围绕着把农民推向市场。在80年代前期，主要是依靠放宽政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给农民真正的自主权和直接的经济利益，为使广大农民进入市场打下了基础。相继而来的是，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广东乡镇企业的兴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在改革中保留了集体经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这些保留下来的集体经济，很快出现了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二是乡镇企业的兴起，一开始就面向市场，接受市场的考验，敢于闯荡国际市场，初步建立起比较灵活的市场运行机制。再就是开发性农业的发展，以及“三高农业”（高产、高质、高效）兴起，从更广阔的天地，推动农民进入市场。在不断扩大农产品出口创汇的同时，又掀起了“南果北运”、“南菜北运”、“南鱼北运”、“南药北运”的新高潮。优质农产品、水产品的生产，迅速得到推广，花、鸟、虫、鱼、珍禽异兽，都成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经营范围，使广大农村尽快实现了脱贫致富。农村的股份合作制经过几年的试点，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的经验，正在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形式，多元化的普及和推广，为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开拓了新的道路。

——流通体制改革，价格改革的配套进行，放开市场和放开价格，搞活流通的结果，使

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广东最早改革流通体制，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市、县、乡镇、村、户“五个轮子一齐转”，大胆地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率先提出“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各类专业市场的兴起有如雨后春笋，资金融通加快，大市场、大流通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价格改革，坚持以市场形成价格机制为主的指导思想，实行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调、管并举，看准时机，分步到位的做法，价格改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市场商品供应充裕，适应不同层次消费的商品琳琅满目，价格也相对平稳，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商品凭票定量供应的短缺经济的旧格局，而且保证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基本上实现了良性循环。

——投资体制改革，大胆地运用市场机制，率先实行了负债建设的新路子，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单纯依赖国家拨款的状况。改国家投资为社会集资，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多渠道筹集资金。1980年至1992年全省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56.36亿元，年平均递增30%以上，其中正式国家拨款还不到5%。实行了投入有产出，“以电养电”、“以桥养桥”、“以路养路”、“以通讯养通讯”使广东的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有的几年超过几十年，有的甚至大大超过了历史发展的总和。广东投资体制改革成功，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全国提供了经验，使参观考察者为之瞩目。

——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多功能的对外开放格局，投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广东的外向型经济经历了10多年的改革开放，正从低层次向较高的层次跃进。从“满天星斗，遍地开花”，以“三来一补”为主的乡镇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跃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型产业向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产业跃进。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信息业、旅游业以及高新科技产业有了新的发展。新的外向型经济结构逐步形成，已具备了大开放全方位进入国际市场的条件。

——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更新了观念。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坚持市场取向改革，这是全新的事业，在敢闯、敢“冒”、敢于试验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开拓创新，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训练了干部，培养了人才，这是最可宝贵的财富。在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中观念不断更新，人的素质、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广东人民“团结、求实、开拓”精神，受到了普遍赞扬，开放观念、市场观念、时效观念，竞争意识、拼搏意识，重视人才、科技、信息的意识有了很大增强。这对于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发展步伐，都将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市场取向的改革，给广东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强，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特区持续、稳步、高速、高效发展，引起世人的瞩目，广东从原来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省份逐步跃上了全国的前列。1992年，广东的社会总产值、农业产值、工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外贸出口、实际利用外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分别比1980年增长690.7%、234%、10063.6%、458.1%、431.2%、349.4%、616.9%、880.9%、4865.1%、774.4%、840.1%、2271.5%，在全国各省市区的排名中均居第一位。

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佛山市，1993年工农业总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达到了749亿元，比1992年净增175亿元，增幅为30%；国内生产总值按现行价为321亿

元，比1992年增长29.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万元，上了一个新台阶。

广东15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伟大成果，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证明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和特区建设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具有说服力地说明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威力，说明了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为什么广东能够坚定地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从不动摇，一而贯之呢？原因就在于：

第一，广东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受现代市场经济的影响较早、较广、较深，有利于学习借鉴现代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包括经济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有利于利用国际的技术和资金。

第二，因为广东经济落后，建国以来由于地处国防、海防前线，国家投资很少，1980年以前按人口平均拥有的固定资产和城乡人均收入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纳入国家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大大低于别的地方，受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也比较少。因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第三，有中央、国务院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行综合改革试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第四，在试验中，始终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敢闯、敢“冒”、敢为天下先，比较注意总结经验，较好地发挥了“团结、务实、开拓”精神，在风风雨雨面前，埋头苦干，多干少说。较好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不搞“姓社”、“姓资”的争论，“拿事实来说话”。不争论并不是不搞理论的研究和探讨，而是努力把研究探讨置于现实之中，坚持理论同实际相结合。1988年广东就曾密切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开展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规模比较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双月研究会，提出了不少有开拓性的见解，对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提供了咨询和决策的依据。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是让事实来说话，用“三个有利于”来衡量，有利于避免用大帽子吓唬人，避免“左”和右的错误。

广东坚持市场取向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仅仅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又把这一目标具体化，制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为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全面贯彻党中央的决策，继续发扬团结、务实精神，敢闯、敢“冒”、开拓进取的精神，加大改革力度，加快体制转换，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再造广东的新优势，使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掌握有利时机，加快发展步伐，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实现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郑英隆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哲学基础

彭立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项新的重大的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这一理论在市场经济问题上实现了三个突破和三个创新：一是突破了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手段，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观点；二是突破了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做出了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矛盾的论断；三是突破了把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对立起来传统观点，阐明了计划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才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小平同志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于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判断和结论，从而引导人们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不断摆脱陈旧观念的禁锢，使我们党随着改革的深入在思想认识上完成一次又一次的飞跃，终于在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过程，就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真理观的过程。

深入研究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哲学基础，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这一理论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提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自觉性，具有重要意义。

生产力标准：理论基点

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基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即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发展要求），是在任何社会都起作用的普遍的客观规律。生产力标准就是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这一客观规律而提出来的，是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具体运用。它要求我们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是非的根本标准。

长期以来，人们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看成是互相矛盾的、对立的，把市场经济拒之于大门之外，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不是生产力标准，而是某些抽象原则，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不符合实际的传统观点的束缚。小平同志则恰恰相反，他把解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问题的关键归结到怎样“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点上来。在回答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的关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的提问时，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

明，在某种意义上，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这是明显地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作为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

生产力标准，是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的必然结果。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扭曲的和错误的理解，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必须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他一再阐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他又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最新概括，确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相应地把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小平同志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这就破除了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得到深层次的理论突破。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一方面使人们彻底摆脱了把计划经济等并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手段、方法当作社会主义来固守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也使人们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作为观察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认识上的新飞跃。

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是社会大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它又有力地推动着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归结为“社会分工制度”，并指出了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利用了市场经济这种社会化大生产形式。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但由于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长期受到抑制，严重影响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大量事实表明，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它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价格的涨落，引导生产和消费，调节社会资源的流向，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能创造最好效益的环节去，从而促进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发展。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这一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确立这种认识，将会增强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前进的自觉性。

市场经济的一般与特殊

如何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讨论中长久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正确理解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能用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代替其一般性，也不能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代替其特殊性，否则就会导致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在市场经济理论认识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死胡同。

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误解，许多人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表现，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种误解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形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就是用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代替了市场经济的一般性。所谓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就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手段所具有的共性和一般规律，如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价格信号、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等等。所

谓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就是市场经济由于不同社会条件的差别、由于和不同的社会制度相结合而形成的个性和特殊规律。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一般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但个性和特殊性又不等于共性和一般性。如果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并与私有财产制度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等同或代替市场经济的一般性，那便会导致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错误观念，就会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针对这种长期形成的错误认识，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里明确指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经济手段，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 and 手段，市场经济本身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它既可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结合，为资本主义所运用；也可以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结合，为社会主义所运用。所以，把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当作市场经济一般性，显然是形而上学的、不符合实际的。小平同志的精辟论断，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传统观念，诊治了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恐资病”，启发人们从资源配置这一基本经济学观点的角度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进行全新的思考。这无疑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

从另一方面看，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又是通过其特殊性而体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有机结合，它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而在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特殊性。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一个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就是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结构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两个根本特征，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有可能自觉地从社会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相结合出发，更有效地实行宏观调控和市场作用的有机结合；有可能用使用价值最大化的经济运行规律来取代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运行规律，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集中表现在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结合这个核心问题上。早在1979年，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时，就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这是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这里强调提出的就是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这是至今仍然需要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革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实现形式。传统的国有制产权形式是以一元所有为特征的，国家是国有资产的唯一所有权主体。这种产权形式使市场经济所遵循的价值规律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生长不出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主体。所以，它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是矛盾的，是不能和市场经济结合为一体的。为此，必须在不改变公有制性质的前提下，将一元的国有产权形式改革成多元的公有产权形式，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离；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分离，并通过法人财产权的确立，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可以说，产权形式的改革是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企业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一个关键。如果这个深层次的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就不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

务就不能完成。这也是我们在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性和特殊性统一时必须着重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宏观调控和市场作用的辩证统一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碰到的关键问题。针对把计划和市场看成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机械观点,邓小平同志反复重申,应当把计划和市场两种方法和手段结合起来。他说:“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又说“计划和市场都得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对于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如何同时抓好宏观调控体系 and 市场体系两大主要环节的建设,正确处理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两者的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作用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市场是基础,国家宏观调控是指导。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运行,国家宏观调控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之上,通过两者的结合,达到优势互补,更好地使市场经济实现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目的。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其根本特点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这种经济运行方式的实质,是以市场运行为中心环节来构架经济流程,用价格信号调节社会生产、协调供需关系,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进行资源配置,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运行方式中,基本调节者只能是市场,必须充分发挥包括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等在内的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由于我国是从高度集中、排斥市场作用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以首先应当在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此,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完整的市场体系,尤其要重点发展生产要素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同时,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从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基础性作用。

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也要防止无限夸大市场作用的“市场万能论”的片面性观点。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消极一面,而且某些宏观经济总量的确定和控制,也不是市场自身力所能及的,或不是市场力量能单独决定的。为了弥补和克服市场的弱点和不足,就需要由国家对市场活动进行宏观指导和调控。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的情况看,20世纪后,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已越来越显示出其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市场有所不能和多有缺陷已为社会所公认。因而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不能不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并在“市场失灵”的方面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一些富有见识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从现代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主张把市场和计划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可以说,国家对市场经济有目的、有计划的宏观调控和指导,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一种现代市场经济,它本身就是包括了有计划的宏观调控这个重要方面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也更有条件建立和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通过对经济进行总量管理和优化,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平稳、有效的运行。因此,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

为了使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这两个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做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实现有效的结合,必须使宏观调控建立在市场作用的基础上,自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对市场进行引导和调控,而不是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计划调控的老路上去。邓小平同志指出,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价值规律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不仅体现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中,也应贯穿于国家宏观调控中,正是通过共同遵循价值规律,计划和市场、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二者在市场经济体制内找到了契合点。国家宏观调控虽有利于减少市场本身缺陷,但也可能由于计划调控失误或宏观调控力度不当而形成新的问题。因此,深入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的规律,力求以适合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宏观调控,使之与市场作用相协同,是改善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中需认真解决的一个问题。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的发挥必须通过市场,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触及人们切身的物质利益,从而调节生产和流通,因而自觉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社会再生产,就必须将国家宏观调控手段从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建立起包括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政策等在内的间接调控体系。只有这种宏观调控体系,才能对市场有效配置资源起到保证和促进作用,从而真正实现计划和市场的辩证统一和有效结合。

依靠实践、尊重实践：思想基石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曾经称赞这个文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并指出文件好就好在“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些意见,当然不应只看作是对一个具体文件的评价,而应当看作是指明了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时,必须遵循的一个思想原则、思想方法。这就是要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把市场经济的共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性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里,是无法找到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存答案的。因此,只能坚持从实践出发,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并形成新的理论。小平同志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这是十几年改革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是靠实践,还靠本本;是从实践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是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靠实践,从实践出发,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思想路线;靠本本,从本本出发,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思想路线。回顾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前,我国经济理论领域关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关系的争论,如果从哲学基础上看,实际上是一个从实践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的思想和认识路线的分歧。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依靠实践,尊重实践,敢于破除马克思主义书本中那些不符合客观实际发展的结论,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表现出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这也是我们在继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探索中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不能靠本本,也不能靠世界上现有的市场经济模式。现代市场经济有各种各样的模式,如美英式市场经济、亚太式的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

新时期邓小平领导思想初探

张瑞枝

新时期邓小平领导思想,即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领导我国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关领导实质、领导决策、领导方法、领导体制、领导素养等方面的科学思想。

1、领导就是服务——领导实质观。

领导是什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解释。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这是对无产阶级领导本质最简单最明确的揭示和规定。在邓小平同志看来,领导者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群众利益的执行者,是被领导者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而不是群众的统治者。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对我们队伍中存在的特权现象提出了批评:“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①他认为要克服这一现象,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解决思想问题就是要通过教育,使广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领导就是服务”就是要求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好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搞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服务工作。

经济等等。这些模式,有的比较有效,有的不那么有效,有的可能还有比较大的缺陷。我们需要对这些经济模式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吸收和借鉴其中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验和方法,以便更好地运用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是,对于这些经济模式也不能完全照搬,而仍然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将那些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验、方法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总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现成模式,只能坚持从实践出发的思想认识路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依靠实践来解决一些前人未曾解决过的问题,不断开拓前进。尽管我国十几年的改革实践已取得相当丰富的经验,理论认识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在全党全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不很久,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仍然需要通过实践不断加深认识;对于深化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仍然需要通过实践来寻求新答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是由于牢牢建立在依靠实践、尊重实践的思想基石上,所以它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前进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作者单位: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石成

2、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领导决策观。

务实是邓小平同志的领导风格，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则是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决策观，也是他的领导思想的根本内容。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曾犯过“左”和右的错误，给革命和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左”和右的错误，从思想认识根源和领导决策上讲，都是主观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反，“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②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指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根本方法，它的精髓、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他谆谆告诫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③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郑重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④由于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于是，便有了一系列重大的正确的决策：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提出改革开放方针，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

在实际中，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具体工作到总体目标，从来不是先制定一套系统完整的理论和具体模式，然后领导全党付诸实施。而是在确定前进的方向、目标和基本路线的前提下，尊重群众创造精神，总结实践经验，概括理论，推广成功做法。比如，农村中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只是个别省份少数地方搞起来，而且还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批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总结群众的伟大创造，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并以中央文件肯定下来，在全国推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在全国农村迅速展开，取得巨大成功，大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力。尔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对外开放由沿海地区不断向内地推进等重大举措，都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而决策实施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几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功归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所作的重大决策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⑤

3、解放思想，敢闯敢“冒”——领导方法观。

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领导决策观相联系，邓小平同志的领导方法观就是解放思想，敢闯敢“冒”。

解放思想就是不受“本本”束缚，敢闯敢“冒”，敢于试验，大胆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前人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照。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根据中国国情，去实践，去探索，去总结，从而创造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具体模式。1978年，邓小平同志严肃批评党内存

在的思想僵化的本本主义。他说：“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⑤他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⑦他希望各级党委“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⑧三中全会以来十多年，我们党就是遵循邓小平提出的大胆试验、勇于探索的原则，成功地实行对外开放，进行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开创了我国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但我们有些同志仍然怕这怕那，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不敢“冒”。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反复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⑨当然，解放思想，敢闯敢“冒”，并不是胡思乱想，盲目蛮干。这一要坚持实事求是，注意科学性。二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同志说：“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⑩如何才算“看准了”？他明确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⑪这不仅为改革成败提供了一个判断标准，同时也为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的试验，提供了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可以大胆地试验，大胆地探索。成功的就总结推广，失败的则吸取教训，改正后继续放胆大干。

4、靠制度治党理国兴业——领导体制观。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保证。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性，最根本的是要有好的领导制度，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

我国的领导体制，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的，是在大规模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起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政治体制的影响，受到我国传统封建主义的影响，因而它存在许多弊端和不完善的地方。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了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进而深刻总结了我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不完善所造成损失的历史经验教训。他认为，过去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所发生的各种错误，领导者个人有一定责任，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好领导制度问题。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⑫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必须改革不完善的领导制度。搞现代化建设，发展商品经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更需要改革和建立一套好的领导制度作保证。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和设计下，我们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了改革。例如，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实行领导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实行干部“四

化”方针，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邓小平同志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以实际行动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

5、干部“四化”方针——领导素养观。

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处于主导地位，领导成员的素养高低、作风好坏，构成是否合理，对于领导活动的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具备什么样的素养，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根据新时期党的任务，坚持和发展了干部“德才兼备”原则，逐步形成和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干部“四化”的思想。他明确指出选拔干部，首先要考虑政治条件。他说：“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⑬同时，他又指出：“做四个现代化的闯将，没有专业知识是不行的，没有干劲是不行的，没有精力是不行的。”^⑭后来，他明确提出了干部“四化”的概念：“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⑮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干部“四化”方针写入了党章，用党的根本大法肯定下来。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又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⑯这就高度概括了新时期干部必备素养的各个方面，使我党的干部路线进一步具体化了，更加科学和全面了。三中全会后十几年来，我们党坚持干部“四化”方针，选拔、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勃勃生机。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干部“四化”方针是正确的。

①④⑥⑫⑬⑭⑮《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2、372、132、293、141、194、320页

②③⑤⑦⑧《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3页

⑨⑩⑪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380页

作者单位：广西社科联

责任编辑：冯 生

科学——精神文明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关 飞 进

科学对精神文明的作用深刻而广泛，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直接作用是指科学直接对精神文明系统或要素所起的作用；间接作用是指科学通过中介作用于精神文明系统或要素。宏观作用是指科学对精神文明的整体或层面的作用，微观作用是指科学对精神文明系统中单个要素的作用。本文探讨科学对精神文明的作用重点放在整体效应上。

1、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为精神文明创造物质基础，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有力杠杆”，从而决定精神文明的水平。

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里面包括科学在内。”自然科学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①邓小平同志更深刻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作为生产力，是由于其渗透到生产力诸要素中去的结果，是人类求知活动的体现：一是通过学习和教育的途径，使科学为劳动者所掌握，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在生产中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二是通过技术发明的途径，使自然科学物化于劳动资料中，创造出新的生产工具。三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应用不仅使越来越多的自然物纳入劳动对象的范围，而且还创造出自然界未曾有过的新的劳动对象。四是现代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成为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曾举例说：1700年英国的科学技术造成生产率与手工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是4：1；1840年变成108：1；到了20世纪，大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中有5%—20%是靠采用新技术所取得的；到了70年代，这个比例则上升到60%—80%。可见，科学在生产力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恩格斯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②在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总是导致社会经济关系的相应变化，产生社会革命。马克思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现。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③蒸汽机的发明亦是如此，它把手工业变成了机器大工业，大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要高得多。蒸汽机的使用，摧毁了旧有的封建手工业行会和他赖以生存的手段，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④“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⑤19世纪法拉第一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建立，产生了电动机和发

电机，引起了工业电气化，即第二次浪潮。自然科学使电代替了蒸汽成为一种更大的革命力量把社会进一步推向前进。第三次浪潮始于本世纪初，由于相对论、原子核物理和量子论的创立，为现代科学技术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航空航天为主要标志的新工业体系，出现了一系列新兴的工业部门，促使工农业生产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和社会格局。

马克思又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⑥这就告诉我们，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生产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必须有客观的物质基础；物质文明制约着精神文明的程度及其发展速度与趋向，没有发达的物质文明，就不可能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在物质文明相当低下的情况下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现代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也表明：科学为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提供了纸张、印刷机、校舍、图书馆、博物馆、试验室、剧院、电影院以及其他文化娱乐场所等物质条件和设施，通过各种先进的信息传播系统把各种新思想、新发现、新观念迅速地传播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

2、科学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摆脱愚昧、取得自由的强大的思想启蒙武器。

科学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和认识活动，其目的在于揭示自然的真相和规律，破除迷信，摆脱愚昧。科学的本性是追求普遍的真理，提倡大胆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尊重个人的理性选择，主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鼓励而不是压制不同意见，提倡自由争论，乐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那怕推翻象牛顿力学的绝对时空观这样的大厦也在所不惜。因此，科学从一开始就成为同迷信和愚昧作斗争的锐利武器。科学实验作为一种高度精确化和能动性的实践活动，磨砺了实践者的智慧和理性，使他们首先接受往往被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视为大逆不道和荒谬绝伦的科学真理。科学的理性之光使人们勇敢地冲破各种教条和传统的束缚，为追求真理而奋斗献身，它使人们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美德，扫荡一切愚昧无知的落后意识。可以说，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同迷信愚昧斗争的结果，都是反对迷信和愚昧的胜利的纪录。

在欧洲中世纪，神学高于一切，教会把《圣经》奉为唯一的和绝对的真理，哲学和自然科学只是教会恭顺的婢女。但是，随日心说、血液循环等科学的兴起，自然科学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了，并且撼动了根深蒂固的一系列人类文化思想观念。人们惊异地发现，除了所谓宗教真理之外，还有可以用观察和实验来检验的科学真理。这无疑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从此，人们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改变了，服从上帝逐步让步于服从科学。

在我国近代史上，西方科学的引进和宣传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19世纪末，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对国民的文化启蒙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迅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大思潮。不少进步的知识分子，例如鲁迅，就把进化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战斗武器给封建主义以沉重打击。“五四”时期，“德”、“赛”先生更成了进步的旗帜，科学作为民主的同盟军吹响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曲，在反封建迷信，治疗人们思想上“祖传老病”，改造麻木的“国民性”上，自然科学理论发挥了重要的战斗作用。

当然，迷信和愚昧是不会“绝种”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科学文化很落后，不仅有人相信鬼神，而且有人迷信权威、迷信书本，甚至有人把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一些全人类共有的精神文明成果当作异端邪说，斥之为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表现出极端的愚昧无知。这种迷信和愚昧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严重障碍。要解决这一

问题，发展科学文化是最有效的途径。

3、科学进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提高人们的智力水平，促使思想科学化，从而提高人类的精神文明水平。

人们的思维方式，在精神文明中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没有科学的认识论，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人们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科学史上看，科学上每一个重大突破，都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提高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推动一系列社会及整个精神文明大系统的变革，把人类的精神文明推上一个新高峰。在科学还处在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阶段，人们获得的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变化和发展，“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成，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①这必然产生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8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的科学变成整理材料的科学，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说明天体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从而打开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第一个缺口。赖尔的地质渐变理论，第一次论证了地貌的演化，粉碎了居维叶的突变论，打开了形而上学的第二个缺口。接着出现了以三大发现为中心的一系列重大成就。这些新发现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辩证发展的性质，“新的自然观的基本观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熔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②辩证的思维方法代替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无论在深度广度上，还是在速度和规模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海森堡、薛定谔等人创立的量子力学，贝塔朗菲的控制论，申农的信息论，维纳的控制论，生物学的选择决定论等等新兴学科的兴起和发展，进一步揭示了自然界发展的更为深刻的辩证图景，促使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总崩溃，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更深刻全面的辩证思维方法，对人类的精神文明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

4、科学带来了民主，促进了政治文明。

民主是表达和实现最大多数劳动者的意愿、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一整套社会组织结构、科学程序和法律保证，是现代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既是人们的理想信仰，又是一种社会道德、社会意识，以至是一种生活方式。科学对民主的作用主要是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科学本质是民主的。科学的本质是真、善、美的高度统一，它主张学术自由、追求真理，与独断、专制是格格不入的。

——科学是民主的基础。民主是社会化大生产兴起的要求和产物。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它提供了基本条件，没有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没有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没有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各种信息技术等等，民主也就无法实现。

——民主的目标需要科学的机制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有自己一套系统结构、科学程序和法律保证，但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科学之上的。设计和实施一套系统结构、科学程序和法律保证，本身就是一项大而极其复杂的科学研究任务，所以，没有科学就是没有民主。

5、科学使人类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现代化、文明化。

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也是精神文明的一个内容，它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而正是科学的发展与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提高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水

平。原始时代，科学水平极低，人们只能采用集体的生活生产方式，以维持温饱。发明铁器之后，人们从事分散的农业的一家一户的封建的生产生活方式。近代科学发展出现了蒸汽机，才出现了大工业生产，才产生了工厂式的严密劳动组织和集中的生产方式，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一是工业自动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缩短了直接劳动时间。许多国家都改变了工作制，增加人们的休息娱乐时间。二是办公室自动化，提高了管理人员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效率。三是家庭自动化，各种高新科技产品，如电视、电冰箱、洗衣机、程控和移动电话、录像机、微电脑等大量进入普通家庭，给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交往方式、娱乐方式等以深刻的影响。总之，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的一切活动、日常生活，从时空观念到价值观念，以致工作、家庭、人际关系、社会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等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更有利于人的潜能的发挥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6、科学是人类道德进步的基础和动力。

表面看来，科学和道德并不同步发展，甚至会发生背离。有些科学文化水平很高的国家和个人，道德水平并不高，反之，科学文化低而道德水平不低的国家和个人也不少见。但这并不能证明科学的发展必然会带来道德的堕落，因为这些现象并不反映科学与道德的本质联系。从本质的意义上说，道德与科学是一致的，低下的道德与愚昧是一致的，科学的进步必然会带来道德的进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道德与科学的背离，不是由科学本身造成的。道德作为一种结果，是多种原因的结果，它不仅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有关，而且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等都有联系。道德水平的高低，是这些原因“合力”的结果。如果单就科学与道德的关系来看，两者本质上是相互促进的，科学的发展是人类道德进步的推动力量，进步的道德是科学发展的精神条件。马克思指出：“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⑨我国古代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也很多。如“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智者，德之帅也”、“学明而后德显也”，欧洲古代则有“美德就是知识”等等。这些论述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要有道德就必须有知识，而知识当然包括了科学知识。科学对道德的进步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科学通过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引起社会革命，从而促使新的道德规范和新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恩格斯说：“**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⑩在中世纪，科学同宗教神学展开了一场尖锐而持久的斗争，有力地变革了《圣经》至上的传统观念，出现了崇尚科学、崇尚理性的时代风尚。今天，当代科学技术正在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它必然冲击陈腐的道德观念，促使新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安于现状、墨守陈规的传统观念被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革命精神所取代；“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人们的价值尺度，行为方式都在发展变化，特别是人体科学上的突破，更加直接地引起了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化。例如试管婴儿、遗传工程、器官移植等学科的新成果的应用，就强烈地冲破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打破了千百年来形成的“命由天定”、“多子多福”的传统道德观念，为人类优生优育提供了福音。

其次，一定的科学知识是坚定道德信念的前提，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基础。要使人们对某种道德有坚定信念，就必须对其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就拿共产主义信念来讲，如果一个人

缺乏对社会发展史的科学知识，对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没有深刻的科学知识，他的共产主义理想肯定不会牢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研究，也能使人们认识个人在物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促使崇高的伦理价值的形成。总而言之，只有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真正谈得上有理想、有道德。

7、科学推动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发展和传播有赖于科学的进步。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伟大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的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观念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然而，正是具体科学的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和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充分依据了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达到的最高成就，主要是德国的古典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摩尔根的社会学、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赖尔的地质渐变理论、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等等。这些科学成果为人们描绘出世界运动和发展的辩证图景，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总结和概括了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列宁曾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都必然需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地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中吸取营养，才能保持勃勃生机。在当代，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横断科学、边缘科学、综合科学等的产生和发展，使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革命。这些，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证据，同时又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良好的科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的前进中必将日益丰富和发展。

此外，科学的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几十年前，人们还只能通过书刊报纸接受革命理论，而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广播影视已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力工具，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科学是精神文明的内核、基础和生命线，它不但渗透到精神文明系统的诸要素和层面中去发挥作用，而且对整个精神文明系统会产生多方面的巨大的积极的整体效应。如果把精神文明比作一座大厦，那么它的基础就是科学。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精神文明史本质上就是科学的发展史。

诚然，科学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会给人类精神文明带来一些“副作用”，例如科学的发达造成的生态失衡、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还会给人们的道德、观念、思想、心理带来新的不适应，使人性受到改进的同时又受到破坏，给人们带来孤独、压抑、苦闷和焦虑。但这些“副作用”不是科学的主流，科学永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动动力，不仅是物质文明进步的“第一生产力”，而且也是精神文明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①③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6页、第67页。

②⑦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页、第448页、第453—45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弘扬传统美德，再造精神优势

马中柱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很注重发展道德文化，讲究道德自觉和自律，使古代中国以文明礼义之邦闻名于世。今天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于树立良好道德风尚，克服各种腐朽思想影响，抵制腐败现象的滋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都具有重大意义，也是我们在加速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中，再造精神优势所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一项宏伟工程。《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对道德建设的内容作了全面规定，并强调指出：

“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人类文明中道德发展的新境界，它必然要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良道德传统，并要同各种腐朽思想道德作斗争。”在人类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中，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是一个极为丰富的思想宝库。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可以从这个宝库中找到自己的思想渊源；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再造新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也可以从这个宝库中找到必要的思想资料和表达方式。

过去“左”的思想以为传统道德是封建时代的东西，只能为剥削阶级服务，因此应该一概予以否定和拒斥。当然，传统道德有其特殊的阶级内容，像中国古代集中阐述人伦道德的儒家思想，无疑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调和阶级对立的。儒家宣扬的“君为臣纲”的“君臣之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说教，以及那些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礼仪等，我们当然要给以批判和否定，扫除封建遗毒。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能不反映人类社会的一些共同性的关系、利益和愿望。恩格斯谈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并列存在着“基督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页、第82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52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61页

主要参考文献：

- 1、李权时主编《论精神文明建设》红旗出版社1981年版
- 2、范英主编《精神文明学论纲》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 3、张汉青主编《精神文明学》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冯生

教的封建主义道德”、“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无产阶级未来的道德”以后，接着指出：“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①这些道德论中的“共同的东西”或许多“共同之处”，反映在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上有些是“互相一致”的；表现在道德的形成和保持上有些带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像儒家宣扬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步思想，主张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献身的整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要求建立仁爱、诚信、礼让、谦和的人际关系，强调道德要经常修养锻炼、践履笃行等，今天仍有其重要价值。

有的人认为，弘扬传统美德会取代或削弱我们原来宣传的社会主义道德。这是误解。弘扬传统美德，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指导下，以批判性的认识能力，对传统道德加以消化、扬弃。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基础上，重新加以阐释，把它放在社会主义道德的综合中去，使其获得新的、更加丰富的含义，赋予时代精神，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们的道德实践中发挥作用。就像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中，引用了传统道德的名言和典故，不但没有冲淡他所宣传的共产主义道德和坚定的革命意志，而且增强了这种效果。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引用了孔孟所谈的一些道德修养方法，不但没有削弱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而且对这种修养起了很好的激励作用。这也为我们弘扬传统美德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树立了榜样。

还有的人认为，提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容易导致忽视国外各民族道德中那些好的东西。注意这一点是必要的。但是，“道德是为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服务的。^②我们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是弘扬民族偏见，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引导人们努力向上，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为了这个目的，在道德建设中，当然也会注意吸收其它民族道德中那些优秀的东西。正像“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③一样，外来的道德文明也只有在我们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吸收、改造，才能使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人民习惯和感情的东西。所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为我们积极地吸收国外各民族的美德奠定了基础，就能使中外道德文化溶于一炉，建设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

二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随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全面展开，各种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多种经济成份的增加，使道德主体具有多元性、自主性；而且随着产权制度的变革和利益调整，社会发生了分化：有小部分人先富起来，有部分人达到小康，大部分人还在为解决温饱而努力，这样，道德主体之间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就有了差异、矛盾，以致发生某些冲突；原来由血缘、情感和政治原因结成的联系和关系，逐渐被商业的、金钱的关系所渗透或取代，金钱的权力和欲望极大地扩张了，围绕金钱而发生的矛盾和斗争出现了。这样，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和人们的行为走向，表现出明显的差别：文明与愚昧，高尚与卑鄙，廉洁和腐败，正与邪，真善美和假恶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这种反差面前，人们的价值选择，道德取

向，就不能单靠朴素的感情和生活的经验，也不能只靠权威和组织服从，它在很大程度上要靠道德主体的理性选择和的道德实践中坚强的道德意志。这当然要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加强社会主义道德纪律建设来解决，但是，借鉴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也是很有裨益的。

传统道德论重视理性的作用，这对今天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也是很有启迪的。儒家提倡“尊德性而道问学”（《中庸》），“德性”，就是近代提倡的理性；“道问学”，即提高理性思维能力，提高道德实践的自觉性。也就是《中庸》中所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过程。儒家认为“德性资于学问”（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特别强调学习、思维、教育对提高人们道德水平的作用。孔子主张“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荀子更主张“强学而求有”，“思虑而求知”。（《荀子·性恶》）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说明对过着富裕生活有人，不教育，他们必然要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来。这些论述，在今天仍有其理论意义。我们党历来主张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的学习和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和广大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在革命年代，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学习和教育，使党内外的革命者树立了革命理想、道德和纪律，促进了革命事业的成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更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④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就强调“应高度重视理论建设”的问题。可是，有的人还以为只要经济搞好了，道德水平也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他们不相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重要性，不相信人们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的形成，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遵守，是一个教育、学习和理性自觉的过程。这种自发论，不但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同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看法也是相去甚远的。所以弘扬传统美德，首先就要弘扬传统道德论中尊重理性的精神。

传统道德在几千年间，多视角、多层次地提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职业的人或某些经营活动，仍有适用性。儒家要求从政人员“仁民爱物”（《孟子·梁惠王下》），“以政裕民”（《荀子·富国》），正己以正人，反对贪鄙奸佞，崇尚清正廉明。这些“官德”，对今天党政干部反腐倡廉、修身律己是很有好处的。对于当时的“士”，要求有宏大志向和抱负，“仁以为己任”，“笃信好学”（《论语·泰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这对今天有些尚处于“相对贫困”的知识分子也有勉励和鞭策作用。还有许多协调人际关系的道德原则，国内外许多企业家把它用于经商、办企业，也都取得了很大成功。不久前，《光明日报》（1993年7月14日）发表的《贝兆汉的魅力》，介绍了广东省著名企业家贝兆汉的经营之道。作者用“人无信不立”、“改革也需要中庸”、“仁者无敌”三个小标题来概括文中的主要内容，体现了企业经营以德的良好效应。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传统道德对贫富阶层的道德规范是可以借鉴的。当前社会上有些先富起来的“大款”、“大腕”们，一掷千金，搞炫耀性消费，甚至狂嫖滥赌，“为富不仁”；而有的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又不安心于勤劳致富，甚至铤而走险，以致伤风败俗，破坏社会秩序。对犯罪者当然要绳之以法，对其中多数人还是要经过教育，启发其道德自觉，使市场经济得到道德文明的保障。当然主要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

和善恶标准去启发和规范他们。但传统道德中对于富贵与贫贱的许多道德观点,有的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像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要求“处富贵”、“去贫贱”,都要合乎道义,不搞歪门邪道。儒家还反对“富贵”了的人骄奢淫佚,提倡节俭,富而为仁,富而好学;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种道德抱负,至今还鼓舞着海外炎黄子孙立身创业,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贡献。

三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利于抵制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的影响。

对外开放,在引进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也会钻进来”,影响我们的人民。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⑤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开放过程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从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中寻找武器,抵制开放带来的腐朽东西的影响,改变道德低落现象,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个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弘扬优秀的传统道德,之所以有利于抵制西方腐朽的东西的影响,是有其历史根据的。

传统道德对义利关系的辩证处理,有利于抵制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是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表现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是个人主义,表现在人己关系上是利己主义。当前在我们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突出表现。中国传统道德很重视义利关系。朱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子大全集·与延平李先生书》)对于义与利的含义,程颢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这个“公”,当然首先是指以整体利益为名义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也指民族利益、防止自然灾害、维护社会继续存在下去等公共利益。虽然儒家有时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但总的来说强调先义后利,反对后义先利的。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就是要求把社会整体利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他也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但谋取私利不能违背社会整体利益,必须“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以义制利”。(《论语·宪问》)有的人认为儒家重义轻利的主张,是同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的,这是误解。著名学者张岱年认为,“儒家重义轻利,主要是告诫人们不要为了个人的私利而破坏社会秩序。……这种稳定社会秩序的思想,符合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在一定条件下,也符合于社会整体利益。”^⑥所以,儒家尚义的价值观同以集体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一般来说是不矛盾的;相反,它同西方以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为特征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则是矛盾的。弘扬儒家尚义的价值观,就会使人们看到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中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而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则是与中国国情民心相悖的。

传统道德对抗拒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中那些腐朽的东西也是很有作用的。当前,犯罪分子利用金钱、女色、黄色文化、生活方式奢侈化等手段,拉拢腐蚀那些道德意志薄弱、不顾人

格国格的人，以遂其牟取暴利、破坏社会主义的目的。中国传统道德注重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独立人格。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处世行事，都以道德为准绳，“非其道，则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同上）坚持“居仁由义”，（《孟子·离娄上》）反对各种违背道德准则的自暴自弃行为。这都能够促进人们洁身自好，刚正不阿，光明磊落。从古到今，受传统道德熏陶，而克己奉公，一尘不染者有之；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有之。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完满人格，也能起到抗拒各种腐朽东西的作用。

传统道德抵制资本主义那些腐朽的东西的影响，有其自身特有的优势。这是因为传统既是过去的东西，又是现实中流传的东西。许多传统道德观念，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 和全部生活方式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已成为我们民族的实践理性，蕴藏在人们的心理习惯之中，把它弘扬起来，就容易唤起今天人们的道德自觉，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抵制外来腐朽东西的侵蚀和影响。中华文化和传统道德脱离本土在周边国家，尚能在同西方的腐朽的东西的抗争中取得优势，那就没有理由怀疑它在本土也会发挥这种威力。何况我们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已经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基础上，形成了以集体主义原则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公而忘私，艰苦奋斗，勇于献身，已在全社会率先垂范。只要我们在宣扬这些思想道德的同时，注意弘扬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就一定能够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优势，改变目前的道德滑坡现象。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355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6页。

④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⑤《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141页。

⑥《中国论理思想研究》第130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冯 生

文化建设话“务虚”

阮纪正

笔者所理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指以中华民族为主体，以社会主义为本质的现代形态文化建设。它是我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方面，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今背景下的充分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转型。其核心部分，当是我们民族精神在当前世界环境中的重构和重组。由此看来，这种文化建设除了要有为我们民族发展准备物质条件的“务实”方面以外，还得要有为这种发展提供精神超越的“务虚”方面。这是两个不可或缺以及不可畸轻畸重的两个方面。用当前流行的语汇来表述，则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文明”的建设。就文化建设的范围来说，“务虚”方面或曰“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则占据着一个极为突出的位置。

一

马克思主义指出，一定的文化形态特别是其中的观念文化形态，其实都是一定经济和政治的表现和结果。离开这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去空谈文化和观念，那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一定的文化和观念又不能简单机械地归结为经济和政治的镜像反映，不能抹煞文化和观念跟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不能抹煞文化和观念对经济和政治的能动选择作用。人是理性的生物，观念导向是人类实践跟动物行为的基本区别之一。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观念导向和精神超越的“务虚”方面，使得人类实践可以超越现实而进行创造，把动物的适应环境升华为人类的改造世界。马克思说得好：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而在另一方面说，如果实践成果不能深刻地反映到理论思维中的时候，理论的苍白、浮躁、混乱与矫揉造作就是不可避免的。而后者又必然会加剧实践的盲目性，甚至让实践的结果走向原来愿望的反面。特别是处在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任何理论虚无主义都是危险而且有害的。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思想理论，而是在于要什么样的思想理论。

当前，我们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要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探寻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必须牢牢地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问题在于任何经济的发展，又都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因而我们应当在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历史性演化当中，作出真正自觉而且有效的选择。我们知道“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根本的思想路线，它本身是完全正确的。而“物质决定意识、实践优于理论”的哲学原理，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但这些东西跟我们那在农业自然经济小生产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求实致用”、“求利致富”、“尚力图强”、“灵活变通”的经世、致用、事功思潮，事实上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一个农业自然经济

小生产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把实践局限于个人经验的层次而不能提升到社会历史的高度，还用线性单向的机械方式去把这些个人经验推到极端，那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确实无法实现对自身的突破和超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结束后，由于僵化意识形态信条的破灭，人们价值取向多由“虚”转“实”，理想还原为实惠，一种所谓“心往实处想，劲往实处使”的“办实事、得实惠”眼前功利主义，成了整个社会思潮的主流。就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人们总不能老是在想象中生活，而人类社会也不可能根据某些“先验的”意识形态标签来运转。就这点来说，舆论界对“空谈误国”的警惕和对“实干兴邦”的执着，应是合理的。正如俗语所说：“四个现代化是干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或说出来的。”

但人总是要干事的。现在问题不在于干不干，而在于怎样干。建国以来我们从来都是强调“大干快上”的。但这“大干快上”的结果，却是把国民经济推到一个崩溃的边缘。岔子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一种建立在农业自然经济小生产基础上实用理性操作型的文化。它提问题的方式，首先是生命体的利害得失，而不是“物自体”的真假对错。它那“黜玄思、务实际”的经世、致用、事功思潮，不但源远流长，而且在晚清以来还一直是社会思潮的主流。恩格斯指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李泽厚先生也认为：“中国人的思维乃至中国文化都与实用的东西联系得比较密切。”这种实用事功的倾向，甚至在宗教信仰这个最不实际的领域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人缺乏西方宗教那种赎罪得救、灵魂飞升、与主同在、获得永生的崇敬心理，也没有印度宗教那种苦修苦炼、精神解脱、跳出轮回涅槃寂静的不懈追求；多出来的东西，则是非常实际的趋吉避凶、化灾解难、肉体成仙、获利图报的利用神灵。费孝通先生在《美国与美国人》一书中对比东、西方宗教信仰的这种差别时写道：“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象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所以，中国人“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一方面见菩萨就拜，另一方面又不见真神不烧香。灶君老爷上天，人们便塞点麦芽糖给他吃，让他别到天上去胡说八道。总之，中国人极为善于利用神灵。由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便把拉关系、走后门、行贿赂、通关节的世俗行为也称之为“烧香拜神”。这种被外国人视之为“亵渎神灵”无信仰的操作实用型中国式智慧，造成了我们古代社会的繁荣，但同时也造成了我们近、现代社会的停滞。

几千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几十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经世、致用、事功的思潮，并没有也不能将我们引入一个新的社会境界。现在人们还要把这种思潮进一步向急功近利、眼前实惠的短期行为，更不见得可以使它增加点什么新的时代内容。时下所谓“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有权不用、过时作废、不捞白不捞”、“我死之后、那怕它洪水滔天”等等，更不见得是一个民族上升时应有的心态。就文化类型说，中国很早就是“以虚求实”，“将无为用”的。在这里，“虚”是手段，“实”是目的。人们活动中往往从一些模糊不清的心理意象出发，用标签或招牌去取代事物的本质，然后运用“挟天子以令诸侯”或“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去谋求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人实惠。而在这个过程中，那种虚幻不实的心理意象和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还有与此相应的种种空话、大话、假话、套话等等，恰好都是为了达到某种具体实惠的“求实”产物。我们现在已经明显地意识到，那泛滥成灾

的形式主义对我们事业的危害。但在克服时似乎又找不到问题真正关键所在。形式主义之所以长年禁而不止，其实就是那简单的“求实致用”在支撑着的。人们“认认真真搞形式，严严肃走过场”的结果，是实实在在、如假包换的名利双收。所谓“图虚名、得实祸”的那个“实祸”，原来是祸人不祸己、祸国不祸身的。中国人特有的表演意识、双重人格、随机应付、灵活变通，实际上是顺应环境而不是改造世界。而他们那不屑于明确理论的“阳奉阴违”和“阴奉阳违”，实际上也只是对现存秩序的反叛而不是超越。而这反叛的结果，则是在“取而代之”以后旧秩序的全盘复活。历史辩证法早已向人们表明：中国人过于讲求实际，不愿意执着于抽象的理论学术，但这恰好又反过来给我们在实际事务中带来了屡遭失败的苦果。“五四”先哲意识到这个问题，企图把经世、致用、事功思潮引向近代启蒙主义，让文化建设从器物层面通过制度层面而最后提升到精神层面，讲究“吾人最后之觉悟”。但这个时代的主题，很快又给实际事务给淹没，人们倾向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少曾领风骚的先进人物，竟不知不觉地又向着最古老的传统复归，而人们对一些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则大都仍然是处于形式模仿、拿来就用的一知半解、若明若暗之中。

二

可以比较一下另一种处理“虚”和“实”问题的文化方式。西方人历史上具有一种“以实求虚”、“实证推演”的纯粹理性追求，具有强大“形而上”的神学传统，比较执着天上而不是地面的乌托邦。他们的手段是“实”的，但目的却是“虚”的。他们通过各种具体的实证分析、试验探测，去追求什么绝对、普遍、纯粹、永恒、真理、正义、不朽、上帝等虚无飘渺的东西。当然，西方社会也有自己的虚伪和奸诈。但他们的工业化过程，却是采用“血与火”的早期资本主义方式，通过产业革命和经济实力而不是投机取巧和理论标签，从而得到实现的。而且在这个“用实”的过程中，人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理想社会状态的执着追求，并不缺乏反思传统、批判现实的形上超越精神，亦即从来没有放弃过“求虚”的追求。而在这个文化氛围中生长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更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那实践的、科学的本性，跟其批判的、革命的本质本来就是一回事。至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立足于人生和价值，追求效用和成功，突出行为和工具，反对抽象理论和“形而上学”；这看起来跟我们“求实致用”的“实用理性”极为相似。但问题在于美国实用主义是一种关于功用的理论思考，而不单纯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方式。实用主义强调冒险进取、探索创新，这也跟我们随机应付、灵活变通具有不同的品格。实用主义的真理、价值理论，具有明显的主观主义和信仰主义特征；而我们的“实用理性”，却往往是“舍己从人”无信仰的。

世界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是最个人主义的阶级。但他们在创造自己的经济——社会体系时，却并不缺乏真正的牺牲精神和献身行为。商品社会、市场经济是个真正世俗和功利的世界；但它所需要的社会前提和制衡因素，恰好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一类“公理”和“正义”的追求，是公民社会的契约、信用、法治制度。马克思当年曾极为深刻地指出，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都是商品社会价值规律在商品生产者和所有者头脑中的反映；诚然，商品社会、市场经济是个真正功利主义的世俗世界，它本身确有追逐利润的内在冲动和本质，倾向于冷酷无情的赤裸裸“现金交易”，彻底撕掉传统社会那温情脉脉的

外衣，把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但在另一方面来说，对于商品、货币这样一些永恒变动并充满“形而上学神秘性”的现象，仅仅执着它那表面的物质外壳而不问其背后的实质，那也很难真的叫作什么“实事求是”。商品、货币等等东西从实质上说，都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不仅是其表面的物质载体。它们必须要也必然会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问题还在于任何社会关系又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而且从思想导向和社会制衡方面来说，那种所谓“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拜金主义，还有那毫无制衡的利己主义狂潮，也同样有可能腐蚀和瓦解这个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一个典型商品社会、市场经济那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是跟公正严明的法治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他们那世俗功利追求背后，又总有理想之光在闪现。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以物的关系来表现人的关系”，因而确实可以带来商品、货币“拜物教”现象。但这实际上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劳动异化”状态。它正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必须克服、扬弃的。所以西方思想界从近代启蒙主义的“理性批判”一直到当代人文主义的“文化批判”，从来都是用批判和反思的精神去支持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并由此进一步寻求其历史性的突破和超越。工业社会发展起来的“工具理性”，同时也有“目的理性”或“批判理性”去加以制衡。笔者以为，既然马克思当年早就科学地揭露了各种“拜物教”的秘密，那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我们，为什么仍然要让人们在思想上重新回到那“物支配人”的“拜物教”迷信中去呢？

必须指出，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中，本来是有形上超越追求的。我国古典神话中诸如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等所透露出来的消息，正是人类“以实求虚”那形上超越的本性。逐日、补天、填海、移山等等都是无法实现的虚幻追求，但我们的祖先却以一步一个脚印的“每天挖山不止”而逐步逼近。到了先秦时代，老子、庄子对现行生存方式合理性的深刻反思，孔子、孟子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惶惶追求，还有屈原那“死而不悔”的上下求索，一直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已”的真正脊梁。可惜这些东西在日后的发展中，日渐给那嘲笑“杞人忧天”的浅薄实用功利主义给淹没和扼杀了。“以虚求实”代替了“以实求虚”。笔者主张通过改革开放来扬弃更新民族文化以及重构重组民族精神，并不等于要从根本上抛弃和瓦解民族传统，走所谓“全盘西化”的道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不但是这个民族发展的初始条件和制约条件，而且还是这个发展的主体本身，因而无法象破鞋烂袜似的可以随便扔掉。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传统本身的变革和扬弃而实现新生。笔者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世界上从古至今连续下来绵延不绝的伟大文化。这是十分值得我们自己珍惜和骄傲的。它本身就具有与时俱进、唯变所适、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自我完善机制，具有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吊民伐罪、革故鼎新的自我更新传统。它一方面讲究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又讲究柔顺宽厚、包容万物。整个中国文化都是阴阳相济、刚柔互补的，因而具有很强的应变适应能力。特别是在当今“技术异化”条件下，中国文化那“生生不已”的生命智慧和“以弱对强”的内源性多样化发展战略，也极富启发意义。现在问题在于怎样赋予它一些合乎时宜的社会历史内容，让它能通过现实的社会机制去发挥真正的积极作用。为此，我们现在以批判意识去审视和反思这个传统，运用理性批判去继承和超越这个传统，可能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的正确途径。中国传统社会和相应的文化形态确实太古老了。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蒙上了很厚的历史积垢，必须通过革命的扬弃才能获得新生；而所谓扬弃传统，则恰好表明了它的解放和自由。

我们现在再把视野转回自己国家当前的现实。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胜利。而后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发生的种种失误，恰好又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毛泽东同志当年反复强调要“理论务虚”，现在看来并非全无道理。他曾用马克思主义去重新解释我们古老的“实事求是”格言说：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是主张超越眼前现实的“以实求虚”，而不是固守古老传统那执着现实的“以虚求实”。它的出发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事实；但它所追求的东西，却是这些事实背后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什么“规律性”。毛泽东那对理想社会执着不懈的追求，至今仍然引起我们极为深切的敬意。时下一些人在批评他“建立地上乌托邦”的可笑企图时，却把他那超越现实的执着追求也给否定掉了。这些人心目中的“实事求是”，仍然是顺应环境、迎合时尚、趋炎附势、搬弄名词“瞎起哄”地去谋求个人实惠，或者说仍然是我们古老传统的那个“以虚求实”。他们并不了解社会客观矛盾运动，不懂得这矛盾运动所形成的多种可能性以及相应的能动性选择。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也并没有什么真正值得坚持的原则；而那在口头上经常坚持的东西，则不外是“拉大旗作虎皮”用以吓唬别人的实用工具而已。

现在，我们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极需要有相应制衡和引导前进的思想文化环境，充分发挥精神文明那思想导向、智力支持、社会制约、心理推动的强大作用。但近年来实用功利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形上超越精神的严重缺失，则可能会造成真正的事与愿违。目前深化改革最需要的东西，恰好是思想、理论、精神、道德一类“虚”的东西，而绝不是跟风从众、趋时媚俗、灵活变通、随意应付的盲目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之所以能形成那么大的物质力量，恰好是搞了“理论务虚”，而近年改革的徘徊不前，却不能说跟“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滞后没有必然的联系。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改革步伐加快，关键之处又恰好是跟市场经济的观念突破直接相关。由此看来，如果思想理论不到位，那改革本身也是不可能到位的。在“求实致用”口号下把理想现实化和现实理想化，不但模糊我们自己前进的目标和方向，而且还消磨我们追求理想的意志和精神力量。由此而来的那种信仰道德支撑和终极关怀慰藉的双重失落，则会使人活在现存秩序的物质困扰中日益沉沦。而那被一些人称之为“从理想主义回到现实主义”的心路历程，很大程度上也不外是从“五四”的启蒙主义退回晚清的经世、致用、事功思潮。这历史循环背后的思想理论教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觉。

近年来国内泛滥不止的宗教热，气功、特异功能热，周易、命相、风水等东方神秘主义文化热，以及从西方引进的各种沉溺于自我而结果又迷失了自我的商业大众文化热等等，其实都是形上超越精神缺失后的一种心理补偿，其依赖性特征极为明显，而绝不是时下一些论者所称道的什么“文化多元”和“个人主体”的提升。至于所谓“无穷的争论”和“干的不如看的”等等指责，对老百姓来说事实并不存在。人们经常见到的东西，只是意识形态标签和政治权力棍子，极少见有健全的自由讨论和舆论监督。有权有势的可以为所欲为，无权无势的则不准“乱说乱动”，整个社会只能有一种声音，一切事情都只好等待上级的恩赐；

这种种现象跟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大众参与、平等对话、群体决策、共同选择，显然并不吻合。此外还有所谓“事事找理论根据也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现”，则更是莫明其妙。我们可以反问，难道事事不找理论根据，或者有些事不找理论根据，那就可以解放思想了吗？宣传固然要有纪律，但思想却确应无禁区。独立自主的理论思维并不是解放思想的障碍，而那“跟着感觉走”的“敢闯敢干”却往往会把事情弄糟；至于思想领域中的权力标准和相应的政治功利主义，即使在具体问题上极为正确合理，但从根本上也同样会影响人类精神那自由的本性。长期以来“理论为实际服务”的实用功利取向，取消了科学本身的独立发展；而那简单化“理论联系实际”的功利性操作方式，又发展了穿衣戴帽各取所需贴标签的形式主义任意解释。其实，理论的使命并不在于机械地解释现实并为各种现存秩序作辩护，而是在于审视现实并在现实矛盾运动基础上找出其不同的发展可能，并由此作出真正革命性的选择。理论源于现实又要高于现实。把理论完全混同于现实，实质上就是从根本上取消了理论本身的存在理由和意义。各种轻视理论和贬低理论的意见，最终将在实践中受到惩罚。

笔者以为，我党在改革中倡导精神文明建设应是很有远见的。我们不能对这个有远见的决策作实用功利简单化的解释。从理论上说，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对象化，而精神文明则是物质文明的主体化；这“两个文明”的基础是人类实践，它们二者在人们自由、自主、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中辩证地统一了起来。过去人们把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用所谓的“精神文明”去压抑物质文明的发展，亦即用过时的观念去限制实践的发展，妨碍人们对现存秩序的突破和超越，这当然是根本错误的。但由此走向另一极端，把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混同起来并取消其相对独立性，抹煞这“两个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抹煞精神文明反思传统、批判现实、创造未来的社会功能，让精神文明沦为现存秩序的附庸，这同样很难说是什么新鲜高明的见解。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是创造而不是顺应。所以，简单地让理想认同于现实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让现实趋向于理想。顺应现实是可操作的，改造现实也是可操作的。必须明白，理想跟现实并不是一回事。现实是出发点，理想是落脚点，而落脚点又是对出发点的否定和扬弃。如果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同一个点，那只能是原地踏步而停滞不前。笔者希望，改革开放过程中，应全面落实党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针，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对现实应有的导向和制衡作用。诚然，现代经济是一种非政治的经济。我们历来那“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标签和“是左是右”的政治态度归属，确实是无法解决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性问题的。但非政治的经济并不等于非理性的经济，现代经济并不排斥运用一定“主义”去审视自身的理性追求和自我认识。把我们的经济起飞寄托在一种非理性的个人实用功利主义冲动和相应的普遍性短期行为上，用“不要理论根据”的经济自发过程去取代理性在发展经济中的巨大作用，显然是跟当代生产日益社会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走向完全违背的。所以我们的经济改革，应该要有人类理性的重新复苏和回归。感性经验型的改革思潮，也应向理性批判型的改革理论发展。而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就可以在这理性批判而不是感性造反的过程中，得以健康地成长。

为此，笔者大声呼吁：现在仍然极需要“理论务虚”。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

责任编辑：冯 生

论认识的文化本性

吴家清

认识论只有到了融入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时才算是全面的、深刻的。这就要求我们的认识论研究者从以往那种离开文化，就认识研究认识的狭小圈子里跳出来，转而把人类认识当作文化现象进行研究。而要从文化学的角度观照、反思认识，就必须首先探讨认识的文化本性问题。

认识与文化：我们的新界说

要说明认识的文化本性，首先必须对认识和文化作出正确的界说。

什么是认识？这似乎是一个简单明了、易于达到共识的问题，其实并非如此。从古至今的认识论基本上都是离开文化、从纯粹认知的角度就认识研究认识的，我们不妨把这种认识论称之为普通认识论。在普通认识论范围内，尽管对认识作出多种多样的界说，但无非有两类对立的解释，即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解释和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解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科学的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引入认识论，把认识界定为人对客观对象的能动的反映。这一界说长期以来一直在我国占主导地位，几乎所有权威教科书和辞书都采用此说。近几年有人试图对认识的本质作出新的诠释，提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信息的选择（选择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观念地建构或重构（建构论）。但大多数学者反对这些诠释，认为选择、建构并不是与反映并列的，更不是与反映对立的，它们只是反映的一个方式、环节或方面，用选择、建构说明认识本质是片面的错误的。这样，人们关于认识本质的看法又高度统一到反映上了。我们认为，反映只是认识的一个基本方面，认识还有另一个基本方面，即主体的表现。认识既然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而人之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认识中就必然表现其主体性。旧唯物主义看到了认识中再现的一面而忽视了表现的一面，唯心主义看到了表现的一面（其前提是错误的）而忽视了再现的一面，选择论、建构论抓住了表现和再现的某一点而没有把握再现和表现的全部，因而它们对认识本质的说明都是不科学的。我们看到，认识的本质是观念地再现（反映）与客观地表现的有机统一，即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以主体为载体的客体性的再现与以客体为对象的主体性的表现的有机统一。再现是表现中的再现，表现是再现中的表现，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构成了一对矛盾。这对矛盾是认识的一个基本矛盾，是认识中所有矛盾的集合点。

接着我们探讨什么是文化。要对文化作出正确而统一的界说，关键在于科学地选择定义的角度。我们从人与文化的内在关系的角度对文化作如下界说：文化是“人化”的复合体，是人的社会性意识、对象性活动、客观性产物的总和。人作为不断创造自己的理想世界而实现自由的动物，必然有永无止境的属人性需要，而人的需要的对象又是作为不依赖于人的对象

而存在于人之外的，有其自身的规定性和规律，通常不会现成地满足人的需要，于是对人来说便有了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应有世界”与“既有世界”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必须（也只能）不断地去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人化活动。在人化活动的基础上，同时发生双向人化过程：一是外向性人化，即人的主体性（即人作为主体的各种规定性的集合）对象化，也就是把人的主体性从主体的存在方式转化为客体对象的存在；二是内向性人化，即对象的客体性（即对象作为客体的各种规定性的集合）非对象化（主体化），即客体从客观对象的存在方式转化为主体的存在（主体的本质力量）。这样，就创造了人的文化世界。其中，内向性人化产生了文化意识（观念型文化），人化活动直接形成了文化活动（活动型文化），外向性人化产生文化产物（包括作为人化活动物质性产物的物质文化，作为人化活动精神性产物的精神文化和作为人化活动规范性产物的制度文化）。文化意识、文化活动、文化产物依次作为文化的核层、幔层、壳层，共同构成了文化的圈层结构。文化圈层结构的核心是文化意识中的价值文化心理。

文化的“人化”本质是通过文化特性表现出来的。文化同时具有五个方面的特性：一曰整体性。“任何文化都是一个整合的统一体或系统，在这个统一体或系统中，每个元素都有与整体相联系的确切功能。”^①二曰社会性。文化是非自然的存在，自然是非文化的存在。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所具有的一切都不是文化，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所具有的一切都是文化，因为正如金布尔·杨指出的“文化是人们社会生活的沉积物。”^②三曰对象性。仅仅储存在一个人头脑里的意识还不是文化，只有当它取得了对象性存在的形式时才获得文化的意义。四曰连续性。人的那些即时消失的不稳定的东西不是文化，只有那些在属人世界持续地存在一定时期或被后人经验习得的社会性遗传的东西才是文化。五曰价值性。人是世界上唯一追求价值、创造价值的存在物，人化活动就是展示人的价值和为人创造价值的创造性活动，任何文化现象都凝结着价值因素。

从认识结构看认识的文化本性

认识结构就是认识的各层面、各环节相互联系的稳定方式。分析的角度不同，认识的结构也就不一样。从基本要素的角度看，认识结构是认识主体、认识中介、认识客体相互作用形成的。按照上述关于文化的本质和特性的说明，人的认识的三个基本要素都是文化现象，它们构成的认识结构是一种文化结构。

认识主体就是从事认识活动的现实的人。从整体上、根本上说，人的文化性才是人的根本属性，“人是文化的存在”（兰德曼语），人是文化的动物。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产物。我们既可以用人来界定文化，也可以用文化来界定人。威尔凯姆·奥斯特瓦尔德说得好：“把人类种系与全部其他动物物种区别开来的这些独特的人类特性，都被包含在文化一词之中。”^③

认识中介是认识主体借以认识客体的认识工具的综合体，包括物质型认识工具、观念型认识工具、物质——观念型认识工具。物质型认识工具是被用作认识手段的物质产品。“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④物质型认识工具是人化活动的物质性产物，当然是文化的。观念型认识工具是储藏在认识主体头脑里并在认识活动中发生工具作用的背景知识、

认识观念、认识范式、认知图式等，它既是对象性文化世界的非对象化（在内化过程中升华为主体性的因子），同时又是主体从事认识的隐形文化手段。物质——观念型认识工具是当作认识工具的以物质为载体的对象化知识，也属于在认识中起中介作用的那部分对象性文化世界。整个认识中介系统作为认识活动中双向人化的纽带、桥梁和“传导体”，是人类文化的显示器和最直接的表征。

认识客体是人们在认识活动所认识的对象。第一自然（纯自然）只是可能的认识客体，不是现实的认识客体，它不属于文化。现实的认识客体包括：（1）人化自然客体（第二自然），即打上人类实践印记的自然。马克思认为“人化的自然”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A·L·克鲁伯也指出，由于人的后天模式物化体现在人类的工作制品中，所以人的工作制品也属于文化。M·J·赫斯科维茨干脆把文化定义为“环境中人工制造的部分”。（2）社会客体，即各种具体社会现象和社会整体。社会是人的生命存在方式，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既然“社会的（即人的）”，^⑤“人的即社会的存在”，^⑥那么社会就是直接的文化现象。（3）精神客体，即人类的精神现象。它不同于个人的主观精神活动，而是对象化的精神。它与“人化的自然”一样，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过“人化的自然”属于物质文化，而人类精神现象则属于精神文化。（4）符号客体。即从第三类客体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认识客体。符号是人类特有创造物，符号使人从简单动物变成了人类动物，伯·霍尔兹纳甚至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所有象征符号的总体”，^⑦而“一个象征符号是一个客观体，它表示着某种意义和某种概念”。^⑧可见，整个认识客体系统都是人化的产物，都是文化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换一个角度看，即从认识基本方式的角度看，认识结构又是由下列五种认识方式相互作用形成的。第一种是日常的认识方式，它是对文化世界进行初步、混沌、统一认识的方式。第二种是虚幻型认识方式，包括低级形态的神话认识方式和高级形态的宗教认识方式。它们都是认识人的文化世界的虚拟态，同属于表现主导性认识。第三种是求真型认识方式（主要是科学认识方式），它认识人的文化世界的本真态，是批判地反映外部世界的人类认识，属于再现主导性认识。第四种是价值型认识方式，包括以寻善为取向的道德认识方式和以臻美为取向的艺术认识方式，二者都是认识人的文化世界的价值态，属于再现——表现契合性认识。第五种是哲学认识方式，即从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人与世界的一般关系的角度观念地把握世界的认识方式，它的思维类型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概念思维（思辨思维），是对人的文化世界的宏观——一般的反思，是以求真型认识为主的真善美有机统一的综合性认识。普通认识论只把神话、宗教、道德、艺术视为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不把它们当作人类的几种特殊认识方式，是不正确的。在文化认识论看来，它们都是人们观念地把握世界的特定方式，都是人表现自己人类本质的特定方式，因而都是文化现象。五种认识方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认识结构是文化性结构。这一文化性结构既存在于一定时代的认识中，也动态地存在于不同时代的认识演变中。

从认识活动看认识的文化本性

认识主体运用认识中介认识认识客体的过程，就是认识活动。

在认识活动中必然同时发生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相互作用的过程是认识主体观念地把握认识客体的过程。所谓观念地把握，实际上是再现与表现的矛盾统一。就再现来说，它有关于认识客体的自在性再现（事实性再现）和关于认识客体的功效性再现（价值性再现）两个角度，它包括现象或外部联系的再现、本质或内部联系的再现和规律或必然趋势的再现三个层次，包括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感性分析的再现、感性综合的再现（感性的具体）、理性分析的再现（抽象）、理性综合的再现（理性的具体）四个环节，再现的两个角度三个层次四个环节形成了再现的整体。

所谓表现，就是认识主体的认知方面的主体性在认识过程中的展示和在认识结果中的体现。认识主体的认知主体性既表现在具体的现实认识活动之中（如不同的认识主体在同等条件下对同一认识客体的认识会出现不同特征），也表现在具体的认识成果之中。在具体认识成果中的主体性表现包括：凝结在认识成果形式之中的表现，不同民族对相同的认识成果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的科学是用逻辑思维的形式表现的，而中国古代科学通常用政论、譬喻的形式表现的，不同的认识个体和认识群体对相同认识成果所采用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的风格；凝结在认识成果内容之中的表现，不同的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信息的选择角度和选择内容不同，再现认识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观念建构也不同；凝结在认识成果的形式和内容统一之中的表现，这种表现是前两种表现的综合，其表现更具有复杂性。就表现的维度看，因为认识主体的认知主体性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是知情意的统一，所以主体性在认识中的表现既有理性的表现也有非理性的表现，既有理智（如思维方式、认识范式、认知图式、认识观念）的表现，也有情感的表现和意志的表现。人是有情感、意志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就表现的性质看，既有肯定性表现（积极表现），即有助于真实再现的表现（与正确的再现的相一致，与错误的再现相反的表现），也有否定性表现（消极表现），即有碍于真实再现的表现（与正确的再现对立、与错误的再现同一的表现）。认识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表现，主要是主体的文化人格在认识活动中的表现。认识主体的文化人格是某一认识主体的各种文化特性的相互联系的稳定结构，决定认识主体的不同类型，决定认识的不同文化风格。

现实认识活动中发生的另一方面的关系，是认识主体间的认知交往作用，这种交往作用过程也是文化现象。首先，主体间的认知交往作用产生了主体间的认知社会关系。从整个人类认识活动的大视野来审视，主体间认知社会关系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的联系到自觉的联系，由直接联系到间接联系，由单方面联系到多方面联系的过程。通过一定步骤，主体间的认知社会关系逐步丰富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认知关系系统。

其次，现实认识活动中主体交往作用产生了认识共同体。认识共同体是主体间认知关系的稳定存在方式，包括正式的认识共同体和非正式的认识共同体。前者有一个由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构成的约束性结构，也有一个由推动主体从事认识的激励因素构成的动力性结构，如国家、民族、稳固社会集团、研究院所、研究会等；后者是不含有严格的约束性结构和动力性结构的认识共同体，如以一个学术权威为中心的认识群体，以一家报刊为中心的认识群体，以一个学术场所为中心的认识群体等等。不管什么样的认识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它们在认识活动中必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

再次，现实认识活动中主体交往作用进一步生成了认识活动的环境和文化氛围。认识主

体的认识活动总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这些自然条件构成了认识活动的自然环境。认识活动也总是在一定生产力状况下和生产关系基础上进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了认识活动的经济环境。同时更重要的，主体在认识活动中必然要发生四重互动：（1）政治互动，它社会化为认识的政治型文化氛围（即政治制度、政治设施、政治活动、政治关系的统一体），这种文化氛围的性质和状况可以用民主度、自由度、公平度三个“尺子”来衡量。（2）人际互动，它社会化为认识的人际型文化氛围（即认识主体间的人际协调状况），可以用人际域的广窄、人际亲密程度的高低、协调对象差异的大小、人际关系维持的久暂来确定协调度。（3）心理互动，它对象化为认识的心理型文化氛围（时代精神是其精髓）。（4）认知互动，它对象化为认识的认知型文化氛围（包括对象化社会化的认识范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认识观念等）。上述四种文化氛围和认识的经济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认知社会形态。其中，认识的经济环境是表层结构，认识的政治型文化氛围和人际型文化氛围是中层结构，认识的心理型文化氛围和认知型文化氛围是深层结构。

从认识发展看认识的文化本性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在原始社会的发展经过了前认识主体、潜认识主体、认识主体三个阶段。马克思认为，人类在最初形成的时期还是半动物式的，还是在自然力量面前无能为力的“自然主体”，它们尚未把人类和对象世界区别开来，还没有认知主体意识，因而是前认识主体的人。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基本属于非认知的活动，其所创造的是非认知的“文化”。社会实践和人——文化互动的发展，使前认知的人转化成潜认知的人。潜认知的人初步具有了认知主体意识和分辨意识（分辨主体和客体的意识），他们的活动是以实践为主导的蕴含着认知因子的“实践——认知”活动，其活动产物是蕴含着认知因子的文化（即蕴含性认知文化）。随着人的社会实践和人——文化互动的进一步发展，人在观念中自觉地把自已与自然界、自己与社会、主体的自我和客体的自我区分开了，认知主体意识完全形成了，人从此转换成了认知的人，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中有了认知性活动，其创造物有了以认知为取向的文化（即取向性认知文化）。可以说，人类认识的生成是在人和文化形成之后，文化意识、文化活动、文化产物之间相互作用，人与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所以，人类认识发生的根源只能从文化及其与人的互动中寻找。

人类认识一旦生成就开始其运动过程。推动人类认识运动的动力是一个系统，包括内在动力体系和外在动力体系。就内在动力体系来说，它的第一级动力是认知意识、认知活动与认知产物的相互作用，它的第二级动力是上述三个方面内部的矛盾，认知意识内部有认知心理、认知思想体系、认知观念的相互作用，认知活动内部有认识主体、认识中介、认识客体的相互作用，认知产物内部有物质性认知产物、制度性认知产物、精神性认知产物的相互作用。内在动力体系是人类认识运动的根本的决定性动力。就外在动力体系来说，既有认识与自然环境（主要是打上人类实践印记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有认识与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认识环境对认识的发展起不可忽视的作用。很明显，人类认识的整个动力体系都是文化的，正是文化的内部矛盾和人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类认识的发展。

人类认识的运动过程是认识的进化、发展过程。认识的发展进化过程呈现出复杂性。由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有共同的“类本质”，有共同的文化特性，整个人类的认识的进化必然

具有一元性（单线进化）、一般性（一般进化）；又由于不同的认识个体和认识群体总是隶属于一定的文化共同体，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所处的环境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它们的认识的进化又带有多元性（多线进化）、特殊性（特殊进化）。也就是说，认识的进化、发展是人类认识的进化与各个文化共同体认识的进化的统一，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的统一，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的统一。

人类认识的进化、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具有一个规律体系。（1）人化活动决定律。人化活动是认识的基础，客体在主体中的观念地再现，主体向客体的观念地表现都是在认知性人化活动中发生的，再现和表现的统一也是在认知性人化活动中发生的。（2）全息重演统一律。认识系统的每一个部分都必然地包含着认识系统整体的信息，故认识系统的每个部分必然都是认识系统整体的缩影。而且，个体的认识系统的发展必然地以简略、浓缩、迅速的方式重演人类认识系统发展过程。（3）采借抗拒统一律。认识个体在认识中具有主体选择性，由认识个体所构成的文化共同体的认识也必然有选择性。一个文化共同体总是有选择地采借和有选择地抗拒另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认识，即抗拒那些对自身的认识不利的认识因子，采借那些对自身的认识有利的认识因子。（4）分解融化统一律。文化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文化共同体内部的相互作用，必然会使认识系统发生分解和融化。分解就是一个认识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存在着文化差异，这种差异逐步增长，最后导致几个相互独立的认识系统。融化就是几个认识系统认知活动中长期相互接触中，或者在认识上处于优势地位的认识系统同化在认识上处于劣势的认知系统；或者几个发展水平相当的认识系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步趋近，最后融合成一个新的认识系统。（5）传承变异统一律。对新一代的认识主体来说，社会认识模式和社会认识成果是一种既得的对象性存在，是他们不能自由选择的。上一代人的认识总是通过社会——文化机制遗传给下一代，因而形成认识传统。另一方面，新一代的认识主体又处于新的文化条件，其认识必然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6）渐变突变统一律。一个认识系统的变异呈现出两种形式或经过两个阶段。认识的变异先是采取渐变形式，即认识的缓慢、渐进的量的变迁，认识的量的变迁必然会导致认识的质的飞跃，即社会认识观念、社会认识模式的根本转换，认知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认识成果的出现。可以看出，认识发展的规律也就是文化发展的规律，文化性是认识的真正本性所在。

① A·R·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②③ 转引自L·A·怀特：《文化的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2、376页。

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120、121页。

⑦⑧ 伯·霍尔兹纳：《知识社会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46页。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马列理论部

责任编辑：冯 生

新儒家：寻求中的价值重建

许 明

80年代，在大陆，一大批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传统儒学首当其冲，被认为是“中国人走向未来的沉重包袱”。^①而在台湾，有人则从“回答意义危机”的角度来评价当代新儒家，认为新儒家们回答了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②从而又使不少大陆青年学人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进行再思考。

孔子以降，儒学一直是安邦立道的学问。汉初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由汉末天下大乱始，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约四、五百年间，中国内乱不止，战争不断发生，生活动荡、社会不安。于是，禅、道应运而起。一到宋初安定，社会自然需要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价值支撑，理学随之而诞生。谓之儒学第二期的宋明理学，直接被当代新儒家看作承续道统的精神来源。但在历史的实际发展中，儒学并不是变革的理论，相反，促成社会变革的近代思想家，如康梁、严复、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无不在西方现代思潮的冲撞下成熟起来并参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个事实使当代相当多的对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深为关切的大陆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感情上对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产生隔膜心理，转而进行批判，可视为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当代新儒家们所作的巨大努力显然也可以看作是对现代化的深切关怀。1958年初，当代新儒家的领导人物牟宗三、张君勱、唐君毅、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大声疾呼：“我们并未死亡”，并论证中国走向现代化要靠中国之生命道统的发扬光大。^③在这前后，以重建儒学为目的的学术活动已日见声势，到70年代达到高潮。似乎要为这个东方的思想运动作注脚，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被他们自己的理论家解释为“儒家资本主义”的成功。

上面的陈述提供了这样一个矛盾的论题：反传统派所持的立场与儒家所持的立场都有其真实的理据存在。反传统派认为，西方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促成了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而历史上的儒学是政治保守主义的温床。新儒家则持这样的立场：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儒家资本主义是历史的证据，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在本土中催生出来。

互为相悖的观点事实上造成了文化创造上的分野，同时又给我们提供了饶有趣味的文化现象：似乎存在着历史意识的表层和深层结构的错位以及对这种复杂现象的重新观察。在历史运动的表层，观念的更替更直接地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相关。政治化了的、世俗化了的意识体系成为社会历史发生发展的有机组成。反传统观点依据的就是这样的历史现象。在这种表层运动中，意识与政治功利合二为一，为政治与社会制式的发展而对旧的意识体系进行批判性的扬弃，这在现实功利的运作中找到充分的理由。因此，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反传统的观点

是一种脱离了对现实清醒思考的臆想。依据历史深层构成所从事的儒学复兴运动，企图从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命统绪出发，寻求它的当代形态，这无疑具有逻辑的合理性。它寻求更深层的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德、伦理、形而上学本体。在这两种层面的交融、交叉中，其间的错位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延续了民族生命的“道德精神象征”显然不能认为是现代化的阻力，在这一点上，当代新儒家立于不败之地。但为什么表层的观念体系却保护了数百年的落伍呢？为什么不能从这个深层的道德理性生长出与我们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命统绪所一致的精神文化之果呢？

当代新儒家大概要回答、要创建的就是这个问题——从民族道统的内在生命力开发出现代化所需要的意识体系来。

一

不少学者早已感到中国深层文化十分独特的性质，它的独立性、历史性、生命力都是无可比拟的，它的包融性也是令人惊奇的。然而，历史表象似乎又显示它缺少一种自我消解能力和自我更新的机制。在这种被“错位”迷误的心态中企图重建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往往导致变形、扭曲。事实上，“五·四”以来，价值重建一直是历史的主题，但一次次地引进，一次次地被颠覆，以至于人们有理由怀疑：那种企图重建价值，让中国走上现代之路的努力是令人尊敬的徒劳吗？

我以为，新儒家的学者们至少在这一次次的挫折中看到了深层的危机和契机。

在现代与传统冲撞中的深层危机是人的道德本体、伦理本位“迷失”^④而不是表层的观念更替。对于这个问题的犀利剖析，新儒家学者所做的工作确实有份量。例如，张灏在分析近代历史变化时就认为，“当五·四的狂热者要求对所有价值，特别是整个儒家的道德传统重加评估之时，‘迷失’状态达到了极致”。^⑤

“五·四”以降，这种生存“迷失”并没有真正获得解决。尽管意识形态的重建工作在一大批志士仁人中进行，但它的中国化过程没有完成。政治风暴很容易使普通人的观念一次一次更替，古老的训条和生存原则由于没有获得如韦伯所讲的伦理形态而处在非历史性功能运作状态之中。

要理解新儒家学者的这种总体关注，就必须对西方现代文明作不同以往的估计。新儒家并不认为可以从西方现有的观念体系中寻求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依据。这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在这一点上，我们特别应当注意新儒家对宗教问题的关切。“四君子宣言”特别有一节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指出，认为中国的文化缺乏宗教精神是“犯了莫大的错误”。^⑥牟宗三说：儒家哲学与西方基督教相比，儒家当作宗教的形式特征并不明显，但这并不能说是儒学宗教性的缺乏，只能说是儒学的宗教性从不同方向开展。^⑦在重要的伦理精神的象征——“仁”里，明白地反映出儒家道德思想所固有的宗教性。^⑧

从生存迷失及总体关切上去理解传统儒学，而且引入道德——宗教的规范而挖掘它的价值意义，这是新儒家学者们的思路，也是他们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贡献。在这个思路中，包含着他们对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基本的观点，即认为民族文化的深层根源具有宗教意义，不是能够轻易推翻，轻易变换的。由此，可以说，它也不是能够轻易移植的。从这个立场出发，新儒家学者们对西方现代文明就持有了自己独特的立场。在《宣言》中牟宗三等人分析了中

西文化本源上的差别及文化与宗教的关系,认为中国文化有“一本性”,即中国古代文化有一脉相承之统绪,此即所谓道德之相传,而近代西方文化,来源众多,难以建立一统,于是以宗教信仰中之上帝为其统,此其一;中国文化内在地具有宗教性与作为精神生活的内在依据,在外表简粗的表述中蕴含精深的大义,而西方文化却采用制度的宗教形式(走向极端则爆发宗教战争),以政教分离的路线形成特有的基督教文化,此其二。^⑨以上两点形成了新儒家学者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中国文化之生命活力在于开掘它的一脉相承的道统的现代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拒绝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他们将文化视作与人类的基本精神活动相关切的具有宗教神性的东西。这就自然导出了中西文化之争中传统主义的逻辑立场。

以文化本体为生命之源的当代新儒学在总体关切的要旨下进行价值提升与重建的工作,其精神是令人可敬的。1965年6月,在汉城召开的“亚细亚近代化问题国际学术大会”上,张君勱对新儒家与现代化的关系作了意味深长的论述,认定“复兴儒家哲学是现代化的途径”。^⑩于是我们就要思考,除了上节所论述的新儒家在思考与建树上气度、方向和主观意图以外,在实际的理论上,有可能提出什么东西与中国现代化要求适应呢?而且,这些理论与传统儒学又如何有机地联结起来呢?

二

有人认为新儒家的当代任务有三:1、道统的光大——重开生命的学问;2、政统的继续——完成民主建设;3、学统的开出——转出知识之学。^⑪对此三项使命,新儒家各位看法大同小异。例如牟宗三认为,儒家的当前使命就是“开新外王”,从而引出民主,发展科学及振兴文化生命之流的结论。^⑫然而,要开出“新外王”(即新的政治社会形态),需要中华文化生命的复兴和振奋,也需要新的知识之学的推进。于是,传统文化之“道统”的再确立、再光大就显得更重要,因为只有确立安身立命之道,才可能有“开新外王”之功业。而对于这一点,新儒家的学者们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肖公权认为儒家传统基本上是在道德,道德是目的,知识是手段,只有确立道德,做人才有人格,做事才能“敬事而信”,外王事业才有资格去开出。^⑬一言以蔽之,新儒家的首要任务,是要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重新寻找或选择一种精神价值,为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

这样的选择只有在充分依据历史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新儒家充分重视宋明理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显出其意义来。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最关键的一个时期,用新儒家的话来讲,这个时期是儒学的“第二度开合”,它的最大贡献,是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而上学的智慧,开出了性心之学的新面貌。用牟宗三的话来讲,宋明理学家主要就是“唤醒道德意识”,强“内圣”而达圣贤。^⑭

但是,宋明儒家强调“内圣”而开“外王”不够。这是新儒家所不满意的。所以,在当代新儒家需要一方面提倡“开新外王”,另一方面要强调、强化“内圣”的内容。这实质上就是如何确立新的人文价值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问题,新儒家究竟认为开现代新外王的“内圣”是原儒(包括宋明儒学)就具备的呢,还是需要重新寻求的?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在原儒(包括宋明儒学)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而不管采取什么态度,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当代儒家所创导的精神价值是什么东西?如果它是某种意义上的“重建”,那么我们要问,它如何才能实现?

台大哲学系教授王邦雄认为，先秦原始儒家是为“已渐崩坏的周文礼乐”开发人心的内在根源，他们把政治等一切活动之根源提到道德层次境界，这就是所谓的“人文化成”。到了宋明儒家，排斥佛老，显发人性的道德主体而直透先秦儒学，此为第一层要义；再者，宋明儒“以理来贯通天与人，太极与人极，而人道人文，遂皆一一有形而上的究极的意义。……所以其中涵有一宗教性。惟从此宗教性上看，才知宋明理学，是中国文化经了佛学之超人文的思想刺激后，进一步的儒家精神的发展。”^⑤要言之，宋明儒学一是直通先秦原儒之本道，以道德本体为立论、立命之根基；二是将此宗旨理论化，概括化，形而上学化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辉煌时代。然而，明末以降，理学随满清入主而逐渐淹没，在乾嘉考据之风下，无法涌现出真实意义的义理，文化理想为之干枯窒息。

新儒家们如何面对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现代中国的现实呢？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必须两足同时站立起来；以建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合一的大生命。^⑥因此，他们敏感地认识到，走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是道德迷失、存在迷失、意义迷失。“失落了我们可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世界；也失落了生命存在的方向与意义”。（张灏）因此，问题很明确，新儒家要建立的是能使现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们首先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和思考的方向是企图站在时代的立场上对传统科学、西学、政体、宗教四大问题作出回答。这四大问题是新儒家建设自己的人文价值观的四个路障，也是别人对他们诘难最多的问题。新儒家学者反对抛弃了道德理性的科学主义（科学至上）；反对视而不见西方宗教片面引进西学的反传统主义；倡言民主科学与儒家传统的相融、相合（开“新外王”），如此等等，而最中心的问题，还是新内圣如何实现。

以我看来，新儒家在内圣的质的意义的论述上，就是如何恢复原儒之道，如何让道统发扬光大，开出生命的学问。但在论证道德本体的角度上，时代感上，却颇有意义。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唐君毅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等著作及四君子《宣言》，均对“性心之道”作了解释和论证。在《宣言》中，他们认为“性”乃道德良知之源，作为道德创造实体之源，“性”被肯定为“真我”，为人所以为人的内在主体。诚如牟宗三所云，“‘生理的我’、‘心理的我’、‘思考的我’都不是具体而真实的‘我’。具体而真实的‘我’，是透过实践以完成人格所显现之‘道德的自我’。此我是真正的我，即我格之真正的主体”。^⑦他论述的是超验的我，透出了一种超验信仰的指向。这种理论指向与新儒家反复申述的文化的宗教神性的内涵有着本质上的联系，而且，从这种宗教神性出发，对先秦儒家的“仁”的内涵作了现代解释。他们认为“仁”是道德理念，体现了一种世界观，它来自儒家“性”与“天道”。而“仁”有两项性格，首先，它含有“神入”与同情的无限能力，能化解人们之间的障隔，使“爱”流畅于人世间；其次，“仁”使宇宙中的生命得以不停地生长再生长。概而言之，“仁”的实现意指全宇宙都化成充满生命力和感性的“有机的一体”。当许多卓越的宋明理学家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来界定“仁”时，牟宗三认为这种精神意义存在于“天人合一”的理论之中。^⑧

我们可以说，牟、唐、张、徐诸位所探求的儒学传统，已不是宋明儒所阐述的古典形态的世界观与宇宙观了。它具有当代意义。而且，由于它的时代性，接触到的问题的深刻性，使它具有了与当代世界哲学水平对话的可能性。当他们活跃于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哲学舞台上时，西方的存在主义与其他生命哲学流派也兴盛一时，它们的指向都在于对人的生存本质的

哲学回答。新儒学具有中国道统所特具的东方文化圈的特色，无疑对中国哲学来讲，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重构。

三

道德自律，德性内涵为何能开出新外王？这显然是新儒学要证明的一个大问题，这也是从一般的学理上必须加以解释的社会—历史观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与否，解决得是否合理，直接决定了新儒家人文价值重建所能获得的社会意义。问题的重要性使新儒学思想家们对此投以极大的热情。牟宗三去台以后，最先的三部书（《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就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中国的内圣之学如何解决外王事功的问题。牟在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时认为，文化生命的强盛与衰败是国势盛衰的本然原因。所以，新儒家们对儒家人文精神的历史作用是十分重视并视为变革社会的主要因素。

由“内圣”开出“外王”的途径，在新儒家的著作中语焉不详。所以，遭到反诘也最多。所谓外王就是要建功立业，改变社会，然而，这又怎样与“内圣”联系起来呢？傅伟勋、杜维明、成中英等留美学者所持的批评观点大致是“帝王政治”、“泛道德主义”等。^⑨我不是说这样的批评毫无意义。然而，新儒家如此重视“内圣外王”之道，我以为是有其合理之处的。这显然有个关节没有打通，即知识分子（而不是圣王）作为历史文化承担者的作用问题。

认为新儒家寄希望于圣君明王来开出“新外王”恐怕不是他们的本意，连延伸意也不是。新儒家之所以对道德理想主义与人文价值精神的重建如此执着，在于他们观察历史的角度有独特之处。这就是：他们不但充分重视文化历史变革中的作用，而且认为这一作用是巨大的，诚如牟宗三所说，文化活动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定下一个向前发展的大方向。

文化的变革由知识分子来承担。因此，新儒家们在纵观历史时，总是那么尖锐地察觉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状态，重视知识分子的立身处世之道。牟宗三举王安石、司马光、三苏及诸理学家为例，从他们的立身处世的原则出发考察他们的社会政治作用。司马光“体史而用经”，顽固地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王安石“体时而用经”，用一地一时之计推行全国，惨遭失败。三苏父子“体文而用经”，文章写得好，议起国事来简直是胡说一通。而理学家们“体经而用经”，立人道之常，立人道之极，传承道统。所以除了理学家外，上述三类知识分子的规格都不顺透调畅，不成格，所以把时代弄坏。^⑩

通过具体的阐述，新儒家其实已将“内圣外王”作了现代诠释。如果以现代的社会政治民主等一般观念理解内圣开出外王之道，这无疑对新儒家是一个误解（尽管有些新儒家自己也这么解释）。沉浸在这种文化—历史观中的核心思想，我以为他们并不是着力于社会“硬件”的改变，恰恰相反，他们以“文化—知识分子”这样的内项构成了这样一个历史哲学观：文化与文明的历史承继与它的历史主导作用问题。

文化与文明的历史作用问题应当被重视到何种程度——是决定历史发展还是被某种力量所决定而在历史上起一定作用——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新儒家重视的是他们在历史上的现实作用，即民族自身发展中的文化生命的生长与延续问题。重视问题本身而且运用到具体的文化思考中去，对走向现代社会的当代中国来讲，无疑是具有意义的。新儒家着力论证的开出新内圣外王之道，似乎也可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当我们这样来看新儒家的主要努力时，

我们对“泛道德主义”的批评就可以提出质疑了：批评者持这样的观点，似乎讨论政治社会发展中的道德作用是一种心理主义，批评者恰恰没有理会到：历史发展与人的科学是不能分离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因此，道德理性如康德所云，在历史中不仅支配着个人，而且通过个人影响着历史。新儒家的努力亦可以给我们这样一种启示：当我们思考历史和现实时，人们精神发展的多层次的水平不仅内在地影响着历史进程，而且将会在历史发展的水平面上反映出来。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本文第一节所提出的问题了：新儒家对道德本体的执着论证与自信，显露了他们的一个潜在意识：传统文化之核可以演化成社会变革的精神文化之果。这里的途径，是通过具体的历史中介：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完成内圣而达成。虽然新儒家并没有在这一点上深入下去进而解释历史文化的表层与深层的错位现象，然而，它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也足够了。我们完全可以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人格，它的政治—文化两重性，它的因袭着的许多非文化包袱的沉重性，以及他在社会中实际所起的作用的局限等问题上去思考：为什么具有内在活力的中国文化，却在近代变成了阻挡现代化进程的惰力？抓住了这个关节点，对新儒家重建人文价值的努力似乎可以有深一层的理解。因此，我们充分肯定他们所作的努力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概括起来是：其一，面对20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华民族要以自己的精神立足于世界，这精神之核是什么？新儒家在思考并企图回答这个问题。其二，充分地重视人文价值精神，重视儒家传统中的道德理性，这是新儒家的一大贡献。这种具有宗教神性的再创造使社会的内在稳定具有精神意义。

然而，新儒家面临的困难实在是不少。这些困难有的是历史提出来的，有的是他们自己的不足造成的，概括起来是：其一，事实上新儒家并没有真正回答2000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所滋润的意识形态——儒学为何能替现代化服务？其二，事实上新儒家没有也不愿意看到：历史发展的自律作用大于人的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内在影响。其三，事实上新儒家没有也不愿看到，人的现代化具有双重意义，人文精神的建立与逻辑系统的更新。前者是价值精神，后者是认识水平。现代人所应具有的现代认知手段（思维变革），并不在新儒家的眼光之中。

在传统中国哲学的现代阐述之中，新儒家站在生命本体的高度来回答生存、意义、理性、价值……等西方现代哲学也关注的问题。由于人的存在面临的共同困难而使课题本身具有了世界意义。这种艰苦的探索即使存在着有种种可指责之处，然而却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① 《儒学与中国人》，李颖科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2月第一版。

②④⑤ 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

③ 见《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4月第一版。

⑥⑨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现代新儒家》，三联版。

⑦⑪⑫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香港1963年初版，第89、60、96—98页。

⑧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6页。

⑩ 《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的复兴》，《当代新儒家》第144页。

⑪ 《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9月再版，第19—29页。

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 从宋明儒家到现代新儒家

周 焱 成

侯外庐先生在谈到中、西哲学的不同时说过：中国哲学家大都是“贤人”，西方哲学家大都是“智者”。这种概括无疑是精辟和中肯的。中国贤人一直都把德性之知放在首位，而不太重视见闻之知。因此，在中国哲学中，道德哲学尤其发达，而知识哲学则得不到充分发展。前者诚为我国哲学之优势，而后者则无疑是需要加以改进的。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宋明儒家和现代新儒家对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看法，从某一侧面展示“贤人”哲学的流变与得失。

就笔者所见，最早提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这两个概念的是张载。他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入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①近几十年通行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一般都认为，张载所言“德性之知”相当于今语“理性知识”，而其所言“见闻之知”相当于今语“感性知识”。这种看法，似乎不够贴切。其实，张载所说的德性之知，是指一种以道德意识为核心的“体天下之物”、“合天心”的、“尽心尽性”的心理状态。它是一个主要属于道德哲学的概念，而理性认识则是一个认知哲学的概念，两者分属不同的领域。另一方面，见闻之知则主要是属于认知哲学的概念。不过，它不限于“感性认识”，凡不具有德性意义的纯粹客观知识（包括今天所说的理性认识）都属于见闻之知。总之，德性之知，是“求仁”之知，而见闻之知是“求智”之知。

宋儒所求之仁，顺着孟子“尽心尽性，知命，知天”和《中庸》“尽人性，尽物性，参赞天地之化育”的理路，具有涵天盖地，包容万物的广泛意义。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②此语为其他很多宋代儒者所反复称许。例如王阳明指出：“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

①④ 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当代新儒学》第155页。

③ 黄俊杰等：《儒学传统与文化创新》，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2月初版，第152—155页。

⑤⑥ 王邦雄：《当代新儒家面对的问题及其展开》。

⑦ 参阅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龚鹏程《传统、现代、未来，五·四后文化的省思》等。

⑧ 参阅《中国文化的省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林有能

一体者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君臣也，夫妇也，明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③宋儒这些说法，无疑都表明了仁的泛化。仁的原初意指，本来只是爱人、悯人之心。宋儒将此心推广及天地万物，而变成对整个世界的爱与悯，由此可见德性之知的宽阔涵量。

宋儒的泛仁论，典型地体现了他们对德性之高扬。如果仅仅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高扬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它把人的道德力量扩至最大的限度，并为人类的德性之知安顿了深厚的“形而上”基础。对此，论者大多未予重视。笔者认为，作为一种道德哲学，泛仁论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阐发如此恢宏、博大的“仁量”，确实是儒家哲学对全人类道德哲学的一大贡献。当然，如果我们超出道德哲学的范围来谈论儒家的泛仁论，其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如果把泛仁论作为一种认知哲学，其缺陷更为严重。它会带来事实的价值化和自然的拟人化。从认知哲学的角度来看，鸟兽草木、山川大地等的存在，本来只是一种纯粹的事实，它们与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无涉，与人类价值无关。但是，由于宋儒未能区分道德哲学与认知哲学，他们经常把泛仁论作为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宋儒便无法客观地认知世界，无法真正地把握世界的“本然”。

上述情形意味着，宋儒过彰的德性之知“侵犯”了见闻之知（对自然的客观之知或“物交而知”），使其隐而未显，缩而未张。严格意义的科学未能在我国首先出现，由此可以得到某种解释。很明显，科学之知就是客观之知。如果客观之知未能从德性之知中独立出来，科学的建立是不可能的。

现代新儒家，尤其是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缺乏科学，有较深的认识。跟宋明儒者相比，他们对见闻之知有更多的向往与追求。在其纲领性文献《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承认，中国先哲缺乏西方那种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精神。“中国人之缺乏此种科学精神，其根本上之症结所在，则中国思想之过重道德的实践，恒使其不能暂保留对于客观世界之价值的判断，于是由此判断，即直接的过渡到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实际的实用活动。”^④因此，在“正德”与“利用厚生”之间，缺了一个中间的环节——理论科学知识之扩充。为了补上这一中间环节，他们主张中国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统，即“科学知识之传承不断之统”。在我们看来，这里所说的学统大体上就是见闻之知之统。现代新儒家认为，为了建立这种独立的学统，中国人必须自觉地成为纯粹认识之主体。“当其自觉求成为认识之主体时，即须暂忘其为道德的主体”。^⑤这样做，便可使因受德性之知笼罩而未张展的见闻之知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

从宋明儒者的不重视见闻之知，再到现代新儒家之重视见闻之知，这是儒家在现代的一大转折。这种转折之发生，无疑跟西方文化对中国之冲击和影响有关。新儒家认同科学，伸畅见闻之知，这是纳西学于儒学之中的一种尝试。人所共知，宋明儒者“援释（佛）入儒”。而现代儒者又“援西入儒”。这些都表明，儒家至今不乏从外来文化中吸取养料以发展自身的开放精神。当然，某一学派的开放精神很难开放到这种地步：完全放弃其基本立场，更换其根本宗旨。作为一个学派，儒家的一个根本宗旨即在于，以德为本，把德性之知放在最高地位。现代新儒家也不例外，例如，牟宗三指出：“我们普通泛说的‘我’，可分为三方面说，即一、生理的我；二、心理的我；三、思考的我。……此一、二、三项所称的我，都不是具体而真实的我。具体而真实的我，是透过实践以完成人格所显现之‘道德的我’，即我之

真正的主体。”^⑨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又指出，德性生命是人的正面生命，形质生命或情欲生命是人的负面生命^⑩，从这些说法可以看出，德性之知在现代新儒家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

并且，对于德性之知的阐发，现代新儒家走上了比宋儒更新的理路：

其一，挖掘儒家德性之知的宗教意义。作“Religion”的汉译，“宗教”一词含多样含义。这些含义大体上可归结为内外两方面：从外在方面看，宗教意味着教规、教堂（庙宇）、教士、教派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形式方面。从内在方面看，它意味着超越，超俗、神圣、永恒等等都是超越的表现。现代新儒家认为，外在的宗教形式容易衍生各种弊端。但是，内在的宗教精神却是人类的一种深沉、巨大的心灵动力。他们指出，以为儒家没有宗教的超越精神，那是一种误解。牟宗三说，在儒家最重要的概念“仁”里，就明白反映出儒家德性之知所固有的宗教性。“仁”体现了一种世界观，这世界观来自儒家“性”与“天道”的概念。根据这些概念，宇宙间的每个存在于其“性”里都有其“内在的本质”，而且，“性”也都参与了“天道”。这便涵蕴着一种信仰：存在与存在之间、存在与宇宙之间具有“本质上的一致”。牟还指出，“仁”有两项性格，一项是含有“神入”与同情的无限能力，当充尽其极，它能代解人们之间的障碍；它还使同胞爱畅流于人世。另一项是“仁”之淋漓的元气使宇宙中的生命得以不停地生长，再生长。所以，“仁”的实现，即意味着全宇宙都化成充满生命力和感情的“有机一体”。因此，在牟宗三那里，“仁”不只是道德的修养，而且是精神的转化；不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不再是世俗的，而是超越的^⑪。总的来说，很多现代新儒家都认为，儒家德性之知中所包含的宗教超越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它不同于西方基督教那种崇拜上帝的“外在”超越。在“内在”的超越中，超越不是超离，而是一种扩展，提升和不断突破自我限制；超越也不意味着脱离各种人际关系网络，而是内在于这些关系网络而转化之。在人伦日用中体现“天道”，确是儒家的一种基本的精神。

其二，借西方哲学来阐发儒家的德性之知。从第二代新儒家来看，他们对西方哲学中的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尤有兴趣。具体来说，牟宗三注重康德哲学，而唐君毅则注重黑格尔哲学。牟宗三对康德哲学钻研很深，著有《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康德的道德哲学》。其《现象与物自身》一书“乃为综合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之作”。^⑫牟认为，康德是西方哲学中最容易与儒家接头的一位，他也有深厚的道德意识。^⑬在建立道德形而上学（这是牟阐发儒家德性之知乃至整个儒家哲学的最大成果）时，他经常借用康德的概念与方法。例如，以康德的“自由意志”来解释儒家的“良心”；以康德的“自律道德”来解释孟子——陆王一系的、强调自我的儒家道德等等。至于唐君毅，受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如历史意识与总体意识影响很大。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基础，而唐君毅则认为，道德理性是一切社会、文化活动的基础。

其三，申明儒家德性之知的世界价值。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现代新儒家指出，有五个方面的中国智慧值得西方人学习：“当天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一种圆而神的智慧、一种温润而惻怛或悲悯之情、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天下一家之情怀。上述五点，除前四点外，其他大体上都属于儒家德性之知的范围。这意味着，在中国智慧中，儒家的德性之知最值得西方人学习。而蔡仁厚则说得更明确：“说到伦理学、道德哲学，或者人生哲学，恐怕没有一个学派比得上中国儒家”。^⑭新儒家都有一个共同倾

向：把儒家德性之知作为解决由工业革命、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和个人主义极度扩张而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等问题的良方。确定儒家德性之知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价值，一直是他们的宏愿。

在上述三者之中，后两者当然是宋明儒者所完全没有的，它们是现代新儒家的全新之处。而对于第一方面（挖掘儒家德性之知的宗教意蕴），宋明儒者已隐含此种倾向，虽然他们未使用宗教一词，但以道德为“天理”、“天道”、“天性”，即表明了要寻找道德的永恒与超越的意义。现代新儒家只是顺着这一思路讲得更明确，更深入而已。

在现代儒家心中，德性之知如此重要，而见闻之知又不可缺少。既然如此，两者如何统一起来？对此，他们提出了“内圣外王”这一著名的思维模式。内圣，是指人们内在道德的完善；外王，是外在功业的建立，其现代的具体所指，就是科学与民主。要做到内圣，无疑要求光大德性之知；而要做到外王，则必须充分发展见闻之知。就内圣与外王的关系说，内圣是“体”，外王是“用”。体立则用生，体健则用大。但是，如无用，则无以见体；用的枯退，也会导致体的萎缩。可以由此推论，德性之知是体，见闻之知是用，两种知互相连结，而内圣的德性之知比外王的见闻之知重要。

如果单从儒学自身的发展来考虑，现代新儒家内圣外王的思路，既坚持了德性之知，又容纳了见闻之知，这表现了对宋儒的承接与超越。其容西学于儒学之中的良苦用心，也确实值得我辈同情。但是，如果我们超出儒家的立场来考虑，那么，仍然有很多难解的结。在内圣外王的格局中，隐含着很多大前提：内圣在先，外王在后；德在先，智在后；见闻之知以德性之知为本；德性主体决定认知主体……。这些大前提，并不是自明的“公理”。新儒家很难找到充足的理由反驳这些大前提的反面：外王在先，内圣在后；智在先，德在后……。在笔者看来，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都有各自的根据，很难以此驳到彼，或以彼驳倒此。大体上说，在道德哲学领域，德在智先等是有根据的；而在认知哲学领域，智在德先等也有道理。关键在于确定这些论题的不同适用领域。但是，宋明和现代儒家不满于这种限制，他们总要扩张德性之知，总要把这种知（假如在不严格的意义上可以称此为知的话）提到过分的高度。德性之知的越位，是儒者一直都无法克服的偏好。

① 参见《正蒙·大心篇》

② 参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③ 参见《大学问》

④、⑤ 参见张祥浩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55—356页、第357页。

⑥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70页。

⑦ 蔡仁厚：《宋明理学·北宋篇》台湾学生书局印行，第1页。

⑧、⑨、⑩ 参见罗义俊编著《评新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第161页、第530页。

⑪ 参见《中国文化论文集》（四），台湾幼师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12页。

⑫ 《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现代篇2，台湾牧童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系

责任编辑：冯生

当代庄学与文化研究的“后现代”误区

陶东风

一

关于中国文化的马拉松式的讨论已持续一个多世纪，似乎没有冲向终点的迹象。现在回过头去看，这场讨论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政治论争，与其说是理论探讨，不如说是救亡口号的荟萃。历史的语境决定了文化热的性质，中国知识分子是在解救民族危难的特殊情境下开始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的，形象地说，是洋人的枪炮打出了一个文化热。因此，急功近利、高度政治化、带着极大的情绪，这些就都难以避免。大量非认知性、非学术性因素渗入了文化讨论，大家都急于为中国文化开药方，急于打出自己的旗帜和口号。价值取向的较量成为讨论双方争辩的核心。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对这场历时一世纪之久的文化讨论的否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化研究的性质是难以彻底改观的。处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夹缝中的当今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感到，确定文化价值取向是多么需要。这正引发了本文的写作动机，即对文化研究中一种颇为流行、颇为时髦、颇为引人入胜，然而又颇为危险的价值取向说几句不恭的话。

这种危险的价值取向即本文说的“后现代误区”。所谓“后现代误区”是指，许多中国大陆或台港的学者，站在已进入后工业化（后现代）时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思想家的立场，反思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反思中西文化。他们虚幻地感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也就是当今中国的社会和个人问题，把西方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当成了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比如物质文明过于发达，工具理性片面发展，过分征服自然导致天人分离、失去上帝后的价值虚无、精神荒原、孤独体验等等。于是，西方哲学家、思想家以至科学家对自己文明的反思与批判，成了我们用以反思传统文化的价值轴心，西方人惩治自己文化失误、价值偏差（主要是近代以降工业文明所导致的失误和偏差）的药方，被当成了惩治当今中国社会与文化“病症”的药方。由于这种价值取向是作为现代化之反动而出现的，时间也在现代之后，故曰“后现代”。

文化研究中的价值迷误在庄子研究中体现得很充分，也很典型，人们纷纷在庄子哲学中寻找反文明思想、后现代精神，因此有“庄子与海德格尔”、“庄子与德里达”之类所谓“比较研究”大兴于学术界。其兴趣中心则大同小异：庄子是反异化反物质文明反工具理性的思想家，具有对现代性持批判态度的后现代精神，庄子哲学可以解救被工业文明造成的异化所困扰的人类。我认为，这种将庄子“后现代化”的作法，不仅在价值取向上是迷乱的，而且在认知阐释上也常常歪曲了庄子。

首先，关于庄子反异化、反文化、反物质文明的观点。李泽厚在《漫述庄禅》一文中指出：在庄子的时代，“文明进步所带来的罪恶和苦难怵目惊心，从未曾有。人在日益被‘物’所统治，被自己造成的财富、权势、野心、贪欲所统治，它们已经成为巨大的异己力量，主宰、支配、控制着人们的身心。”“于是，庄子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他抗议‘人为物役’，他要求‘不物于物’，要求恢复和回归到人的‘本性’。这很可能是世界思想史上最早的反异化的呼声”。（见《漫述庄禅》，《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应该承认：李泽厚并没有简单地把庄子与西方的反异化思潮相提并论，而且对庄子哲学庸俗的一面也有所批判。但他的主要用力在于阐释庄子反异化思想及其世界意义，而在使用“异化”这个概念时，他也没有足够重视这个洋名的含意与中国土哲学的异质性。所谓“文明进步所带来的罪恶和苦难”云云，就相当含混。什么“文明”？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科技成果还是制度设置？总之，他的研究总的说虽是审慎的，却不乏含混之处，其取法于西方及港台学者的思路也较为明显。

张石的《〈庄子〉与现代主义》（此书所说“现代主义”实包含后现代主义）全面而多角度地比较了《庄子》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大陆学术界将庄子比附于西方现当代人文思想的代表作。作者在导论中指出：“《庄子》与西方现代文学都不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年代的作品，但在思想和美学意识上，却都有趋于一致的主流，而它们之间，也有极大的相通之处。它们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新的、跨时代的反文化的文化流派。”（张石《〈庄子〉与现代主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尔后，作者从三方面分析了它们的相似之处。首先，“在经济生活方面，他们反对人类智慧对自然的征服，指出了工具革命带来的文明中包含人类自我否定、自我排斥的因素，认为物欲是人类灾难的渊藪。”（同上，第4页）作者举《庄子·天地》中“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一段与西方表现主义者恰佩克的《万能机器人》相比，认为它们都是反对工具革命。其次，“在政治上，《庄子》与现代派的共同点，是从整体上反对一切政治秩序。”（同上，第6页）最后，在意识形态上，现代派文学与《庄子》的共同点，是对各自的社会与历史中的伦常礼教的怀疑和否定。（同上，第8页）应当说，作者的比较并非全是无中生有，但这种所谓的“相似性”、“相通之处”是表面的，深刻而内在的差异被忽略了。比如庄子的“机械”、“机心”与现代工具革命真的那么一样么？简单的汲水器（“槔”）与机器人能同日而语么，实际上，庄子说的“机心”不过是他反复说过的“成心”或“小知”，庄子反对它是因为它扰乱了他内心的虚静，这对养生可谓大不利。现代主义作家见不到槔之类原始器械，他们面对的是科学技术霸权这一真实的历史现实（庄子缺少的正是这个）。现代派作家的反工具革命有具体而明确的对象、意义与目的，与庄子的痛骂槔实在搭不上多少边。至于说到反对物欲，问题就更多了。浪漫主义作家不是也反对物欲吗？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是也痛斥物欲吗？连莎士比亚也是“金子”的大敌。照此推论，与庄子相通“之处”也太多得没意思了。作者又说：“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历史背景与产生《庄子》的时代具有同构的特点”，（同上，第26页）而这种“同构”就是现代派文学与《庄子》这两者的时代背景都陷入了“熵的危机”。这样把一个热力学定律搬到人文领域，而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似乎不怎么管用。

所谓庄子的“天人合一”可以救治西方的“天人相分”（人与自然的分离）论，以董光璧的《道家思想的现代注释和世界意义》（载《道家文化研究》〈一〉）为代表。此文从四

方面概括了道家思想的世界意义：“‘道’的概念提供了一种适合新科学的新实在观；生成原理替代 19 世纪启蒙哲学‘分析重物’的方法论大有前途；循环论对克服资源能源和信源危机是一种伟大的回天之力；‘自然无为’的思想为科学人文主义者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准备了深邃的生态资源”。董氏认为：近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一方面使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实现出来；另一方面也使人认识到了人对人的统治是以人对自然的统治为基础的。这就引起了人类的警觉：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了。而后，他引述西方科学家、思想家的言论，并得出结论：“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社会危机的一种文化策略而出现的科学人文主义，在老子那里找到了它的古典楷模。‘自然无为’这一精深的概括足以成为科学人文主义者的格言。”不能否定老庄的“自然无为”、“天人合一”思想对于西方文化确有纠偏作用，正如大量西方学人所警告的：科学主义已成为西方文明的一大弊端，机器对人的统治、物质对人的异化、技术官僚的新专制主义已成为当今西方的社会病，因而对他们而言，提倡点回归自然、清静无为可能的好处。但他人的良药未必治得了自己的痼疾，崇拜太甚还会成为毒酒。原因很简单：我们不是处于后工业社会，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还很低，面临的生存困境的疾病与别人不同。

二

那么，目前中国文化的危机、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到底是什么？明确这个，对确立我们评价传统文化的价值尺度至关重要。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中国文化在今天已进入一个空前繁复混杂的时代，其构成至少包括：传统中国文化；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以科学民主与人道主义为核心）；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后现代文化（80年代后期开始显著出现）。这多种文化成分之间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混杂关系，每一种文化因素都处于另一种的牵制和解构语境之中，造成了诸如现代化的儒家文化、穿洋服的传统知识分子等特殊现象。我想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对文化的这种杂交性都是相当熟悉的。

中国由于缺少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而使得传统文化中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无法斩断，至今还在补近代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这一课，因而80年代的文化热与五·四一样以启蒙为主旋律是并不奇怪的。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劣根性，仍深入骨髓地扎根于当今国人的心灵深处，只不过是脱下了旧长衫穿上了后现代社会或消费社会的外衣罢了。无论是在技术的层面，还是在政体、价值观念的层面，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都还势头不小，它们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潜在危险。（拙文《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文艺研究》，1993年第1期）

基于上述对中国社会与文化性质的基本估计，我们应该坚持以启蒙为主的文化态度和文化战略。与西方相似的，由科技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文化问题在中国不是没有，但并不构成对社会文化和个体生存的主要威胁（它们更多地是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过程中“渡洋”而来，而不是生根于中国本土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

从这样的眼光看，老庄哲学中以无为为核心的天人观念实在并不值得在中国太多提倡。老庄的无为思想使人养成安于淡薄、与人无争、不思竞取的性格，在处理人际关系及天人关系上也都如此。恬谈自得、不逐物欲的结果，是使人滋生苟安的惰性，无心改变生活现状。消

解自我中心、忘知忘我的结果是，人与自然处于原始和谐水平，科学思维无法发展，朴素则朴素矣，和谐则和谐矣，但主体不能从对象中分离出来，就无法改造物质世界（分离之后的再和谐则是另一个问题。至于容宽不争、不遣是非导致自私自利、无是无非、无真理无正义等，学术界论之已多，此处不赘。

其实，庄子哲学的种种“后现代”意义是洋人先发现的，国人不过受其启发而已（这种大受启发的事例在儒家文化研究中也是很多的）。君不见：马斯洛把高峰体验等同于道家的虚静心斋；阿恩海姆推崇中国的太极图。据说海德格尔曾醉心于译研《老子》，在1962年7月18日作的题为《流传的语言与技术的语言》的报告中，反复引用《庄子》中关于“无用之用”的话，以反对技术理性。海氏的高足比默尔（W·Biemel）在北大讲学时称：“海德格尔致力于弄清中国世界，皆因其看法是，没有中国语言的知识，没有对中国世界的意境的明见，就不可能有真实洞察的通道”。（参见熊传：《道家与海德格尔》，载《道家文化研究》〈二〉）在科学家中，有一种新兴学派曰科学人文主义（科学与人文主义的统一），同样对老庄情有独钟。董光璧介绍：作萨顿指出：“由于精神上的混乱是如此之深，以致单靠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能消除弊病，大概可以肯定任何不把科学人性化包括在内的药方都不会有任何功效。人们必须找到把科学和我们的文化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的方法，而不能让科学作为一种与我们的文化无关的工具来发展。”（参见董光璧《道家思想的现代性与世界意义》，载《道家文化研究》〈一〉）正是在这里，他找到并推崇老庄哲学的意义。汤川秀树认为：“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已见到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况（引注：这纯属无稽之谈）。或者这样说也许更正确：老子当时就发现了一种形势，这种形势虽然表面上完全不同于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形势，但事实上二者是很相似的。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他才写下了《老子》这部奇特的书。不管怎么说，使人感到惊讶的总是，生活在科学文明发展以前某一个时代，老子怎么会向近代开始的科学文化提出那样严厉的指控。”（同上）本人认为：值得惊讶的倒是汤川先生立论之大胆。老子确实说过“自然无为”，反对礼教、物欲、回到人类原始社会的话，但这是不是就是针对近代开始的科学文化发出的指控？“近代开始的科学文化”是一个限定十分具体而且明确的概念，汤川先生必须在《老子》一书中找到同样明确而且具体的限定才能作此论断。至于李约瑟这位中国科技史家对中国文化的偏爱就更是溢于言表了：或许唯科学主义“这种认为只有科学真理才能认识世界的思想，不过是一种欧洲人的毛病，而中国的伟大贡献或许可以通过恢复基于一切人类经验形式的人道主义准则，而从这种死亡的躯体上挽救我们。”

总之，此类认为道家思想可以挽回唯科学主义危机的主张，或许确实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适用于我们。原因还是我们还没有面临什么唯科学主义的危机，我们的科学主义思想还很淡薄，谈不上什么唯科学主义。今日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和科技水平还很低，自欺欺人地跟从于洋人是对自己民族的不负责任。如果说西方人对中国古代庄生逍遥、禅意盎然的欣赏是一个成年人留恋童年天真无知的雅趣；那么今日的中国人对此的赏识就是一种近乎变态的自恋了。按照这种向度发展下去，中国人、中国文化恐怕只能永远是发育不好的侏儒了。

港台的中国文化研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进而又渗透到大陆的，曾出版过不少将老庄哲学与西方思想进行比较的论著，如福允光司的《庄子：古代中国的人道主义》、宋稚青的

皮亚杰“活动”范畴的哲学评价

周 菲

一、皮亚杰“活动”范畴的两个方面

活动范畴,是让·皮亚杰(Jean Piaget, 1890~1980)整个发生认识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中心范畴。关于活动范畴,皮亚杰并没下过什么严格的定义,其有关论述散落在他的各种著作中。笔者认为,他的活动范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机能活动,它包括有意活动和无意活动,包括主体改造客体的同化活动和客体对主体改造的顺应活动。它们都以现有的图式为出发点,最后又复归到活动中建立的新的图式上来。二是主体的外部活动,包括主体对物体的掷、碰、推、擦等活动,主体从中获得关于物体特性的知识;还包括相加性的动作协调,主体从中获得关于自身活动方式的知识。

皮亚杰对活动范畴的研究也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认识的起源,包括经验来自活动的理论和平衡是认识运动的内在机制的理论。二是主体—客体的关系,涉及主体认识结构和功能,发展过程中认识结构演进的内在机制以及主体能动性等问题。皮亚杰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角度确立的以活动为中心的认知观,使他成为现代认知心理学中研究有机体的内外活动和人

《老庄思想与西方哲学》等。此外,叶维廉的许多文学批评论文、著作也都流露出对道家哲学与美学的偏爱、向往。叶维廉在他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的论著中,分析了中(主要是道家)西方文化传统与美学观念的差异,指出道家哲学美学的世界意义,现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反传统的失误等等。由于港台学者兼具中西文化两方面的知识,所以他们的研究较之西方学者更加扎实、系统,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值得注意的是,港台学者评价传统文化时的价值尺度受西方人影响至深这也是事实。如叶维廉对五四启蒙的批评就援用了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的思想与立场。(参见叶维廉《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84—206页)此外,港台学者大多或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或西方文化氛围之中,对西方工业社会的文明病有较深切的感受;加上精神、文化上的无限感、流浪感及由此而产生的思乡情结、本族寻根情结,都决定了他们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归依心理,这一点在现代新儒家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有鉴于此,我们在分析评价传统文化包括老庄哲学时,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切实地、理性地站在脚下的土地上确定中国与西方、大陆与港台所面临的不同的问题,然后再去确定我们研究历史的理性眼光和价值尺度。

作者单位:首都师大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的行为的主要代表。

关于活动与经验的产生。皮亚杰把经验划分为物理经验和逻辑数学经验。他认为，一切认识在初级水平都是从经验开始的，这两种经验有区别，但又都来自于动作。物理经验来自于直接作用于物体的个别动作，逻辑数学经验来自于把主体活动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动作的协调。

关于活动与认识结构的平衡。皮亚杰指出，平衡是认识的内在的本质特征。它含有主体与客体、同化与顺应、图式与图式间相互补偿的意思。平衡就是主体与客体相互趋向一致，而客体尤其必须与主体相一致。这种一致是一个过程，是在活动中完成的。认识的本质是主体转变客体结构性动作，是介于同化与顺应之间的一种平衡，是人对环境能动的适应，所以，心理和认识的发展动力是主体自我调节的平衡作用。

关于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皮亚杰提出了主体与客体的分化，完全依赖于中介物——活动的建构。活动是解除自我中心化的动力和根源。在自我中心化状态下，如不能打破自我，向客观化前进，就不能恢复主客体间的平衡。打破自我，依靠的是主客体之间的协调活动。

关于主体建构客体的理论。皮亚杰阐明了主体认识结构发展的内部机制，用活动基础上的主客体双重建构具体说明了认识结构的演进及其认识内容的协调发展，用图式、同化、顺应、平衡说明了主体反映客体的复杂机制。

关于主体的能动性。皮亚杰提出了主体与客体的中介—活动的观点。活动建立了机体和环境之间的联系。主体与客体在活动中不断分化，主体不断地建构客体，从而表现出主体的能动性。

二、皮亚杰活动范畴的一般哲学意义

皮亚杰的活动范畴强调认识起源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及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活动，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十分接近，因为二者都强调活动是人的认识产生的基础。不同的是，皮亚杰的活动范畴侧重于认识的个体发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侧重于社会群体的认识形成。皮亚杰的活动范畴包括有意识的活动也包括无意识的活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则是社会主体在一定条件下运用工具有意识地改造客体的物质活动。可以说，皮亚杰关于认识起源于活动的观点，从个体认识发生的角度支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起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而不是单纯起源于物质本身的观点。皮亚杰分析了婴儿在最初的无意识或很少意识的活动，在活动中主体逐步建构了客体，形成了认识的基础，这种无意识活动概念的引入，使认识起源问题得到了微观的说明。皮亚杰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所强调的主体在认识中的能动性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证明。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人的感知和智力过程的本质是活动。这是本世纪20年代以来心理学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现代认知心理学以大量的实验证明了人的活动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意义。它从动态的角度研究人的心理活动，把传统心理学中没有揭示的心理“过程”，通过各种变项的活动与变化揭示出来。皮亚杰的活动范畴理论，使这个认知心理学中的理论问题从具体的科学范畴上升到了一般哲学范畴加以研究，是心理学和哲学的一个突破。

对于活动理论,我国哲学界、心理学界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但在前苏联,尤其是70年代后期,以列昂节夫为代表的活动理论在苏联及东欧各国具有极大的影响。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为基础,从发生的角度对人的活动做了心理分析,他晚年写成的《活动、意识、个性》一书专门论述了活动、动作、操作及其与心理机能的相互关系。以后,布鲁什林斯基等人分别从社会心理学、系统论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活动理论。

皮亚杰在他的理论研究中运用了系统科学这一现代理论工具。从系统论的观点看,结构和功能是系统密不可分的两个范畴。系统的结构是系统内部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是系统的内部规定性。系统的功能说明了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及作用,是系统性质的外部规定性。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功能是在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系统内部固有能力的表现。行为是系统的外部表现,也是与环境的联系方式。结构、行为、环境的关系模式应是:外界环境→系统结构→系统行为。这是皮亚杰对行为主义刺激与反应公式修正的方法论基础。皮亚杰运用这一理论工具,把认识过程当作一个开放的、具有一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功能的系统。这样,认识过程实质上就成了一个以活动为中介的主客体之间的信息转换过程,由于主体认识结构的作用,转换过程中的信息量是不守恒的,因而主体对客体的认知也在改变。这就是说,在认识发展的任何阶段上,主体结构都只能是客体结构的近似模型,主体结构不能完全同化客体结构,对客体的完全认识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极限。

皮亚杰没有把平衡作为孤立的认识运动形态或特性来考察,而是作为结构的功能来考察,从而揭示了结构与平衡之间存在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结构是平衡的基础,结构的变化使平衡的水平相应发生变化;而平衡对结构又有反作用,平衡的变化又会影响和促使结构发生变化。所以,认识结构的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皮亚杰自我调节的理论也是根据系统科学的基本思想来说明认识系统演进的内在机制的。系统的信息特征说明,系统可以通过其结构储存信息,保留过去的经验,依靠结构接受外部环境信息,并对结构进行组织,从而调节系统行为。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皮亚杰超越了传统认识论。

三、皮亚杰活动范畴的认识论意义

1、在认识的起源问题上,填补了传统认识论的空白。关于人类认识的原始发生,皮亚杰说:“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发展的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17页)皮亚杰看到了传统认识论中的明显缺陷即只研究既成的成人认识过程,而不研究认识的原始发生。传统认识论对高级水平的认识的起源,人的感觉能力的产生,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的获得等问题,并无回答。在西方哲学史上,休谟第一次从心理学角度明确提出了认识来源于主体的习惯性联想的论说。康德则从逻辑学的角度认为,思维的必然性来源于主体先天存在的认识框架。皮亚杰超出了西方传统认识论的局限性,提出了人的认识产生于活动这一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中间环节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对于传统的认识起源观点也持批评态度,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从根本上解决了认识的起源问题。皮亚杰关于认识起源于活动的观点恰好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提出的认识起源于实践的观点不谋而合。皮亚杰通过对发生学的研究,科学地支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从个体认识发生的角度填补了传统认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空白。使马

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一科学思想在微观认识论中得到进一步发挥。特别是,他通过对认识结构的发生学的考察而得出主体的两种经验起源于活动协调的结论,较好地解决了从实践向认识转换的微观机制的问题,克服了传统认识论对思维形式、思维结构研究中忽视其与主体活动的关系的重要缺陷,并使列宁关于“人的实践经过千百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3页)的思想,得到了科学的证实。

2、深入了主体客体关系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主体和客体是标志进行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和对象互相对应的范畴。主体是运用一定手段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客体和认识客体的物质承担者。皮亚杰对主客体问题的研究思路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接近,他从主体认识的发生、主体的活动以及主体的认识能力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主体问题;从客体的客观存在、客体对主体的制约等方面探讨了客体问题;从主体对客体的建构、主体认识结构的平衡等方面探讨了主客体关系问题。这些研究对我们加深对主客体根本属性的理解,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皮亚杰对主体反映客体的复杂机制的研究,说明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能动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广义上说,反映是事物或系统特性向另一事物或系统特性转化。人的认识本质就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列宁的关于“一切物质普遍具有反映特性”的观点,说明了认识这种反映形式无论多么高级和奥秘,它都是物质的属性,都是物质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分析认识的时候,既不能离开认识的物质承担者,也不能把认识简单地看作主体一方的单独产生的属性。认识只有在客体的作用下才能产生,而它的内容又是包含着客体的。皮亚杰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迎合。他的建构理论具体地揭示了认识主体是如何反映外界刺激的。他还认为,认识就是转变实在的系统,就是一种主体的反映方式。皮亚杰所描述的反映与建构的关系是,反映依赖建构,没有建构就没有反映;建构体现反映,建构揭示了反映的机制。反映与建构都是在活动基础上形成的。这里面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皮亚杰对认识结构与功能的分析,突破了传统认识论仅仅从思维内容的深化去说明认识的发展,他从微观的角度把认识内容的深化与主体认识结构的发展辩证地统一了起来,把传统认识论对认识活动的静态分析拓深为动态分析。

皮亚杰对主体在认识中的能动性的分析,是非常深刻而又充满了辩证法的。他不仅充分肯定了主体不是消极被动而是积极能动的,而且论证了主体的能动性是不断运动的和发展的,从主体的认识过程来看,这种能动的发展又是有规律可循的。他把客体当作认识的极限的思想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性质。列宁也曾经说:“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永恒的运动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列宁《哲学笔记》第208页)皮亚杰的观点与列宁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皮亚杰的观点既体现了客体对主体认识的制约,又体现了客体的认识依赖于主体认识结构的建构,既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又体现了认识发展的无限性,避免了唯心主义。

四、理论局限

皮亚杰是一个学者，但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分析皮亚杰的理论，我们会发现它的缺陷与不足。

1、在皮亚杰的理论中，生物学倾向明显，对社会机制重视不够。皮亚杰认为，在个体认识的发展中，社会因素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它对认识特点、方式和全过程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他较多地强调了认识结构的建构，追溯到最后，只能靠生物的自我调节系统。这样就过高地估计了生物自我调节的作用，贬低了社会和教育的作用，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生物学倾向。他认为，婴儿初生下来，是“从一个单纯的个体状态开始的一在出生的头几个月完全没有可能与别人交往一而结束时是一个继续前进的社会化过程。”（皮亚杰《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第178页）这就无法区别人类的认识与其他动物的心理本质；无法区别人类的自觉能动性 with 动物本能活动，这是由于皮亚杰在研究方法中的生物学倾向造成的。

2、皮亚杰对生产活动在人的认识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缺乏深入的研究。虽然他受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注意到生产活动的认识论意义，认为“卡尔·马克思的一个根本社会学命题就是人为了生产而作用于自然界，但同时也为自然法则所制约。在对象的特性和人类的生产之间这种相互作用也在认知心理学中为我们所发现，我们只有作用于对象并改变它时，我们才认知对象。”（皮亚杰《儿童的心理发展》第151页）但遗憾的是，皮亚杰在具体论述人类认识过程时，却没有对生产活动在认识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由于忽视生产活动的作用，皮亚杰也就不可能对生产的手段和产物，特别是工具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有充分的估计，把工具作为客体排除在中介物之外。所以，他虽然强调活动是认识的发源地，但他最终也没能指出，人的活动主要是工具性的。这就使我们在用皮亚杰的活动范畴解释人类认识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时，出现了困难。

3、做为现代认知心理学家的代表，皮亚杰的理论同一些认知学派的理论一样，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缺陷，即忽视了非智力因素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认识活动实际上应该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统一。人是在适应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认识客观世界的，这就决定了人的认识活动不可能只是一个封闭的主体心理过程。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了对外观世界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需要、动机及个人的素质。这些非智力因素逐渐内化并积淀于人的头脑之中，形成了人所特有的心理结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心理结构的功能发挥的外部表现。非智力因素同智力因素一样参与着人的活动，它们作为主体活动的内驱力和自我调节机制能动地参与认识活动。关于这个问题，在皮亚杰的活动理论中并未加以深入的说明。

4、皮亚杰的理论研究忽视了宏观的认识规律，主要从微观的角度研究社会现实中个人的认识问题，是个体认识论。个体认识论是总体认识论的基础，总体认识论对个体认识论有指导意义和制约作用，它们之间是具体和抽象，个别和一般，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完整的、科学的认识论研究，应该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但皮亚杰只看到了在活动中可以实现主体对客体的建构，可以体现出主体的能动性，而没有看到事物本身的发展程度与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的密切联系。

然而，皮亚杰的理论研究，对于哲学的贡献毕竟是杰出的，我们应当以科学的实事求是

论资源配置经济学的方法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普曼经济哲学述评

胡 义 成

荷兰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贾林·库普曼是197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事实上，他是以其资源配置理论的哲学方法论阐释而获诺奖的，因而其市场经济哲学就值得中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重视。鉴于库氏成果是以西方市场经济学在二次大战以后的四次论争为背景的，因此，对库氏的述评须先简介这四次论争。

据有人统计，从上世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在西方，围绕市场经济研究的哲学方法

的态度进行分析，注意防止两种倾向：其一，把皮亚杰的理论当成唯心主义的东西全盘否定，只看到皮亚杰理论体系中的缺陷，而没有看到这个理论体系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其二，把皮亚杰理论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全面扩张，用以取代马克思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能动的反映论。

主要参考文献：

- 1、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
- 2、皮亚杰《儿童心理学》
- 3、皮亚杰《儿童的心理发展》
- 4、皮亚杰《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
- 5、皮亚杰《结构主义》
- 6、皮亚杰《心理学与认识论》
- 7、杜丽燕《皮亚杰的挑战》
- 8、陈孝禅《皮亚杰学说及其发展》
- 9、谢小庆《皮亚杰》
- 10、金立顺等《系统科学基础》
- 11、王家俊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12、〔保〕尼科洛夫《人的活动结构》
-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 14、《列宁全集》第38卷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论问题，大体上已经进行了四次较大的争鸣。其一，是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方法论争”，以奥地利学派的抽象演绎法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为论争双方，笔战达30年之久。实际上，马克思已经提出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因之，这次论争除了细部精化功能外，在哲学上并无大的突破。目前，人们已经共识于两者的统一。^①其二，是本世纪30年代的“方法论革命”，包括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以及数理科学对经济学的全面渗透。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哈耶克、米赛斯以及初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奥·兰格，都在数理经济学的新层面上提出了至今对我们有用的理论分析。市场与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中性手段的看法，大体上是在这种“方法论革命”的背景上初步形成的。其三，则是5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学假定大战”，美国经济学巨人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分持帅旗，就经济学“假定”（或“假设”）等问题，鏖兵论坛，煞为壮观。今天看，这次论战中产生的成果也对我们很有启发。西德舍夫勒于1955年推出《经济学的失败》一书，根本否定“假定——演绎”传统，提出经济学家首先要研究整个社会结构。1958年，帕潘德里奥推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一书与之辩驳，并吸取当时科学哲学成果，深化了“模式”和“理论”的区分。接着，1962年，著名经济学女强人罗宾逊夫人又推出《经济哲学》一书，对经济学中不能没有的价值观前提多处论析，并把它与意识形态相关联，虽不无讽刺社会主义之意，但在理论上确有新见。第四次大论战，则是8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又掀起的方法论大潮，其中不仅包括“经济学假定大战”，狼烟未熄，烽火再起，而且出现了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的哲学专著《经济学方法论》（1980年）、《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1980年），以及阿·艾纳主编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和沃·萨缪斯主编的经济学方法论论文集等书，不仅全面地提出了经济学必须借重于当代科学哲学的总思路，而且也对经济学“假定”的实践检验规则（证实或证伪）、数理方法用于经济学的可能性、新古典主义的局限性、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非科学因素等等，均有所展开和深化。这次论争至今还未停止。

库氏的代表作《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撰成于1957年。近20年后，此文代表的理论获诺奖。依我看，《三篇论文》是对西方经济学现代化的高水平哲学总结之一，其中许多内容对于中国当代经济学的现代化有借鉴意义。

一、以当代科学成果及其哲学提升为依据，深刻地揭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般结构，是库氏对经济学的一大哲学贡献。

捷克出生的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在1931年提出了“哥德尔定理”：其一，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如果其内部是一致的（无矛盾的），那么，它必然是不完全的；其二，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如果内部是一致的，那么，这种一致性在本系统中不可证明。^②这一定理被科学哲学加以扩充和提升，导向任何科学理论体系在形式上均是从某种设定出发的逻辑推理体系的结论。一些论者从中还看出，在形式上，任何理论体系如果其内部一致，那么，其真理性不能由这一体系本身加以确立，而只能由实践体系才能给出。这即佐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标准论。

哥德尔定理及其哲学结论，很快就与自然科学中既有的唯物主义传统相融合。“在一些自然科学中，在实验工作与理论工作之间已产生了很大程度的分化，前者从事于观察，而后者从事于推理和建立推理的前提”。^③可以说，实验工作者通由对客体的观察而“发现事实”，而理论工作者则从事实出发，归纳出某种“假定”，然后以此种“假定”为前提，运用公理化

的方法（亦即演绎体系构造方法），从推理中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在这里，一方面是基于事实的“假定”，另一方面则是以此“假定”为出发点的逻辑推理体系：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的一般结构是“假定+推理系统”。

当自然科学因为其理论体系的一般结构被清晰揭示而在量子力学和化学等领域长足进步的时候，经济学却因对哥德尔定理等成果及其哲学提升的隔膜而未能大踏步前进。这不难理解：当时一般经济学家对数理逻辑及数学、自然科学不熟悉，对公理化方法也不熟悉，因此，“在那些代表经济最优秀成就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并且预测会发现推理与引用事实这两者密切纠缠在一起”，其中包括继斯密著作而风行世界的马歇尔经济学专著也是如此。

针对这种弊端，库氏依据当代科学及其哲学提升，明确提出，在经济学研究中，应当“注重把推理的链环与对假设的说明分离开来”。其一，应当十分明确，“任何符合逻辑的推理环节总是明显地或含蓄地从某些前提出发点”，“在同一项分析中，这些前提本身并不是从推理的前提得出的结论”。其二，库氏引用罗宾斯的话说：“主要的假设都是一些以某种方式涉及到简单的和无可争辩的经验事实的假定”。他自己则把“假定”界说为其基本因素“是我们在分析经验世界中的人、组织、事物、行为或状态时的代表者或对应物”，它“涉及人的目的对手段的选择，并涉及生产和消费的技术可能性和生产可能性”。其三，“一旦我们采取了一组假设，则通过逻辑法则和在适当之处借助于其它数学技术，使推理本身提出那些可证实的或有意义的含义”。这也就意味着，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假定出发的推理系统。其四，“在推理的进行过程中，我们不允许事实从边门溜进来”。中国经济学家应当特别注意这一论定。以前，人们往往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口号下，完全忽略理论对于实际的相对独立性，在推理中又往往引进与前提相悖的事实，使理论在逻辑上很别扭。看来，这一毛病必须改正。一旦假定被确定下来，人们只能在逻辑法则支配下前推，彻底实施公理化方法。否则，要建立科学形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其五，库氏还对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作用进行了阐述，指出“可以从表示所研究现象的基本假设中，建立起和推导出所需要的数学概念和命题。数学工具的假设结构平行于我们所要建立的理论本身的假设结构”。在这种说明中，作为推理工具，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和地位是

以其据以出发的假设正误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数学本身只能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之一；当经济学假设正确时，这一工具十分有用；一旦假设不对，一切数学公式和计算结果全是谬误。显然，这种说明对立

于“数学无用论”，也对立

于“数学万能论”。其六，值得注意的是，在库氏关于经济学理论“假设+逻辑推理”的一般结构模式中，“假设”还有另一层含义：在“逻辑推理”过程之外，“存在着对模型（即经济学理论——引者）的评价”，这也是经济学理论与现实关系的一个环节，它“涉及到人们在各种阐释中利用模型所能表述的现象范围，涉及到这种表述所达到的近似程度以及根据价值判断所得出的结论是否恰当，这些价值判断是激励经济分析的最终动力”。这一说明使人不能不想到，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假定”，一方面是由观察到的事实决定的，但它并不全等于事实本身，因为，“假定”的另一面则是它也取决于人们对事实的价值判断。对于同一事实，人们可以从不同的价值判断得出不同的“假设”并建立不同的理论体系。西方科学哲学中有所谓“观察渗透着理论”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库氏转引别人的话说，西方当代边际价值论的“主要假设是这一事实，即个人能将自己的偏好排列成一种秩序并且实际上这么做了”。

这种假设，和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假设，显然不同。又例如，库氏提出，一切经济学的前提都是极大——极小原理，即生产者力求成本极小，政策制定者则力求社会目标的极大化实现。这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便不一致，但它似乎更接近事实。其七，库氏还引述别人的观点说，在经济学中，“高深分析的复杂定理最终正是依赖于这种假设”。看来，经济学的一切结论，事实上均或明或隐地包括在“假设”之中，推理的功能便在于使这种“包括”明晰化。这证明经济学的“假设”（包括经济学家对事实的价值判断）是十分重要的。库氏批评人们以前对经济学“假设”重视不足，研究不够，的确是切中传统经济学要害的。其八，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库氏在明确区分“假设”和“推理”时，在“假设”与观察事实相关的前提下，指出“经济学与任何实证科学一样，通过观察与推理的不断相互作用而取得进步”。如果把观察事实看成一种实践，把推理看成理论，那么，库氏在这里事实上便重申了我们熟悉的一个原理：实践与理论的矛盾及其不断相互作用乃是任何理论进步的动力所在。显然，库氏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实践论的认识论。

二、由区分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假设”和“推理”出发，库氏特别突出地强调经济学研究中公理化方法的优越性和必然性，其中包括强调数学方法对于传统文字抽象分析方法的优点，事实上是对经济学现代化的方法论说明。

如前所述，未明确区分“假设”和“推理”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往往在推理过程中掺入事实，在进行“假设”时又应用推理，结构不佳，脉络混乱。针对这一点，库氏特别强调在假设的前提下严格按照演绎方法（即公理化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使经济学能够象成熟的自然科学学科那样，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无论如何，这是对传统经济学“非公理化”方法体系的大胆革命。对这种革命，库氏提出了三大理由：

第一，一旦“假设”被建立起来，那么，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便已确立，进行纯粹的理论构建（逻辑推理及解释其结论）就成为理论研究的唯一任务。这时，切断“事实”渗入的一切通道，严格按照逻辑法则组合概念，形成结论，要求人们在方法上必须严格实施公理化方法。这“是主张经济理论采用公理化方法的主要和充分的理由”。

第二，公理化方法“节省思维”。据说，“有时，完全不同的经济现象可以用一些具有类似的甚或是相等的逻辑内容的假设来表示”，“推理本身只依赖于这种逻辑内容，而不依赖于对所用术语的种种解释。如果我们将推理与引导出推理的原始结构的背景材料分离开来，即让推理本身存在于记录中，这样我们便可节省精力，并且能够洞察各种形式上不同的事物的逻辑统一性”。显然，库氏在这里用“节省思维”表示公理化方法作为一种抽象方法的高度普适性。

当库氏把出发于同一事实的不同经济学理论看成关于同一事实的不同“思想模型”时，他还写道：这些不同的思想模型“试图以简化的形式来表示更复杂现实的各个不同方面。模型最初使这些方面易于分离，然后以更大的现实性组合在一起。每个模型由一组假设加以定义，从假设所表达的现实方面的需要出发，对假设的含义作出必要阐释。由于较简单的模型可能是更现实但也是更复杂的后来模型的原型，因此不能认为对这些较简单模型的研究是不现实的。从而我们可以将这些模型代表的成功推论看作是经济学的逻辑内核，看作是可获得的经济理论的仓库”。关于公理化方法普适性的这种说明，大体上也近似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原则，因而也是我们应予注意的。这一说明也揭示出，对同一

事实所建立的不同思想模型，虽彼此有异，但并非绝对排斥的，而是对同一事实不同价值观角度的展开，在说明事实中有互补性。这种看法也是可贵的。显然，公理化方法也是经济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原则的必要工具。

第三，“出于学科之间交流的考虑，也倾向于更明确地采用公理化方法”，因为，公理化方法在成为不同学科的通用方法时，将使各门学科对同一事实的不同思想模型仅仅源于“假设”的差异，即仅仅由于价值判断的不同。这样，这些不同的思想模型便可以在“杂交”中彼此补充，并形成对事实更全面的描写。

众所周知，公理化方法的一个最严密简练的形式体系便是数学。在指出数学工具对假设的根本依赖性的同时，强调数学在经济公理化方法中的巨大优势，是库氏对现代经济学数学化趋势的一个深刻的方法论说明。在他看来，数学作为“新工具使我们对较古老的或许也是基本的问题有了新的理解”，而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优化的意义正是在数学工具的支撑下获得的。可以说，这是库氏对数学工具在揭示市场能优化资源配置的实质时具有重大价值的哲学洞察，值得十分珍视。没有当代数学，便不可能深刻地印证斯密关于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而自动调节经济生活的直觉命题，也不会在中国出现全民共识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前提。这就更进一步突出了数学素养对于经济理论研究者的不可或缺性。我国少数政治经济学工作者，至今对于市场作为中性手段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难以从理论上深刻理解，恐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数学素养差。这是我们经济学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应花功夫克服。

三、在剥离“假设”和“推理”的结构框架中，通过公理化方法，从逻辑和数学上严格证明市场手段与优化资源配置的彼此关联，提出市场和计划作为经济机制具有超越社会制度的中性特征，是库氏在经济哲学上的又一个巨大理论贡献。

实事求是地说，库氏的这一贡献是西方经济学界几辈人努力的结果（参见拙文《西方学者的“市场和计划中性论”述评》），《三篇论文》只是“试图传达数理经济学某些最新成就的逻辑内容”而已。问题在于，此前的论者们未能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总结资源配置理论，而库氏却这样做了，而且总结得很有水平。

在给定的生产技术和消费者偏好下，如何将有限的经济资源分配于各种产品的生产，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就是资源最优配置理论的研究内容，而库氏也正是从这里“切入”市场经济研究的。他和他的先驱者一样，认定在任何社会形态下，资源配置问题及其优化，都是一个基本问题，因此，这是一个与社会制度保持相对独立性的问题；而资源最优配置问题的核心是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分类、评估和设计：在全社会的层面上，资源配置方式无非是市场方式（分散决策）和计划方式（集中决策）以及这两种方式的某种结合，这些方式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一一对应关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在于研究这种超越制度的抽象的资源最优配置理论，也包括从这种抽象理论上升为具体的“制度性安排”，等等。从这种归纳中，库氏明确提出，对市场和计划方式，只能在“超制度的资源配置理论”^④的范围内进行研究，不能再象传统经济学那样把它们与社会制度相混淆。务请注意，这是以当代数理知识为背景的以新的价值判断导向的对市场机制的崭新理解，是从根本方法论上对传统经济学的革命，也是新的市场经济哲学的奠基石。以它为主干的理论被授予诺奖，是完全应当的。

从上述基于当代经济事实的“假设”出发，库氏归纳萨缪尔森、阿罗等人成果，严格实

施公理化方法证明，对于“帕累托最适度”意义上资源配置最优而言，完全竞争的市场方式既是必要条件，又是充分条件（请注意，由于前提限定不同，因之还不能简单地说市场方式是资源配置最优的“充要条件”）。用库氏自己的话说，市场与最优“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说明，至少市场方式是形成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基础性方式。否定市场的理论，被彻底克服了。这种克服，不是象斯密当年提出“手理论”时那样，立论和驳论均缺乏严密科学性的支撑，而是以当代数学和公理化方法的高水平演绎为凭藉，对立面是很难驳倒它的。

在论证市场方式对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意义时，库氏从市场方式的决策分散化出发，一方面指出“分散化利用了市场体系中自发起作用的各种刺激（即物质和精神利益刺激及其变型——引者）”，另一方面又指出市场方式“进行资源配置时所取得的信息上的节省”，即“把决策分散在具有不同动机的成员之间”的方式只听命于“价格体系”的信号，无须由计划中心进行力不从心的繁复计算。这种归纳，至今还是我们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的基本思路。

无论是对市场还是对计划，库氏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分析的前提局限，因而坚决反对把前提限定随意取掉而使结论一般化的作法。为此，他还特意批评了哈耶克及整个自由主义无限夸大市场作用的观点，这种看法也是对头的。后来阿罗的“独裁原理”则进一步论证了市场失灵和政府调节的必要性，也是对库氏的弥补。

① （英）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汉译本；

② 王宪钧《数理逻辑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 贾林·库普曼《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商务印书馆1992年汉译本；

④ 库普曼《最优化概念及其应用》，见《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谭湛明

中西方经济限制比较分析

王志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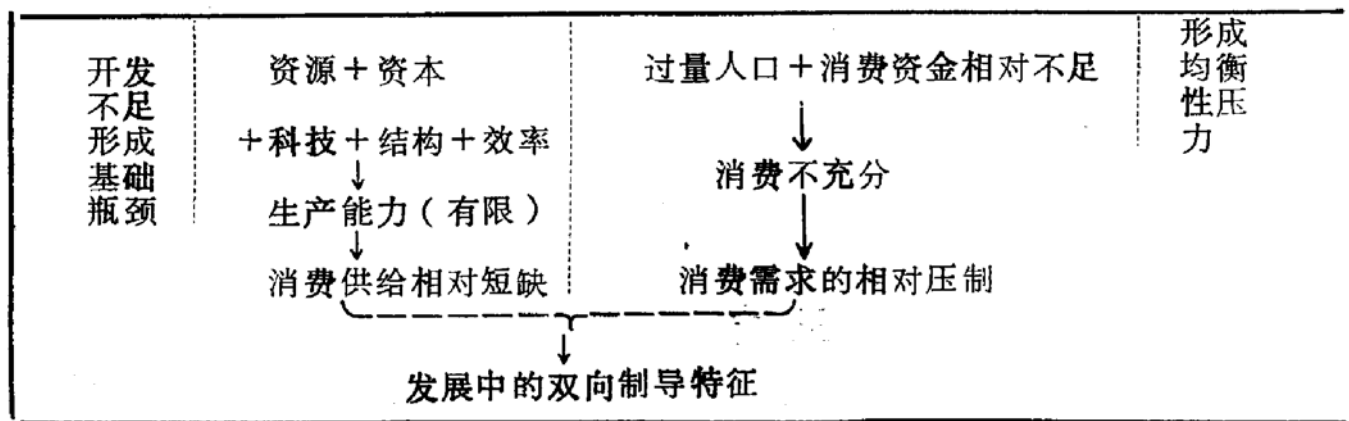
经济平衡分析宏观上主要应用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系统。在经济现实中，只有趋于平衡的趋势，难得实现短暂的平衡。是什么原因导致失衡状态的长期存在呢？而作为平衡杠杆，必有彼降此升或此降彼升的两种局面，经济失衡是否也一样呢？失衡必然是并轨而动的量的失衡导致的，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起着限制量的增长的不同步性呢？平衡趋向的平衡杠杆有承受限量，经济发展有没有相对终极限制呢？要解答以上问题首先必须从经济发展的限制来分析。限制因素的一般性与发展中环境造成的现实特殊性，造成增长量的不同步性和局限性，这是失衡的根源和终极局限的存在原因。

在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系统中，需求与供给是两个相对应的变量。它们的存在、发展、失衡和局限的出现在于它们成长机制中的限制因素的综合作用。

消费是需求形成的根本。限制消费需求这个变量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人口，消费资金，现实技术层次。人口是消费需求形成的决定因素，也是绝对的限制因素。人口量与潜在消费需求直接相关。消费资金是消费需求形成的重要限制因素。它决定于社会资本（金）分配结构的影响，是相对的限制因素。消费资金与消费需求直接相关。现实技术层次是消费需求极限存在的绝对的限制因素。另外人口与消费资金也是极限存在的相 关 因 素。道理何在？在宏观上说，人口量决定消费量潜在，而消费资金决定这个消费潜在的实现可能。而当人口量决定的消费量潜在小于消费资金实现可能时，人们就会寻求进一步的消费，若供给能力充足，这时技术层次的终极限制因素就会起作用，由此新的消费扩大成了不可能的事。这就出现消费饱和。当然在消费资金小于消费量潜在情况下，如供给能力超越，则会出现市场饱和。两个饱和一起构成经济饱和。此外还有一些特殊性的限制因素，如民俗、流通等。如回民不准吃猪肉，那么在回民区猪肉的需求就不存在了。而在一些地区由于商业流通不发达，有消费能力却需求能力跟不上。

生产是供给形成的根本。限制生产供给这个变量的因素主要有：资源、资本（金），科技、经济结构和生产效率。因为这些因素决定了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均衡现状，从而决定了消费供给的能力与结构。其中资源和经济结构是绝对的限制因素。特别地，资源与技术构成其终极限制因素。其实对于供给变量的限制在传统经济理论中认识是较多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经济结构造成的社会均衡现状对供给的影响。实际上，需求的多样性要求供给合理并均衡发展。如果生产结构失衡，社会均衡必然畸形，而最终供给结构不合理，这样反馈运作必然形成病态经济发展。因此生产必须适应消费需求才会最终形成合理的均衡的供给结构。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消费需求与生产供给的平衡系统，当前可用如下图式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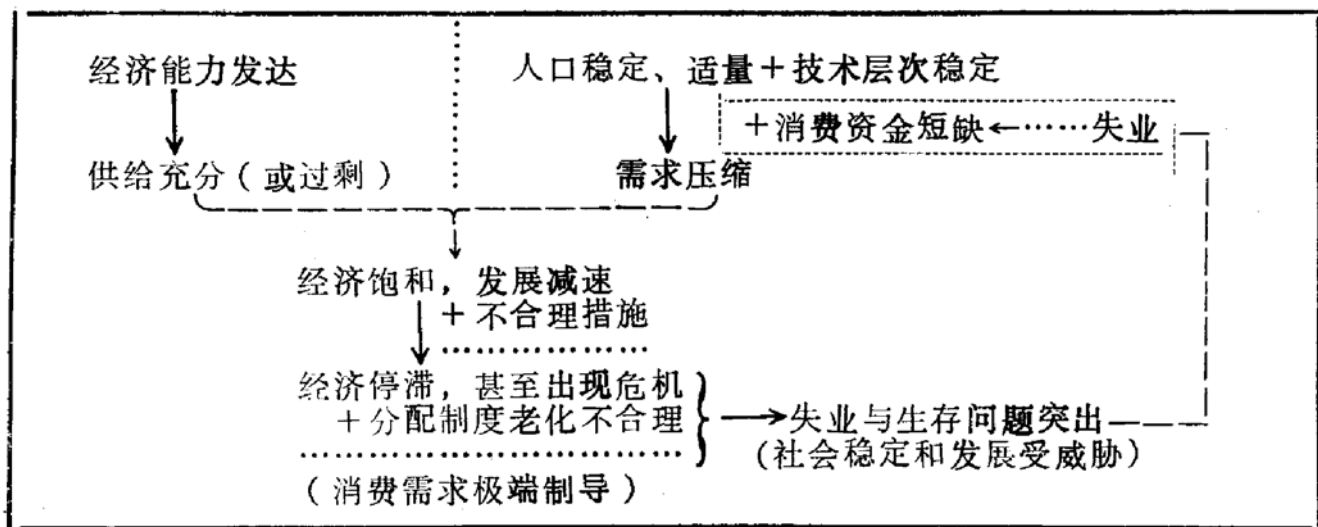
对于中国经济处于发展中的特征，供给方面受制于开发生产的总能力，而另一方面是结构不合理，此外还有效率效益低下。而对于长远点来说，资源的开发局限将更为重要。当然科技的发展、开发对以上各限制因素均有缓和作用。但是就目前来说远远是不能够的，这就决定当前供给方面仍是相对短缺的。这是相对于巨大的潜在的发达化的需求而言。由于结构不合理，其中又有其特殊特征：部分过剩与总体相对短缺同时存在。

而就需求方面来说，由于人口过量存在和增殖，加上经济不发达，资金资本总量的有限，另外发展要求高积累率，因而消费资金的相对不足是明显的。当然这是就人均而言，相对于消费潜在而言。这一方面是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又产生相当的压制作用，故而造成我们这个存在巨大市场潜力的经济大体系内需求的相对压制状况。

供给的相对短缺要求对需求的相对压制，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正好具有这种正常的现象，这是发展中的双向制导特征。但就这一系统并不是没有问题，在生产能力的形成方面，存在基础性的瓶颈特征。首先是资源的有限与开发，供应的不足。目前是后者为主，而长远点说，前者极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极大限制因素。其次是结构瓶颈问题，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历时已久，但积久的问题也非朝夕可解决，而且新的发展也产生新的问题。如加工工业的过剩与低效率浪费，交通运输问题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等。第二方面应该说在经济运行中体制的不合理问题，这其中有经济组织营运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和科研科技管理与开发等问题，体制的不科学，往往是造成供给与需求系统失衡的根源所在。另外在需求压力形成方面，存在“需求黑洞”问题。这是人口过量增长的可怕后果，中国只有在人口停止增长并有所削减情况下，在经济高度发达时也许勉强能填补这个黑洞，不然需求的压力和相对压制势将持久存在。在消费压力形成方面，也许比供给方面更易受到政策、体制的影响，如采用什么消费指导方针，如分配体制，如货币财政政策等等。

综上所述，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特征从供需系统来分析具有双向制导螺旋发展的特征，在存在问题上，其根源往往具有制度性特征，即历史沿革的制度缺陷是主要原因。

当前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经济上面临的问题更为棘手，因为它们将在新的经济基础上遇到新的问题，并且其经济调整也非一朝一夕可解决。目前西方的经济现状可用如下图式表示，



从图中特征来看，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其发达病。它们不短于经济能力，也不短于资金能力，然而照样失衡。其实这只是一种惯性作用的结果，该转弯时却还要往南墙上撞，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西方，经济是发达了，可是因为发达，消费却因自然能力的原因受到局限。这祸根当然是消费物品技术层次的稳定。由于经济从市场饱和上升到消费饱和，这并非开发市场的问题了，而是要在需求压缩这种不可改变的铁的事实面前保证经济的稳定良性运作。这首先当冲的当然是人口非产业就业化问题的解决，如不进行整个经济的彻底改造是不行的。如企业组织形式，分配制度，宏观调控。

如果西方经济进入图中所示的恶性循环，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然而这种后果的出现看来却已非人力短期内所能扭转的了。

以上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失衡的制导机制，从中可看出，对于中国来说，是双向相对的制导，而西方却是出现一元极端制导。双向相对制导可以相互适应平衡，然而一元极端制导，却只有绝对服从，此外对双方来说，都存在体制改革的要求。对于双方的调整可能性和危害程度比较来说，前者的经济调整希望较大，易于处理，不易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而后者则相反，其根源在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失衡是因为经济发展及由此而造成的综合力量的不同步变化而造成的。

作者单位：武汉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系
责任编辑：谭湛明

区域市场理论再探

张可云

从70年代末以来的国民经济与区域经济运行状况^①来看,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冲突不断,社会劳动地域分工体系不完全,国内区际开放程度不高,区域市场仍处在发育之中。在这样基础上建造全国统一市场不可能一蹴而就,完善区域市场是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必由之路,是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点之一。但目前人们在区域市场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并未取得共识,有些观点可能会误导实践。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一、区域市场界定

什么是区域市场?目前有几种说法:

(1)“区域市场是市场发育在空间上的一个表现形式,它是依据各经济区域的自然资源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商品交换的普及程度、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等多种因素所形成的交易活动在特定空间的汇集的一种市场形式”。^②

(2)“区域市场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全方位开放的交换关系和交易场所的总和”。^③

(3)“区域市场是建立在区域分工基础上的,以一定的区域单元和行政单元为依托,以区域内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充分利用区内外资源、发挥地区优势、发展区域间生产和流通协作、促进生产和技术进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市场空间组织形式”。^④

(4)“所谓区域市场,就是指商品交换关系以区域为活动空间的市场”。^⑤

上述概念分别从某一角度对区域市场作了解释。有的概念存在较大缺陷,如第四个概念将区域市场交换的内容仅限于商品,这是不全面的。这些概念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未对区域空间作明确界定。

界定区域市场这一概念,首先必须明确这里所指的区域是一国领土内的经济区。经济区有层次之分,一般研究的区域市场所涉及的范围只能是一级经济区,因为只有在一级经济区框架内才有可能形成相对全面的区域分工。一级经济区以下的任何级别经济区范围内的市场都属地方市场范畴。此外,区域市场中的区域只能是综合经济区(下面若不作特殊说明,区域即指经济区),而不能将规划经济区、问题经济区、部门经济区作为区域市场发育的区域框架,因为这三类区域框架中的任何一类都不可能覆盖全部国土,只为解决某些经济问题服务。总之,区域市场,其中的区域是有严格的内涵规定性的,是根据经济同质性或内聚性而识别的一级综合经济区。

市场不仅指商品交换场所,而且还包括生产要素、劳务、证券等交易场所;不仅指有形

的交易地点，而且还包括供需关系与买卖关系。因此，区域市场的内涵应为：根据经济同质性或内聚性而识别的一级综合经济区内的各种货物、劳务、有价证券等的供需与交易关系及交易场所。区域市场的外延较广，根据交易内容分，区域市场包括区域商品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产权市场、信息市场等；根据交易的时间结构分，区域市场包括现货市场、期货市场与远期市场。

在区域市场的内涵与外延方面，我想针对现存的几种认识偏差谈几个观点。（1）区域市场不等于行政区域市场。一种看法认为：“不论按照行政区划组建的市场还是按照经济区划组建的市场，都属于区域市场的范畴。并且，行政区域市场和经济区域市场，二者在一定区域空间范围之内统一安排和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加强横向经济技术联结、提高区际竞争实力与水平、推动区域性商品经济加速发展的作用等方面，都是基本一致的”。^⑥这种观点将区域市场与行政区市场混为一谈，会造成一定的负效应。在理论方面，会使人据此以为许多区域问题是由行政区间利益冲突引起的，因而反对先发育区域市场；在实践方面，各级行政区都将辖区内的市场建设当作区域市场建设，不注重与与其在经济上具有同质性或内聚性的其它地区的协调与合作，这有可能导致新的区域问题——地方交易场所的盲目建设。（2）区域市场发育是个系统工程，除商品交易场所建设外，理顺交易与供需关系、规范交易行为、深化分工与合作等都是区域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这些工作必须与交易场所建设协调进行。单纯强调交易场所的建设是对区域市场的误解。（3）区域市场完善的标志是一级综合经济区市场成熟，综合经济区体系内的低级经济区的市场成熟只表明地方市场的完善。区域市场的完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若干个地方市场的叠加。区域市场本身不象区域一样具有层次性。目前，我国通过各种形式组成的经济协作区与网络达100多个，除少数属一级综合经济区外，大部分由若干个行政区的一部分共同组成，这些区域不能单独担负起建设区域市场的任务，必须联合起来建设区域市场。（4）从长期变化趋势角度考察，区域市场边界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但不能因此认为区域市场的范围是模糊的。有人认为“区域市场在地域上有一定的范围，但这种范围或界限是模糊的，它会根据经济发展和主客观需要发生变异”。^①这类观点只注意到了区域市场边界的长期动态性，而未发现其一定时期内的固定性特征，因为社会劳动地域分工格局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识别劳动地域分工可明确区域市场的具体边界。

总而言之，区域市场具有经济性、区域性、综合性、互补性特征。经济性是指区域市场的形成由经济因素决定，受经济规律支配，自然、行政、法律等因素不能直接创造区域市场，而只能通过影响、规范与管理交易行为与交易关系而间接作用于区域市场。区域性是指区域市场是一定空间范围的市场，其发育过程不同于自发形成的小范围市场，也不同于地方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区域市场的发育与成长与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每个区域市场发育的具体步骤都带有其区域特色。综合性既指区域内交易行为与交易关系的综合性，又指区域范围识别的综合性。一级综合经济区以外的任何形式的区域都具有功能单一或分工体系不全的缺陷，不能作为识别区域市场的区域框架。此外，综合性还指区域市场要素的综合性，即区域市场活动主体、调控主体、中介组织、物质基础、规则等是相互依存的，必须综合协调地完善这些要素，否则，任何一项要素的缺陷都会阻滞区域市场发育。互补性是指区域内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在分工基础上形成相互依赖与合作关系，在平等竞争、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彼

此相互依存。区域市场是各种经济活动主体相互依存的中介。分工越发达，区域内的相互依赖程度就越深。

二、区域市场形成的基础

1、劳动地域分工是区域市场形成的先决条件。只有实现劳动地域分工，才可能产生地域间交换，只有存在地域间交换需求，才有可能产生区域市场。

分工是由人类的交换倾向引起的。区域分工一方面促进专业化地域的不断出现与发展，另一方面致使各地域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地域间相互依赖关系通过交换来体现，而交换必须通过市场进行。正是劳动地域分工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增长促使区域市场应运而生，没有劳动地域分工，就不可能产生区域交换，也就不可能有区域市场的发育。

同时，区域市场完善与否又直接影响到区域分工的程度。如果区域市场不完善，则区域内各地区不能通过交换顺利实现其优势产品价值，这意味着各地区无法获得购买其不能生产或生产缺乏比较优势但又是必需的产品的的手段——货币。交换关系中断会割断地区间经济联系，使劳动地域分工不可能进行下去。可见区域分工要受区域市场发育程度的限制。

总之，劳动地域分工完善是区域市场发育的决定性基础，而区域市场发育又会推动区域分工，包括区内分工与区际分工的深化；区内分工越发达，区域市场就越完善，从而推动区际分工，促进区际市场的不断完善，全国区域市场连接成网，最终形成有序的全国统一市场。

2、区域开放是区域市场发育的重要基础与条件。即使劳动地域分工格局已经形成，区域封闭或封锁也会妨碍劳动地域分工，因而限制区域市场发育。

一般而言，国内贸易不会存在关税与政治壁垒，但在开放程度不高的国家，区域内各地区及区域间往往存在许多经济、行政、法律等交易障碍。区域封闭与封锁产生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是不开放的表现，都会损害区域市场的发育。区域开放既要求打破封闭状态，又要求消除封锁。

区域开放包括区内开放与区际开放。区内开放指区内各地域单元间打破封闭状况与消除封锁，其表现是区内各级行政区间的生产要素、商品、信息等自由流动以及价格、投资、金融、财政等政策统一，但不一定要求区域间生产要素的完全流动与政策的统一（这并不意味着区域间封锁，区域间生产要素不完全流动与政策不统一可能是由于区际联系基础缺乏、区域间距离过长、区间差异过大等）。只有在生产要素、商品、信息等在区内能完全自由流动且价格等政策统一之后，才可能产生普遍的交易关系并形成交易场所，从而形成区域市场。区际开放指全国各区域间相互开放，贸易障碍完全不存在，其主要表现是全国各区域间生产要素、商品等自由流动以及市场机制普遍发生作用。区际开放是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前提，又是区域市场不断完善的保证。即使区内普遍开放，区际开放程度始终不高也会扭曲区内分工与交易，从而阻碍区域市场进一步发育。为此区域市场发育既要求区内开放，也要求区际开放。在区域市场发育初期，区际开放主要是防止区域自成封闭体系。

3、地方市场发育状态良好是区域市场完善的前提与现实基础，是市场空间拓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

地方市场是区域内某些或某一地域的交易关系与交易场所的总称。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

家的市场发育过程来看,市场空间拓展一般分四个阶段,即小范围市场、地方市场、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地方市场是由若干个小范围市场经济一体化而形成的,又是区域市场的组成部分。地方市场的空间范围有可能只包括一个行政区,也有可能包括几个行政区或其中的若干部分。国内有些学者将地方市场与区域市场对立起来,认为地方市场是“行政机关界定人为形成的市场。这种市场通常是地方政府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结果,是地方政府人为地在局部范围内用行政力量控制商品和要素的流入和流出而形成的”。^①这种观点错误地理解了地方市场的实质。首先,地方市场是区域市场发育的前奏,而不是对区域市场的否定。地方市场与其它市场空间形式一样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与产物。用行政力量控制商品和要素的流入流出根本就不可能形成市场。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将地区封锁与地方市场等同起来,并由此而导出消除地方封锁就必须消除地方市场的错误结论。其次,这种观点没有注意到一个区域内几个行政区或其中若干部分所共同形成的市场空间也属地方市场。目前,我国已存在的跨行政区经济合作组织所推动的市场建设大部分属地方市场建设范畴。而这种观点的提出者将这类市场定义为“区域共同市场”,并认为组织这种形式的市场会导致“贸易转向”与“国家统一政策受损”二种负效应。其实,这种所谓区域共同市场乃地方市场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与地方市场相对应的概念。这种形式的地方市场的发育的主导因素仍不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组织工作只不过是顺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对这种市场发育起推动作用。将区域市场与“区域共同市场”对立起来无异于认为区域经济合作会产生负效应,这同样是不正确的。总之,地方市场与区域市场的关系是市场空间拓展过程中前后阶段关系,是部分与总体关系。但必须注意,区域市场并不是地方市场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级综合经济区内所有地方市场一体化的结果。没有地方市场的发育,区域市场就似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4、经济体制完善是区域市场发育的体制保证。

市场经济体制从目标确立到体制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要做许多工作,比如规范各种经济活动主体以及各级政府行为、健全各种市场规则与政策法规、建设市场联系的基础设施、树立竞争、合作、开放的市场意识与观念等。而这些也正是区域市场完善所必需具备的。即使体制目标已经明确,若不尽快完善体制,也会妨碍区域市场发育。例如,在企业与政府行为不规范的情况下,企业运行受到大量非经济因素尤其是行政因素的干扰,地方政府会以地方利益的增长作为行为准则,这样,地区封锁不可避免。市场规则不健全、交通服务设施短缺、市场意识不强同样会招致封闭或封锁,从而阻滞区域市场发育。同时区域市场发育又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重要内容与标志之一。区域市场的发育会进一步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促进经济体制完善,而经济体制完善又会为区域市场完善提供宽松的环境与保证,两者相辅相存,共同促进。

劳动地域分工、区域开放、地方市场发育良好、经济体制完善都是区域市场发育的基础,四者又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任何一方面的缺陷都会妨碍区域市场的发育与完善。

三、区域市场的功能缺陷与区域经济调控

区域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完善的区

域市场能引导企业作出正确的区位决策,促使区域内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合理组合,能促进区域内与区域间分工不断深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能加强区域内与区域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与横向经济联系,活跃区域内外的经济竞争与合作,能加快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进程。此外,完善的区域市场还能对深化体制改革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应注意,区域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功能缺陷。

区域市场功能缺陷包括区域市场缺陷与区域市场失灵,区域市场缺陷指区域市场本身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带来的问题或表现出的不足,主要包括:(1)区域市场存在着反映滞后与不确定性,市场信号总是出现在供求关系之后,而且不可能全真。市场价格信号“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⑧市场价格信号反映滞后常常给长期经济行为带来困难,从而引发区域经济结构失衡乃至区域经济关系紊乱。市场信号不全与不确定会增大企业对风险的估计。在企业对某一项目风险估计过高时,尽管该项目具有相当大的潜在利益且对社会有利,企业也不会迅速作出投资决策。(2)区域市场缺乏反映区域长期动态发展的能力,其调节具有短期性。区域产业发展存在一定周期性,处在创新期的产业一般生产成本较高,生产率低,若不采取特殊政策对其加以保护而任凭市场自由调节,就有可能抑制其发展,因而限制了区域技术创新,使区域产业结构不能适时调整,区域经济失去长期持续发展的后劲。(3)区域生产的分工、集中与联合有可能形成垄断。完全的市场调节不仅不能自动消除垄断,反而会使垄断盛行,因为市场垄断可获取超额利润。区域垄断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或使企业丧失技术革新与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绝对的垄断有可能造成区域内垄断者欺行霸市,扰乱市场秩序。(4)区域市场本身难免黑市、灰市的流行以及诸如权钱交易、偷税漏税、走私、地方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等“寻租”行为。市场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获利,因此,市场机制本身不但不能限制反而在规则与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会助长不合理的获利行为。区域市场失灵是指区域市场对某些问题鞭长莫及。其一是不能反映区域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与收益。某些非竞争性的区域经济活动,如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其规模经济要求大,外部效果明显,个别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与收益相差较大,区域市场反映不出这种差异;有些资源利用量大或对环境影响较大的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与收益也不可能通过区域市场直接反映,如在流域内的林业部门的直接收益(个别收益)是林业收入,但其间接收益包括涵养水源、改善环境、河运与灌溉等多方面的收益。这些收益若得不到反映,则会影响林业生产积极性。其二是不能保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区域社会总供给等于生产部门劳动者收入+经济剩余+信贷收入-信贷支出+输入-输出,社会总需求等于消费+投资+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输出-输入。区域市场经济活动主体众多,每个主体的投入与产出都通过区域市场调节,但不能保证区域社会供求关系自动平衡。其三是不能自动消除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保证充分就业等区域社会目标。在区际经济差距较大的国家,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往往是落后地区陷入“贫困恶性循环”,文化水平低、缺乏专业生产技能的人沦为失业者。这种现象与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人民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要求背道而驰,会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形成。

可见,区域市场在调节区域经济发展时存在一定的局限,而且这种局限不仅会引致许多问题,而且会影响甚至破坏区域市场本身的发育。因此,必须设法弥补区域市场的缺陷与不足。一般认为,必须将市场与计划结合起来。就区域经济运行而言,也就是要在发挥区域

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加强区域经济调控。区域经济调控的主要直接作用是纠正区域市场缺陷与弥补区域市场失灵，它与区域市场是保证区域经济合理运行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市场与区域经济调控的不同性质和不同作用范围。区域市场调节是以区域价格为机制，以获取个别经济利益为动力的一种自动的、直接作用于区域经济运行的调节，它局限于经济领域。区域经济调控是各级政府职能的一部分，它是在认识区域经济与区域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以区域规划、区域经济政策、行政规定、法律等为手段，以区域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为目的的一种主动自觉的、间接作用于区域经济运行的调节，它的作用领域不严格局限于经济领域，有可能是社会、国防、政治等领域。区域经济调控的主体是各级政府部门。明确界定与规范各级政府的调控权限与职责是合理调控区域经济的首要前提。

政府调控区域经济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区域市场难起作用的领域，概括而言有两个方面：一是纠正区域市场缺陷，包括规范市场行为规则、提供市场信息、监督市场活动，预防与打击投机、垄断与寻租活动等；二是弥补市场失灵，主要包括组织与制订区域经济规划与政策、协调区际关系与供求平衡、防止区域经济大幅度波动、组织基础设施与外部经济大的部门的建设、保护区域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等。为保证各级政府有效地履行其职能，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划分、各级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及地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

目前，妨碍我国区域市场发育的因素还较多。由于区域市场发育的核心动力是经济利益，为此，明确获利机制与规则应是我国区域市场发育的基本着眼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完善区域市场的对策框架概括说来是：以明确获利机制与规则为中心，不断完善区域市场形成的基础，在充分发挥区域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加强区域经济调控，逐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区域经济运行体系。

-
- ① 张可云，中国区域经济调控体系研究，《学术研究》1993年第1期。
 - ② 赵效民、贾履让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年。
 - ③ 王奇华、沈乐等，关于首都及其周围地区区域市场的考察和发展对策，《北京研究》，1991年第3期。
 - ④ 蒋清海，关于区域市场的理论分析与现实思考，《经济问题探索》，1992年第5期。
 - ⑤ 陈乐一，区域市场与统一市场，《经济问题》，1993年第3期。
 - ⑥ 刘宇、郭晓鸣，论区域市场的几个理论问题，《市场发育与价格改革》，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
 - ⑦ 徐华，区域和区际共同市场：打破地区封锁的途径探讨，《中国经济问题》，1992年第4期。
 - ⑧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P394，人民出版社，1975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郑英隆

论健全市场中介组织

李保民

近十几年来,我国在国民经济管理中,根据政企分开原则,逐步减少了国家的行政干预,同时逐步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呈现出向市场经济体制渐次过渡的局面。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和盲目竞争;一些企业为追求高额利润,盗用他人技术、专利、商标,生产假冒商品;各种形式的“贸易大战”此起彼伏,给许多企业和社会经济带来危害;外贸企业外销竞相压价、自相残杀;在股份制企业改造过程中,对国有资产低评、低估,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等。随着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诸如此类的问题还会更多地显现出来。事实表明,放任自流的市场竞争伴生的是混乱无序,而在市场化变革进程中,单纯靠政府的宏观调控也很难使市场经济有序运转。在发展以构建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怎样使宏观管理和微观经营两个层面有机地衔接起来,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我认为,积极引导、扶持和规范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在宏观管理层和微观经营层之间,即国家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和完善中观协调层,使之起到承上启下的媒介助控作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选择。

中介(meso)即客观存在于宏观(macro)与微观(micro)之间的中观协调层。中介组织是指介于政府与企业、社会基本单元之间的社会组织。它具有独立性、自主性、服务性等特点,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居助控地位,起服务、协调、公证、监督的纽带作用。

目前在我国,市场中介组织存在的形式主要有:(1)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公证、仲裁机构、计量与质量等监督检验机构等带有法律性质的服务监督机构;(2)经纪公司与经纪人、资产评估中心、信誉评估中心、投资促进中心、结算机构、商务信息咨询机构等为交易双方提供各种服务的机构;(3)各种行业协会、商会、消费者权益机构等行业自律管理和服务的机构;(4)广播、电影、电视、报刊、杂志等一切可传递经济信息的新闻媒介机构等。

归纳起来,市场中介组织主要有五种职能:

1. 服务职能。市场中介组织在服务功能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其首要任务就是向社会、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包括信息、咨询、法律方面的服务;组织对企业人员的专业培训服务;沟通国际联络渠道;开展调研活动,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行业规划或技术经济政策提供依据;组织项目论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智力和资金,开拓国内外市场,实行产供销配套咨询服务,等等。

2. 协调职能。中介组织作为政府与社会或企业之间的组织,对社会或企业具有较强的联结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介组织使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产生自动调节的可能性,

还可以避免某些矛盾的激化，并为政府实现宏观调控和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在商会、协会内部，要维护会员之间公平竞争的权利，如在原材料、生产标准、市场划分、销售价格、竞争手段等方面对会员进行必要的协调，反对不公平竞争，甚至制定一些行规或公约，进行集体的自我约束，保证正常的生产和销售秩序。

3. 纽带职能。即成为沟通企业与政府之间双向联系的纽带。商会、协会可以接受政府委托，执行一部分管理职能，但更多的情况是引导其会员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贯彻政府的宏观管理意图和经济政策，敦促会员遵守国家法规和职业道德等；与此同时，又代表企业的利益，反映企业的要求，向政府提出建议。中介组织作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联系和对话的渠道，与政府部门相比，它主要是在一些更为具体，更为专业化的领域发挥作用。由于中介组织处于政府与社会或企业之间，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因而它的沟通途径更为流畅，方式更为切合实行，效果更好。

4. 公证职能。中介组织的性质、地位及其自身的生存、发展，决定了它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既要政府对政府负责，也要对企业、对社会负责，具体充当公证人的角色。

5. 监督职能。在政府转变职能过程中，市场替代了政府转移出来的部分职能，企业只由少数综合部门进行间接管理，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监督，需要某些中介组织来进行。

综观世界各国，越是商品经济发达、生产社会化程度高的国家，商会、协会等中介机构越普遍，其职能也越复杂、越完善。这些商会、协会机构组成一个庞大的中观协调体系，在商品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商会、协会外部，代表会员们的利益，协调同其他商会、协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这方面的职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和西欧各国，作用显著，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以前那种盲目竞争、“大战”迭起、皆蒙其害的局面；促进制止不正当竞争、反垄断等等法律的实施。

再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现代化通讯技术的进步，使社会分工变得更为精细，各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显著增强，它们在联合中竞争，在竞争中发展，形成一种自身利益系于伙伴成功的新型关系，商会、协会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担当起协调、联合、促进的作用，有助于企业自我约束，参与公平竞争。

从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看，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系衔接已成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政府对企业进出口贸易的直接行政干预将大大减少，海关税率将实行减让，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将与外国同行业进行面对面的竞争和直接的合作。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国内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加入到世界市场中去，但这些企业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国际市场如何运作所知甚少，国外没客户、销售无渠道，在对外活动中自我协调性还很差。运用商会、协会的自身服务职能，可以把国内外企业联系起来，协助、扶持、引导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探索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实现以间接调控为主的新的宏观调控体制，实际上包含着强化中介协调层的要求。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的程度是以市场发育为基础的，市场发育必然推动中介组织的发展。据了解，深圳市已有由编制部门管理的中介机构70余家；市民政局登记的“社团性”中介组织150余家；市工商局注册的“经营性”中介组织60余家。辽宁省现有各类中介性组织机构1200余个，包括律师事务所约150余个，会计师事务所31个，审计事务所139个，资产评估中心55个，以及技术咨询服务中心130余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我国市场中介组织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相对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所提出的迫切需求来说则显得极不相适应:

1. 从整体上看,市场中介组织数量明显不足,一些急需建立的中介组织没有建立起来;已有的中介组织发展不平衡,许多组织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如资产评估中心;已建立的中介组织,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数量也远远不足,分布很不平衡。

2. 从地位上看,我国目前中介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等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中介组织大多是由行政机关采用行政手段建立的,直接依附于行政机关,接受行政机关的领导,其经费大多由财政拨款,实际上成了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在管理方面,大多把中介组织作为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来对待,定级别、定编制,拨经费,直接管理中介组织的人、财、物,严重限制了中介组织的自主性和专业性作用的充分发挥。

3. 人员素质不高。目前,我国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大都未经过专业训练,人员素质不高,专业人员短缺,相当一部分从业人员是已办离退休手续的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的职工,人员老化状况突出,严重影响了中介组织的服务质量和效果。

4. 从管理上看,一方面,有关部门对中介组织的管理和监督薄弱,没有形成独立运作机制;另一方面,一些中介组织自律性不强,未能很好地为社会做公正服务,发挥维护正常经济秩序的作用。这次中诚律师事务所为长城机电公司出具假证明一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问题。

针对这种现状,根据政府机构改革的总体框架和培育发展市场体系的要求,我国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应采取以下对策:

1. 确立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的基本思路。市场中介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要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因此,中介组织的发展需要统筹规划,不能一哄而起。由于市场中介组织赖以立足的社会基础的发育和成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发展的步骤上注意使中介组织建设与政府职能转变同步进行,在政府职能转由市场替代的同时,建立相应的市场中介组织,并以作为载体;优先、重点发展一批与经济关系较为密切的中介组织,如职业介绍所、资产评估事务所、项目咨询公司等等;在发展的方式、方法上以社会办中介组织为主,政府扶持为辅,自主发展、自生自灭;从现实出发,对已经存在的市场中介组织进行改造和优化,实行改造与发展同时并举的方针;从长远看,中介组织不应定编制、定级别、给经费,但在发展起步阶段,需要在政策上给予中介组织必要的扶持。

2. 加速政府自身职能的转变,为中介组织的生长提供空间。当前,要彻底转变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理和资产管理职能,加速政企分开的步伐,确立企业独立的地位和利益。同时,加快精简机构的步伐,把一些应该由中介组织来承担的社会事务移交给中介组织来管理。积极地有重点地扶植一批与政府职能转变密切相关而又是社会和企业所十分需要的中介组织。例如,针对金融、财政和税收体制的改革,可以加速发展一批起中介作用的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中心。根据经济核算的要求,应当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凡未经法定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财务帐户,税务机关和银行系统可以不予受理。

3. 支持和引导市场中介组织独立运行。当前,要想让中介组织充分焕发活力和发挥作用,最突出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让中介组织独立运行,在发展中完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

二元机制的失灵及其“非凸组合”之谜

邹东涛

在本世纪20年代之前，世界上凡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都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是远离市场之外的。这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对于调动微观经济单位的活力和效率，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它创造的生产水平比过去历史上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但这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实现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残酷剥削、经济垄断、外在性、失业、严重两极分化、劳动群众没有社会保障、周期性经济危机，等等。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的历史是以血与火的内容载入编年史的。尽管它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人们对它的鞭挞总是大于赞颂。这些社会问题到本世纪20年代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出现了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于是，在30年代之后，出现了对市场经济的双重否定。凯恩斯主义从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方面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作了否定，而发轫于苏联，二战之后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政府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则

求政府部门摆正自己与中介组织的关系，使中介组织独立于政府，政府与中介组织不存在直接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政府可以委托中介组织承担某项社会事务，但不得干预其具体的事务活动，防止变相的直接行政管理或“翻牌公司”，逐步形成政府与中介组织之间委托与被委托的新型关系；政府应该实现由唱主角到当配角、由包办到协办的角色转换，为中介组织的独立运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鼓励和引导市场中介组织扎根于社会。依法通过资格认定，依据市场规则，建立自律性运行机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通过为其所代表的对象提供优质服务来增强活力，引导和鼓励有条件的中介组织把对内服务与对外经营结合起来，以解决中介组织的经费问题，同时加强其与服务对象之间的联系和相互需求，从而促进中介组织向独立运行方向转化。

4. 依法对市场中介组织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在中介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必须对中介组织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这种控制和监督必须依法进行；要彻底扭转把市场中介组织当作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来管理的传统作法，建立一套适合其特点的管理方式、方法；要明确市场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职能和权限，并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组织制定《中介组织条例》，进一步明确中介组织的性质、宗旨、地位、权力和义务，使其既受法律保护，又要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同时，建立起中介组织的自我约束机制，以国际通行的工作规范，建立和扩大与世界其它国家市场中介组织的联系；建立一套完善的培训和考核制度，努力提高中介服务人员的素质，形成遵纪守法，遵守职业道德的良好风气。

作者单位：国家体改委

责任编辑：郑英隆

对市场经济作了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体现在建立之初的一段时间，曾对推动经济发展和铲除社会的弊端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60年代以后，普遍出现了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的严重问题。差不多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又普遍出现停滞膨胀。于是，人们又惊呼“政府失灵”和“计划失灵”！

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效率和活力，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又伴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称此为“市场之谜”。没有政府和国家计划，就没有经济秩序和社会公正，而政府过多的干预和过于集中的计划管理，又出现低效、滞胀和官僚主义，人们称此为“政府之谜”和“计划之谜”。

那么，促进社会经济有效、有序、公正、高速发展的主导力量是什么？曾一度形成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一种是市场经济派，一种是政府干预派。两派观点曾长期论争。但这种论争不是两军对垒，以一方战胜另一方为终结，而是互相吸收和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了一个共识：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早已被历史所淘汰，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和过多的政府干预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既具有完备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又具有适度政府干预和科学计划指导的现代市场经济，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

经济学家从理性的角度对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的有效结合作了充分的分析。人类社会首先不能没有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和集中计划相比，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 (1) 能够使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 (2) 能够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
- (3) 能够更好地提供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和贯彻经济增长的目标；
- (4) 可以提供广泛的信息，并且信息的成本不高；
- (5) 可以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

而对“政府失灵”和“计划失灵”，经济学家们也作了深刻分析：

(1) 国家干预和计划管理是政府官员对权力的运用，但政府官员也具有“经济人”的特征，其行为并非都是崇高的，其动机并不必然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因而政府决策并不必然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2) 制订正确的计划和进行正确的干预需要有充分可靠的信息，而政府掌握的信息往往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失真的。

(3) 实行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客观上要求大量举办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缺乏内在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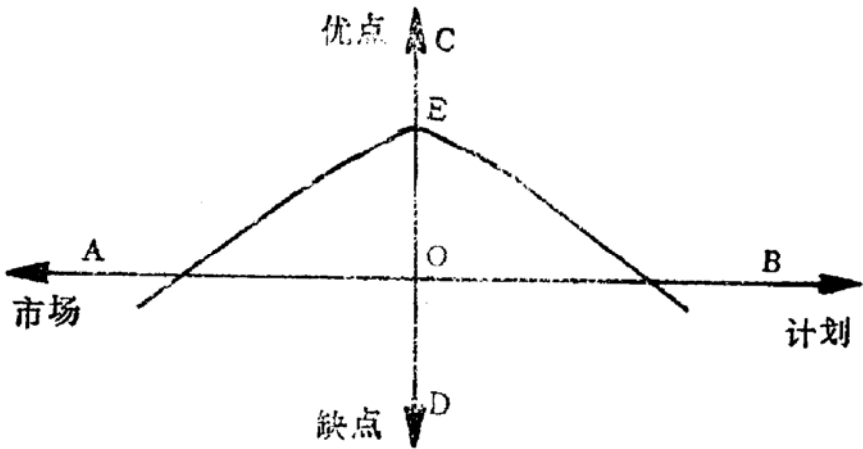
(4) 实行经济计划化和政府干预客观上要求决策权力集中，而权力的集中则会导致权力滥用和滋生腐败，引起群众不满而积极性下降。

(5) 经济计划化与“思想国家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而“思想国家化”则会导致蒙昧主义，从而使社会缺乏生机和活力。

由于“政府失灵”和“计划失灵”，60年代以后，在全世界形成了经济改革的浪潮，改革的基本点和大趋势虽然是扩大市场机制，建立、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缩小政府干预和计划调控。但是，却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放弃政府干预和计划调控，彻底回到20年代之前那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特别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完全的市场经济一直持审慎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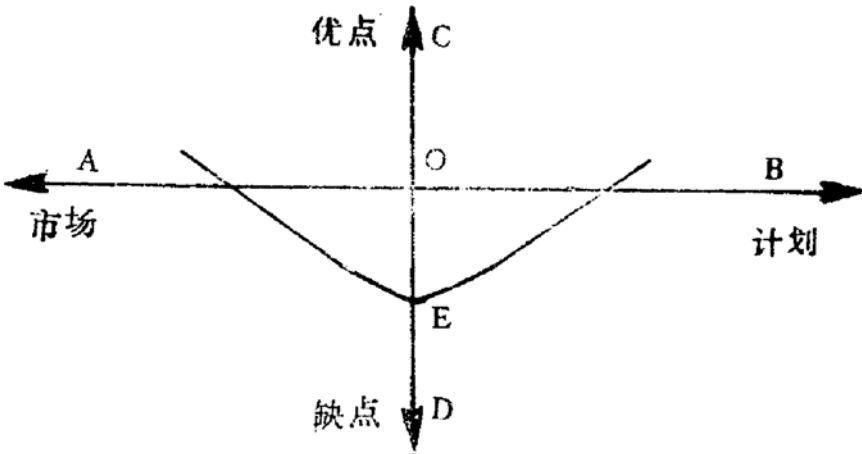
而是强调二元机制 计划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相结合。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一直把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加以坚持，改革中实行二元机制相结合，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因而改革的原则是：引进市场调节，但不放弃计划经济。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把计划经济当作敌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它们对原有市场经济体制的调整也是实行二元机制相结合。人类社会在二元机制相结合这一点上找到了共同点。然而，不同的国家实行二元机制相结合的实践结果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运用二元机制调节经济的有效性证明是非常合理的：市场机制有优点也有缺点，计划机制同样有优点也有缺点。完全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点大于优点，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完全的计划调节会使计划的缺点大于优点，从而导致“计划失灵”。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市场则万万不能；计划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计划也万万不能。当二元机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计划的优点会克服市场的缺点，市场的优点会克服计划缺点，从而实现计划和市场二元机制的最优组合，即“凸性组合”。这可以通过下图得到说明：



在上图中，OA方向代表市场机制的强化，OB方向代表计划机制的强化，OC方向代表优点的增加。OD方向代表缺点的增加。随着市场机制单向加强，其优点会减少，缺点会增加；随着计划机制的单向加强，同样其优点也会减少，缺点也会增加。当二元机制结合在一起时，其缺点都被克服，功能达到最优点（即凸点）。

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二元机制结合的结果并不象理论分析的那样理想化。当二元机制结合时，出现的并非上述结果，而是相反的结果；市场的缺



点抵销了计划的优点，计划的缺点抵销了市场的优点，从而出现了二元机制的缺点最大化，即“非凸组合”。这可以用上图来表示：

二元机制的“非凸组合”正好概括了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出现的共同现象：在引进市场机制之后，效率并未得到应有的提高，反而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普遍混乱。用中国的话说，就叫做“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二元机制的“非凸组合”几乎困扰着所有发展中国家，也困扰着中国，使这些国家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并非所有国家都出现了二元机制的“非凸组合”。耐人寻味的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在引入计划机制后，却并未出现“非凸组合”，如法国、北欧、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它们都制订政府经济计划，这些计划都对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就要从体制本位论的角度分析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关系。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二元机制本身，而在于二元机制相结合的体制基础：是以市场经济为“皮”，计划调节为“毛”，还是以计划经济为“皮”，市场调节为“毛”呢？二元机制相结合的体制基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以市场经济为本位基础上引进计划调节和政府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计划调节和政府干预都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另一种是以计划经济为本位基础上引进市场调节。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是不存在或很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也是不健全的。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凡是以市场经济为本位引进计划调节和政府干预的，一般都能较好的实现二元机制的“凸性组合”，而以计划经济为本位引进市场调节的，出现的则是二元机制的“非凸组合”。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为这种“非凸组合”所困扰，以致经济学家们把此称为“斯芬克斯之谜”和“哥德巴赫猜想”，甚至有的人提出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得三个“诺贝尔奖”也不为过。

实际上，二元机制“非凸组合”的根源，就存在于“姓社姓资”的思想理论之中，就在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打上了“主义”的“钢印”。在实践上，则表现为实行二元机制的结合究竟是以谁为“皮”，以谁为“毛”，以谁为“干”，以谁为“枝”。世界范围的实践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如果在计划经济之“树”上嫁接市场调节之“枝”，结出的只会是苦果；只有在市场经济之“树”上嫁接计划调节之“枝”，才会结出香甜可口的丰硕果实来。这正是解开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谜”的根本点。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责任编辑：谭湛明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潘嘉玮

全民所有制企业制度的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经过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租赁制的实践，最后，股份制以其不可遏止的态势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主流。对这一过程作一系统的回顾与思考，于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建设不无裨益。

(一)

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这一改革，由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诱发而起，以落实经济主体的“责、权、利”为内容和目标。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指导思想，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严格经济核算，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企业改革思路；1979年5月开始在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81年后又在企业中推行了经济责任制。

经济体制改革以企业的责、权、利为起点和突破口，是发展生产力，增强企业活力的客观要求。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独立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是基于其拥有一定的财产权，企业如果不享有财产权，自然就无所谓责任承担，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也就谈不上法律地位，从而不具有主体资格。但是在改革初期，企业的责、权、利被局限在企业与国家利益分配关系的范围内考虑。企业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企业能有多少权，就看国家（政府）放多少，且不说这些权利到了各级政府部门还大打折扣。确切点说，过去的改革未能从还企业独立主体的地位来考虑企业的责权利问题。这也是过去对企业的放权就象挤牙膏，企业的责权利总是在打架，权利不足以使企业承担起责任，责任也无从落实到权利上的根本原因。

随着扩大企业自主权与推行经济责任制的改革深入，我们终于触到了企业责、权、利的核心问题——企业产权问题。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所有权不可分割的传统观念，提出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在国家政策法规指导和调节下，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一认识使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企业终于从作为完成国家计划的工具的附属地位中解放出来，其在商品经济活动中作为独立主体存在的“人格”——法人的身份及地位也开始得到了承认。但实际上全民所有制企业并没有随着法律的确立就真正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因为企业法律地位的确立，始终与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由于两权界限的模糊，企业仍无法摆脱政府的各种干预；政府代表国家对企业行使所有权似乎理所当然地可以也应当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样，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界在哪里？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是否得到落实，还关系到国家所有权如何行使，能否得到保障，这是企业两权分离改革实践中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企业的两权分界问题，直到1992年7月国家为解决《企业法》贯彻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颁布《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时也未得解决，这归根结底是产权问题。全民所有的理论与国家所有的产权结构在这里发生了矛盾：根据全民所有的理论，企业职工是企业的主人，那么企业的职代会会有权决定企业领导人的人选；根据国家所有的产权理论，企业是国家所有，那么，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理所当然有权决定企业领导人的选用。由此也涉及到企业的管理机制问题：到底谁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政府主管部门？企业职代会？企业以厂长（经理）为首的管理委员会？企业的经营权必须受国家所有权的制约还是受企业所有权的制约？显然企业没有所有权，所有权归国家，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是政府，企业的经营权必须受政府主管部门的制约。政企仍然不分，两权仍然纠缠不清。

（二）

1988年2月至5月，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条例》与《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对承包经营责任制与租赁经营的内容及承包、租赁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等作出了规定。承包经营责任制与租赁经营的推广，无疑使部分企业在一定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效益。但弊端也显而易见。1990年，随着第一轮承包结束，理论界对承包制的企业改革路子展开了讨论。虽然其中一部分人对承包制予以全面肯定，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承包制才能救社会主义”。^①但不少学者却认为承包制由于它本身存在的矛盾与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的最终选择。^②甚至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产权改革举步不前，承包制不仅未能实现其历史使命，反而因其内在缺陷而走向自我否定，失去其继续存在的基础。^③

确实，在实践中承包制并没有能使全民所有制企业真正成为具有自我改造与自我发展能力的经济实体，其原因在于：第一，承包制在把财产所有权保留在国家手中的同时，把国家完全排斥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之外，所有权与经营权是绝对的分离。所有权人难以监察经营者对企业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状况，而企业经营者由于对企业的财产没有所有权而处于一种漠不关心的状态，企业经营者通过种种渠道侵占浪费国家资财；国家为了保障其财产所有权不得不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对企业领导的任命、企业的重大投资、技术改造、联营等行使审批，这又使企业难以成为具有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能力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第二，以承包制为形式的两权分离，企业经营权的行使有明确的期限限制，由此制约了承包者的经营行为。承包者将尽可能充分使用其占有的财产，以在承包期内获取最大的效益。承包制本身制约了承包者，承包者不可能也不愿意扩大对企业的投资，因为扩大投资到企业的资产在承包期满后不能与原企业资产分割而归经营者所有。这样，即使是为了经营需要而必须进行的投资也会由于经营期限的考虑而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短期行为是承包制的必然后果，尽管所有权人总是企图通过合同制约承包人的短期行为，但成效甚微。第三，承包制仍然不能解决全民所有制企业财产所有权虚置的问题。企业的财产从理论上仍然是抽象地属于全体人民或国家所有，所有权的内涵大到包含了社会每一个成员，大到其外延只能落到一个抽象的主体——国家身上。抽象的全民所有或国家所有使企业财产处于“无主状态”，同时又使任何掌握有一定权力的人可以“国家”、“全民”的名义去占有、使用、处分企业的财产，在这样一种产权理论下实行承包制，结果是大量地衍生着假承包、包盈不包

亏、故意压低承包基数、政府主管部门或国家工作人员与企业经营者串通共同侵占国家资财等完全违背所有权运行规律的怪现象，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以承包制为载体的两权分离，其结果或是经营权侵犯所有权，或是所有权处处掣肘经营权而陷入困境。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企业的产权结构模式。在以“国家所有”为形式的公有制企业模式里，实行“两权分离”不仅不能使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相反使企业陷入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相互侵蚀的怪圈中。因为，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是以企业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为前提的，也就是说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是在一个独立主体内的两权分离，而不是一个主体内分离出一个享有所有权，一个享有经营权（或叫企业法人所有权）的两个独立主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通过企业内部股东会、董事会与经理、监事会的设置，分别行使企业财产所有权的各项权能；两权并没有脱离企业而分离，企业财产所有权的唯一主体是企业法人本身，这种两权分离是相对的分、有机的分离。而我国现有国有企业的两权分离，其前提是企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这样，要把企业从国家手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显然是不合适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或者把完整的所有权交给企业，在企业内实行两权分离；或者仍把所有权完整地留在国家手中，由国家根据两权分离的理论经营管理。前者适用于大多数企业，后者则只适用于极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的企业。

（三）

股份制最初是一些乡镇企业为解决资金困难，以股份合作的形式筹集资金，改进经营管理方式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以后这种带有股份制特点的企业形式很快在乡镇经济中得到发展，并迅速地由乡镇向城市，由沿海向内地推进。1984年11月，上海电声总厂发起成立上海飞乐音响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我国三大改造后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带动我国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先行者。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及发展，表明中国企业改革已从放权让利进入到企业产权体制改革的历史性阶段。它打破了企业单一所有权的产权结构模式，形成了企业产权的多元化。同时，国家所有权通过股份制企业的管理机制，从企业外部进入到企业内部，以股东权、董事会等形式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从而开始逐渐摆脱来自企业外部作为国家所有权人代表的政府的行政干预。

随着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股份制所赖以存在的外部机制正逐步形成。1992年以来国家体改委等部门先后颁发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三个法规，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它标志着股份制企业正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主体的主要形式而获得其法律地位，并逐渐步入规范化发展的轨道。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入探讨相联系，对股份制的理论认识也应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正如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地与资本主义相联系一样，股份制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也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它与社会化大生产联系在一起，是建立在这种生产力之上的生产关系的组合方式。股份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的产物：“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④股份制使企业所有权由原来单一的投资主体逐步归于多个以至众多的投资人——股东。这表明，股份制正是

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而体现了生产资料由单个所有权人所有到多个所有权人所有，到由众多所有权人所有，而最终归社会共同占有的过程。至此还需明确三点：第一，将来社会共同占有以什么形式出现，股份制是否能继续承担这一历史使命，这是未来的事情，但以股份制为生产资料占有的重要方式却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到目前这一阶段所必经的；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股份制的发展被资本家阶级尽可能限制“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第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可以自觉地充分地利用股份制，实现现阶段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社会主义实践表明，在现阶段，国家所有(或叫全民所有)并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唯一模式。国家所有(或全民所有)在社会生产力还未高度发展到实现全社会所有并按需分配时，产权主体内涵过大必定造成产权落空，一方面国有财产实际上处于一种“无主状态”，另一方面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所有权人的地位也落空。由此发生的种种弊端已有目共睹，不必赘言。而股份制使企业产权通过股份形式掌握在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手中，是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其所有权人是具体真实的所有权人，其产权也就能落到实处。股份制是现阶段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共同占有方式。所以，目前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应摆脱国家享有所有权，企业享有经营权的思路，而应通过股份制使大部分企业的产权从国家所有让渡给法人、个人所有；对一些必须由国家垄断的行业或企业仍采用国家所有并直接经营的方式。否则，企业财产所有权会落空而导致整个社会对财产的严重浪费。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在于企业产权制度，而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创建则基于我们对过去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的全过程认识与系统思考。

①《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有效形式》，《光明日报》，1990年2月2日。

②黄燕：《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理论回顾与功过评述》，《经济科学》，1990年第3期。

③王珏：《跳出旧体制的框架，创立新的企业制度》，《改革》，1991年第1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7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

责任编辑：郑英隆

信息产业独立为第四产业的现实意义

李俊华

产业经济分析的目的是要反映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数量关系,揭示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以制定正确的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马克思为了对再生产过程作深入的研究,把物质资料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人们为了研究产业对各种资源的相关程度及其变化发展,把产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三次产业划分旨在通过分析三大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变动,揭示产业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四次产业划分法,简单地说,就是在三次产业划分的基础上,把信息产业独立出来作为第四产业,即依次是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因此,四次产业划分可以说是对三次产业划分的进一步深化。将信息产业独立出来作为第四产业是美国经济学家波拉特的一大理论贡献。他的研究表明,各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显示了这样的规律:伴随经济增长而成长的产业并不是笼统的第三产业,真正成长起来和有宽广前景的是信息产业。把产业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从更深层次揭示了产业结构发展的历史趋势,为以后的信息产业研究奠定了基础。

信息产业成为第四产业对经济发达国家有重要意义,对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信息产业独立出来成为第四产业显示了产业结构发展的普遍规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不能步发达国家的后尘,循序渐进地发展。在产业结构发展上,应当加速后次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度,获得总体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后起的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信息业的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是不可分离的。没有科技、教育、通讯、金融、信息技术设备产业等主要信息业的现代化,工业和农业等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信息产业成为第四产业有利于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加快信息化进程。建国以来,经过40多年来的艰苦奋斗,我国工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从1949年的28.7%,提高到1991年的73.5%。工业化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4%,这在世界各国是不多见的。我国当今工业化的内外环境跟西方发达国家当时的工业化相比,又有根本的不同。从内部环境来看,我国虽然总体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但是我们在许多领域都拥有一些世界先进技术,我们自己还培养了一大批建设人才,已经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外部环境来看,当今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步入信息化时代,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在其发展过程中,通过传统产业相互渗透及融合,可以大大改进传统技术,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我们要超越工业化这个历史发展阶段,而不能亦步亦趋,走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道路。正确的选择应当

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时并进。而在我国目前信息产业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更应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

第二，信息产业成为第四产业有利于提高我国劳动者的素质，增加劳动就业。我国劳动力资源约占世界劳动力资源的 $1/3$ 左右，但是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据1990年统计，我国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职工的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占38.2%，初中文化水平的占37.8%，高中文化水平约占20.1%，大学文化水平只占3.9%。

信息产业是以信息为劳动对象，由收集、传递、生产大量信息产品为目的的劳动部门以及直接生产信息处理工具和信息物质载体的部门所组成的新兴产业群。主要包括以下五大类：（1）信息收集部门，如信息中心，开发中心，图书馆等；（2）信息加工处理部门，如教育、科研、金融等；（3）信息传递部门，如邮电通讯、宣传出版、广播电视等；（4）信息服务部门，如律师、会计、专利事务所，人才交流中心、信息咨询等；（5）信息设备生产部门，如电讯、电子、广播、电视等设备生产部门。首先，教育是信息产业的重要部门，信息产业成为第四产业有利于突出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教育发展起来了，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才有可能。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其素质提高将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就业机会。此外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现代生活方式的推广普及和传统观念的深刻变革，从而有利于降低人口增长率，缓解就业紧张的状况。其次，信息产业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能够创造广阔的就业机会。工业发达国家信息产业的就业比重一般都在60%左右。再次，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取得发展的动力和扩大经济规模的基石。而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

第三，从自然资源角度来看，信息产业成为第四产业有利于我国从质能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我国是个资源大国，但人均资源数量却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的产业结构主要以“劳动力密集”和“资金与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较少。前两种产业需要较多的质、能，后种产业则需要较多的智力、知识和技术。因此从资源角度，前两种产业为主的经济可称为质能经济，后种产业为主的经济可称为信息经济。20世纪初，电话系统使用的铜是总生产量的4%—5%。今天电话系统用光导纤维技术，在一根玻璃纤维上可以通过几万路电话和几千路电视，每万公里光纤线路可以代替铜12,000吨，铅38,000吨，而且还具有通讯质量高，失真度小，保密性强等许多优点。况且生产100磅玻璃纤维电缆所需的能源，仅仅是生产1吨铜线所需能源的5%。信息技术、信息产品及信息服务的发展可以大大节约国民经济活动中各项基本资源的使用和消耗。我国人口多，资源压力大，且资源消耗、浪费、环境污染严重，信息产业成为第四产业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信息产业成为第四产业有利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对信息产业的重视，必将促进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具有应用范围广，渗透性强和先导性强等特点，特别是以微电子、计算机、光纤通信、传感器、软件工程、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先进技术正在成为决定我国技术进步快慢和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因素。其次，我国人才信息市场和技术信息市场刚刚起步，信息产业成为第四产业必将促进包括人才、技术在内的信息市场的发展与成熟，通过发达的市场信息，刺激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并使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再次，我国在技术引进中由于信息不灵而蒙受巨大损失这类例子并不鲜见；对国外

的技术发展动态不了解,往往出现以劣充优,受骗上当。因此,加快信息产业的发展对做好我国的技术引进工作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五,信息产业成为第四产业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首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政府在经济管理上要从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从直接管理转到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要实现这些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须突出在各种经济信息的收集、分析及有关信息的发布、反馈方面。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及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对政府有效实现其管理职能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都要求加强信息业的发展。我国现在的市场体系仍不够完善,集中表现在生产要素市场形成的滞后。我国正致力于发展包括生产资料、资金、技术、劳动力、信息、房地产等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显然,这些市场的成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落后的信息业能否有较快的发展。市场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发挥的程度如何,也跟信息有密切的联系。再次,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把企业推向市场,企业之间的竞争趋于激烈,信息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明显增强。

第六,信息产业成为第四产业有利于解决我国三次产业分类下存在的一些问题。据统计,1979—1991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平均每年递增超过10%,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8.8%的增长速度,但内部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1)商饮业迅速发展,1990年商饮业增加值比1978年增长2.6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30%,占第三产业产值的19.6%;(2)邮电通讯相对滞后,1990年每百人电话拥有量仅1.1台,装电话难的问题日益突出,而发达国家电话普及率达80%以上;(3)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严重滞后,1991年我国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劳动人数占总劳动者人数为3%;(4)教育、广播电视、金融、保险等部门发展不足,1991年教育、广播电视和文化艺术就业比重约为2.6%,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13.6%,大学生占适龄人口的比重为2.2%,金融、保险的就业比重约为0.36%,约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1.9%。产生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的原因,跟人们对第三产业概念的理解有密切联系。目前,普遍存在理解偏窄的倾向,谈论较多的是商业和生活服务业。其实,信息产业无论从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还是从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信息劳动和一般服务性劳动的区别来看,都不宜划入服务业。因此,信息产业独立出来成为第四产业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纠正人们在概念、认识上的偏差,而且有利于解决现实上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的状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郑英隆

论再造特区优势

刘文韶

目前人们对特区还有没有优势、能否形成新的优势，看法不尽一致。有两种看法颇具代表性：一种是习惯于躺在前14年深圳改革开放的成就及原有优势上，沾沾自喜，不思进取；另一种是缺乏信心，以为特区已不特，优势不复存在，因而特区的前景堪忧，难以有所作为。这两种认识都不利于特区事业的发展。不久前，深圳市委市政府以党的十四大精神为指针，结合经济特区的实际及其面临的新挑战，明确提出要“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再造优势、加快发展”的新目标。再造优势的提出，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要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作用的提法，对克服这两种片面认识，统一人们的思想，具有重要作用。之所以要再造优势，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承认特区原来的某些优势确有弱化甚至消失的迹象，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通过“再造”来强化已有的优势和创造新的优势。在对待优势的问题上，既不可盲目乐观，也不可悲观失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再造优势的提出，对于动员特区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加快建设速度，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什么是再造优势？再造优势与特区前14年原有的优势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必须从认识上搞清楚的。既然叫再造，就不是割断历史，不是否定过去，而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是对过去优势的继承和发展。再造优势，就是对优势的**强化，优化，发展和创新**。发挥优势、再造优势，两句话并提，就表明：发挥与再造是相辅相成的，是在发挥原有优势的基础上再造的，要在发挥中再造，在再造中发挥。

1. 再造优势就是对出现弱化迹象的原有优势加以强化，使深圳继续走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列，当好“排头兵”。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和对外开放度。

特区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是吃“改革饭”的，特区优势的核心，就是在改革进程中形成的体制与机制的优势，在全国改革大潮中，由于全国各地有新的措施出台，这一优势出现了相对弱化的迹象，我们应当推出新的举措来加以强化。理顺政府、市场、企业三者关系，做到政府培育市场，市场解放政府，政府解放企业，企业解放生产力。政府向企业放权，要放足、放够，不搞层层截流，不搞“横向转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要努力抓住理顺产权关系这一深层次改革课题，争取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领先一步，超前试验；大力推进企业兼并，产权转让和依法强制性破产等新动作，健全以产权关系为基础的企业管理体系；办好产权交易所，在产权界定明晰、产权进入市场流通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扩大开放度，是强化优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扩大开放度，并不仅仅是指引进外资规模的扩大，数量的增加，也不是通过竞相推出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商，而是要努力创造高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以形成整体的综合开放优势。一是进一步放宽对外商进入商贸、金融、旅游、邮电通信等领域的限制，真正做到全方位开放；二是把盐田港和深圳机场建成国际中

转大港和国际航空港，使之成为扩大开放的重要门户；三是努力办好福田、沙头角两个保税区，办好生产资料保税市场，服务范围从深圳的“三资”企业扩大到全国的“三资”企业，使深圳逐步形成类似香港的自由港功能；四是大力发展深圳自身的直接远洋贸易及与之相连的远洋运输，使深圳与国际市场的直接联系不断扩大，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不断增强；五是更大胆、更多地学习和借鉴国外特别是香港、新加坡的先进管理经验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通过这些强化手段，使深圳的开放度高于内地。

2. 对不够完善和配套的优势加以优化，使一些局部优势转化成一种整体的系统优势。需要加以优化组合的优势包括产业优势、投资环境优势和人才优势。

从产业优势看，深圳前14年已初步形成了较发达的外向型工业和第三产业，目前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减少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比重，推动“三来一补”企业的转型提高，把深圳建成一个新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在第三产业方面要努力培育和形成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大商贸、大金融、大中转、大通道的功能，优化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把深圳建成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建成全国重要的出口和转口贸易基地，建成具有强大吸引力的“购物天堂”、旅游热点。

从投资环境优势看，深圳要大力抓好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硬环境。近年内，随着东江第三期供配水工程、妈湾电厂一期工程等基础设施工程的完竣，深圳的水电供应状况将有较大改善；同时，随着快速干道系统的建设和一批立交桥、人行桥的建成，深圳交通拥挤和堵塞的现象将得到缓解，加之深圳高架铁路、轻铁、地铁等市内立体交通网络的规划和建设，将使深圳的交通状况得到彻底改善，这些将从硬件方面优化深圳的投资环境。此外，通过大力加强法制建设，转变政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也将使深圳的软环境得到优化。

从人才优势来看，深圳目前已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大批优秀人才，并已在实践中锻炼出一批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家。可以说，深圳在人才的数量、结构、经营才干等方面，已具备了一定优势。但在人才潜力的开发、人才激励机制的运作、人才的合理使用等方面，尚存在着不足，这就需要对初步形成的人才优势加以调整和优化，关键是要把已引进的各类优秀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让他们各展所长，人尽其才，有用武之地，尽量减少“高材不用”、“无才重用”等不合理现象；要重视和解决人才的培养和知识更新问题，考虑增设培养高中级技术、管理、经营人才的学校（或进修学院），为现有人才的再进修和知识更新提供必要的场所；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管理人才要给予重奖，进一步强化人才激励机制，使深圳的人才优势和人才潜力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3. 对发育不够充分、尚有潜力的优势加以发展，使它们尽快成熟和趋于完善。需要加以发展的主要是市场优势和“窗口”优势。

深圳的市场体系比内地发育得早，市场化程度也比内地高，但从总体看，深圳的市场体系还发育不够充分，有的市场如房地产市场还不够规范；有的市场如产权市场还没有充分运转起来，这就需要在培育市场体系方面花大力气，逐步健全和完善金融证券、人才劳务、科技、期货、房地产、物资和产权七大要素市场，形成更加规范的市场机制和 market 规则，造成一种总体的市场优势，从而为特区内外的所有企业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它们能真正凭本事在市场上比高低，创效益。

特区的“窗口”优势也是有待发展深化的一个重要优势。过去十几年，深圳利用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发挥了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重要作用，在那段时期，深圳的窗口作用及与之相连的窗口优势是别的城市所难以取代的。但是，随着我国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开放度的不断扩大，深圳的“窗口”优势相对削弱，要再造“窗口”优势，就必须发展其功能，增强其对内对外辐射力。具体讲，一是要使深圳从单纯的外引内联“窗口”作用扩展为联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枢纽作用和通道作用，作为国际大通道，它应形成双向流动的强大人流、物流和货流；二是努力使深圳对外联系和国际交往的“窗口”作用进一步发展扩大，使之直接与国际市场联成一片，融为一体，国内外客商可把深圳作为洽谈、招商和合作的理想地点，各种国际性商业活动（如接单、交易、结算、交割等）也都可在这里完成；三是加强深圳为广东服务、为全国服务的功能，使深圳的“窗口”优势在为全国提供更多更好服务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发挥。

4. 对原先尚未形成的优势要大胆加以创新以形成新的条件下新的深圳优势，这里主要包括立法优势、国际性城市功能优势和深港互补优势。

1992年，全国人大授予深圳地方立法权，为深圳在立法方面形成自己的特殊优势提供了基本条件。深圳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用好立法权，以期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基本法规框架，从而在立法和法制方面建立起先行一步的优势。

深圳国际性城市功能的逐步形成，将成为深圳的另一创新优势。与内地其它城市相比，深圳在地理位置、对外交往、外向程度、市场条件、人才条件等方面，都具有率先形成国际性城市功能的有利条件，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深圳完全可以建成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信息等的区域性中心，在建设国际性城市方面取得新的优势。

深圳在今后几年，还将面临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九七”香港回归，深圳面对香港的区位优势将得到更好发挥。深圳作为“一国两制”的联结点，与香港的关系将出现新的内容，进入新的层次。从趋势上看，深港新的合作对进一步密切两地经济的互补关系，促进两地的共同繁荣，对于深圳更好直接借鉴香港的成功经验来为深圳的经济建设服务，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深圳若能抓住这一重大的历史机遇，把深港合作推向新的高度，使深圳经济中的香港因素更加健康而稳定地发展，通过深港之间的互利互补和更高层次的合作，使深圳在未来几年形成它所特有的一种新优势。

再造优势，必须发扬“敢闯”和务实的精神。“敢闯”是特区发展的重要经验。特区过去优势的形成，离不开“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同样，我们今天再造特区的优势，更需要这种“敢闯”、敢于创新的精神，只有“敢闯”，才能在改革开放新的格局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提高，有所作为。

再造优势，还需要一种务实精神，也就是要求我们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把再造优势的宏大工程建立在准确分析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把“敢闯”的干劲落实到周密的规划和反复试验、摸索、实践的过程之中。总之，只要我们把“敢闯”的精神与务实的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敢于开拓进取，又善于真抓实干，就一定能把再造优势目标变为现实。

作者单位：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郑英隆

论明朝对澳门实施的外贸税制

杨 仁 飞

明朝的外贸税制极为复杂。朝贡贸易体制下的税制与市舶贸易下的税制有不同。即使在市舶贸易中, 明廷对广东与对福建的外贸税制规定又有很大差别。本文着重分析明中叶后足以影响明外贸体制的澳门外贸税制, 希望以此能理清明廷对澳门实施的外贸税制的发展脉络。

一、市舶司提举与地方官员协同负责澳门的对外贸易

市舶司制度是明一代外贸管理中的重要制度。明初全国有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广东市舶提举司设于明洪武三年(1371年), 设提举一人, 从五品; 副提举一人, 从六品; 其属吏目一人, 从九品, 统辖于广东布政司。明嘉靖以后广东市舶提举司提举驻守广州, 常派副提举一名至香山澳门, 负责这一区域的外贸与外国船货检查征收; 另一名副提举设于新会县。

市舶司职掌“海外诸番朝贡, 市易之事, 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 禁通番, 征私货, 平交易, 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①这一职权范围只是明中叶前市舶司所管辖的。随着私人贸易和商舶贸易的兴盛, 市舶司的权力渐被地方官吏所架空, 以致在明中叶出现这样一种局面: “其供应之节, 控驭之方, 掌于郡守; 犒待之仪, 贡输之数, 主于中官; 职提司者, 不过检视之而已”。^②即对外贸易中征税、稽核的职权落到地方官手中, 凡外国船只一到洋澳, 守澳官先查明情况, 申报海道副使, 再报广东巡抚、布政司, 由他们委派知县前去封籍、抽分。广东的情形更为严重。嘉靖中“革去市舶内臣, 舶至澳, 遣知县有廉干者往舶抽盘; 提举司官吏亦无所预”。^③在澳门情形亦是如此, 明庞尚鹏称“广州南有香山县, 地濒海, 由雍陌至濠镜澳, 计一日之程, 外环大海, 乃番夷市舶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贡, 附至货物照例抽盘, 其余番商私賫货物至者, 守澳官验实申海道, 闻于抚按衙门, 始放入澳, 候委官封籍。”^④霍与瑕明确指出“澳门番舶, 外国宝贝山积, 皆县官司其榷课”。^⑤

地方官权力过重, 必然出现中央与地方在外贸管理与税收上的矛盾。广东地方官员的官俸在明中叶时多从外国船只抽分的货物支付, 若贸易不盛, 广东地方即苦财政不足, 故他们想方设法要把外贸管理权掌握于己手, 从中将一大部分抽分收入留作广东地方使用。然而明廷绝不可能把利全让于地方, 在获取大量海外珍品外, 朝廷需广东地方按时上交一定的外贸税。为协调明朝廷与广东地方官府的矛盾, 双方都做了让步。明廷于万历之后不再派中官干预市舶司; 广东地方政府让市舶司官吏与地方官员共同对外国来华船只进行盘验、文抽, 对来华商人进行管理, 并向明廷交纳外贸税二万六千两(按来华船只多寡, 或有变更)。具体情况, 见于周玄暉《泾林续记》: “广属香山为海舶出入咽喉, 每一舶至, 常持万金并海外

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先报本县，申达藩司，令市舶提举同县官盘验，各有长例。”印光任，张汝霖在《澳门记略》中亦称“凡蕃船到澳，皆县令及守澳之备倭，市舶提举等人一起丈抽，如外商趁贸货物，俱赴省城公卖输餉，如有奸徒潜运致澳与夷，执送提调司报道”。

市舶司提举在明代官阶只列从五品，隶属布政司，这一规定使市舶司提举官微言轻。副提举从六品，比一般县官（知县）正七品仅高一级。由于广东地方政府在管理外贸上较有主动权，故有时朝廷亦委知县出任副提举，新会县便有例证。^⑥这样在管理上便出现市舶司官吏与地方官吏双重身份的情形。若遇到重大事件，市舶司官吏则协助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等官员解决，制定有关措施与条例，有效管理澳门的葡人。如1611年，有9艘抵澳的葡萄牙兵船拒不交纳船舶税，并威胁必要时将以武力对抗。广东官政下令封澳，迫使澳葡议事局代交付兵船4870两银子的船税。1614年两广总督张鸣冈、巡按御史周应期、海道副使俞安性及市舶司官员、香山县令等制定《海道禁约》，其中规定“禁兵船骗餉。凡番船到澳，许即进港，听俟丈抽，如有抛泊大调环、马骝洲等处外洋，即系奸刁，定将车船人货焚戮。”“禁接买私货。凡夷趁贸货物，俱赴省城公卖输餉……。”^⑦这两条规定是旨在保障明廷及广东官府的外贸进出口收入。这种协调、相容的关系，使明万历后对澳门外贸的管理上很少出现以前互相攻讦，互不相让的局面，使得明廷对澳门贸易的管辖行之有效。

二、明朝对澳门实施丈抽制为主的进口税制

明朝对澳门外商一直征收进口税，其特点在于1571年之前与后进口征税办法、对象有很大区别，前者称为抽分制，后者为丈抽制。

抽分制是一种以征收实物为主的进口税制。这也是明初贡舶贸易实行的税制。在明正统年间至弘治年间，明廷对朝贡国的贡物都没有抽分制。^⑧到弘治年间明廷始定“凡番国进贡，内国王、王妃及吏臣人等附至货物，以十分为率，五分抽分入官，五分给还价值。”^⑨

明正德四年（1509），广东开始准许非朝贡船入口贸易，镇巡官征其货物税以作军需之用。正德十年（1515）广东布政使吴廷举以“缺少上供香料及军门取给”为由，坚持“不拘年份，至即抽货”^⑩的做法。对非朝贡船实行随到随征的办法实际上已否定了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朝贡原则，使得葡萄牙人趁机而入，从而开始商品贸易的阶段。自此之后，明廷的抽分制服务于以征税为目的的外贸制度，从性质上与以前不同。

葡萄牙人自1535年前后开始到澳门进行贸易，1557年始获准移居澳门，外国船只均停泊于澳门南湾及内港。至1571年之前明广东政府一直实行抽分为原则的进口税制。

至于抽分的比例，并非固定不变。前面我们已提到明廷对朝贡船实行“十抽五”的抽分比例，即实际税率为50%。这一高比例实是明廷限制贡船私带货物。后多征以20—30%的实物税。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提到广东对非朝贡船的抽税原则为“以十分抽三，该部将贵细解京，粗重变卖，留备军餉”。

由于抽分制是征收实物的进口税制，在货币经济不发达时代，可说是一种方便的征税办法。然而到了明中叶，国内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通过国外贸易，外国的金银源源不断流向中国，丰富了国内的货币市场，这一切呼应着一场商品经济的革命。在国内，明廷实行赋税改革，实行以银代征实物的征税办法；在对外贸易中，开始实行以货币支付的丈抽制。

丈抽制于1571年实行。明廷在对外贸易中实行丈抽进口税制除时代需要外，还与当时抽分制下偷漏情形严重有关。当时以葡萄牙为首的外国商人“勾结中国奸商，报货奸欺，难于

查验”，前去抽分的官员又贪污严重，“额外隐漏，所得不资”，“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二三。”^⑩在此情形下，为确保税收来源，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明廷开始在外贸上实行丈抽税制。

丈抽法顾名思义即有丈、抽两种征收方法。“丈”是对船舶大小的丈量，所得之税，称为船税、舶饷，或“固定吨位税”。“抽”法即是对船舶所载货物征以从量或从价税。

丈抽的具体办法，明廷规定很明确：“每一舶从首尾两膀丈过阔若干；长若干，验其舶中积载出水若干，谓之水号，即时命工将膀刻定，估其舶中载货重若干，计货若干，该纳银若干。验估已定，即封藉其数，上海道，转闻督抚，得报征收。如刻记后水号微有不同，即为走匿，仍再勘验船号出水分寸又若干，定估走匿货物若干，赔补若干，补征税银，仍治以罪。号估税完后，贸易听其便。”

这一丈抽法是最原始的征收、查核办法。由于明中叶来澳门的贸易船只不断增加，明廷官员不可能对每一条船作逐一的长阔丈量，于是根据船只大小分为九等，后来因葡人多次请求，“量减三分”，^⑪以此作为船只入港的停泊税。

关于九等舶饷的记录，明史料记载不详，但我们不妨拿张燮《东西洋考》所记载的西洋船税与当时外国人所记录的船税作比较。张燮在《东西洋考》中提到福建等国内商人远航西洋（今南太平洋、印度洋）的船只要朝廷交纳船税，面阔1丈6尺以上者，每尺征饷5两，每多1尺加银5钱，一船最少征银80两。1丈7尺以上的征银93.5两，1丈8尺以上为108两，1丈9尺以上为123.5两，2丈以上为140两，2丈1尺以上为157.5两，2丈2尺以上为176两，2丈3尺以上为195.5两，2丈4尺以上为216两，2丈5尺以上为237.5两，2丈6尺以上为260两。而据17世纪初曾到澳旅行的意大利人马科·阿伏罗的记载，“葡国国王陛下在此城没有其他收入，除了征收所谓的航行贸易税外。因为中国皇帝已经在这里征收了所有其他税饷，如船只进港停泊要交停泊税，它是根据船只大小而征收的。如1只大500—600Candis的葡国船只要交纳500—600元葡币”。^⑫当时500—600元葡币约值500两银。一般国内出洋的大帆船载重量为600—800吨左右，而经常航行于里斯本—澳门—日本的葡萄牙大帆船载重量为600—1600吨。如果国内西洋大船每只要征收260两以上舶饷的话，那么一只大葡萄牙帆船要500两左右的舶饷亦可以理解了。

至于进口货物关税的税率，一般为10%左右。但珍贵货物税率则比较高。葡萄牙使者佩雷斯在他的《东方概述》中称，在澳门中国政府所征收的进口税，“胡椒税为百分之二十，苏木为百分之十五，其他货物为百分之十”。博克塞在《来自澳门的大帆船》一书中研究得出，在1623年澳门葡萄牙商人“全部支付给中国和澳葡当局的税项和杂费达到货值的27—28%之间”。^⑬其中澳葡海关征收约8%的税，10%的杂费是支付给从事丝货贸易的舰队船长，这样交给中国政府的进口税约为10%。

从这一货物税来看，相比抽分制时代抽20—30%的税，税率是比较低的。

然而尽管税率很低，但偷税漏税的情形十分严重。马科·阿伏罗指出“贿赂是存在的，丈量时，官吏总是粗略估量的”。^⑭而明人周玄暉亦称“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已。”^⑮

为此，明廷规定了澳门外国船货所要交的进口税以定额方式进行。在改抽饷银之初，葡萄牙商船及其他国商船每年要向广东市舶司纳饷2.6万两。1606年减去4千两，变为2.2万两。^⑯这笔定额是在澳门征收，由广东地方财库代管，然后呈送到明中央政府的进口税，

《广东赋役全书》记载“每年洋船到澳门，该管澳官具报香山县通洋布政司并海道俱批。市舶司会同香山县诣船丈抽，照例算餉。详报司道批回该司，照征餉银，各夷办纳餉银，驾船来省。经香山县盘明造册，报道及开报该司，照数收完餉银存库”。

为什么明廷规定进口定额税只有二万多两呢？原因在于澳门当时是一个国际转运港、葡萄牙商船将从东南洋换取的香料、白檀木、毛织物、玻璃制品运到澳门，但这些货物远远购不足中国重要的丝货前往日本、马尼拉。葡人要通过果阿—澳门—日本，或马尼拉—澳门—墨西哥等航线运载大量银元到澳门。如葡人每年从日本运走五、六十万两白银，最高时达100多万两。这大量的银两主要用于支付购买中国货物，因而一般到澳门的外国商船载货不多，明廷除征收停泊澳门港的船餉和少量货税外，在进口税方面并不对白银进口征税。这也就是明廷所征得的进口税不多的主要原因。

三、明廷对外国商人征收货物出口税

明朝对外贸易税制是实行出口税的。但出口税制比较复杂。问题是：澳门开埠后葡人交纳出口货税是以什么方式付交的？明广东政府是在广州或是在澳门征收的？出口货税有无定额？

明中叶以来，出口货物交易市场有时在广州举行，有时在香山县举行。广州出口货物交易会曾于1535—1559和1578—1631年这段时间定期举行过，其余的时间贸易集中于香山县的澳门。在广州，明政府设立一个税司专门征收出口税，由地方官吏履行职责。^⑧在香山澳门，出口税由香山县官员或市舶司代收然后交到广州税司。

明政府是要求葡商等交纳货物出口税。然而这一笔出口税多数时候并非由葡商交纳，而是由中国商人代交的。在1560年前后葡人要购买中国丝织品、丝货、瓷器等是直接由他们向中国官府交纳出口税，当时明政府没有专设一官员征收出口税，故当交易时，地方官吏迟至不至的现象时有发生，葡萄牙等外国商人不愿等待，未经纳税就私自进行贸易。嘉靖年间明官霍与瑕提议由广州府召集给澳票商人，先行把澳票交与他们，然后由这些商人与葡人交易，最后由澳票商人代葡人交纳出口税。^⑨出口税率一般为10%左右，故当时人有“三十六行领银，提举悉十而取一，盖安坐而得，无簿书刑杖之劳”^⑩之说。这一税率比进口税率较低，具有鼓励出口贸易的意义。

由于明政府在对外贸易上没有实行如清朝那样较严格的海关制度，再加上历史悠远，我们无法知道明中叶以来明政府在贸易出口方面所征得的税额。这是造成明代外贸税制复杂的原因之一。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每年经澳门出口的贸易的情形来估算明政府应得的出口税额。

明中叶后，澳门港兴起，西方世界及亚洲、美洲各国对华货物需求相当大，可以说他们几乎是来买中国货而来的。澳门成为他们与印度和日本贸易的中转站。他们普遍需求中国的生丝、丝织品、瓷器、糖、铜器、日常用具等。在1557—1640年期间，澳门葡萄牙商人几乎垄断了对日本、马尼拉、果阿的贸易，贸易盛况空前。以澳门出口到日本的丝货来说，1610年一般由澳门驶出的大帆船载有近3000担生丝，少时一条船亦载有1000多担生丝。^⑪另有估计澳门每年出口到日本的中国货物价值起码达100万银两以上。而澳门运到果阿的中国货物平均每年有50万比索（价值35万银两）。这大量的中国货物经广州转澳门，出口到世界各地。如果明政府能够对所有出口货资征收到出口税的话，那么在贸易兴盛年份可以征得20—30万两

税的银。如果估计有大量的偷税漏税，明政府起码亦可以收到10—20万两的出口税银。这一数额很明显是较为合理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奉命到广东审理案件的王临亨说，来自印度古里的葡萄牙船，每年三四月间进入中国购买各种货物，转贩到日本诸国以觅利；满船载的都是丝织品。他在广州时曾亲眼看到3艘船到达，每船以30万两银投税司纳税，而后则听其入城同百姓贸易。^②这一说法不免夸大，但三只货船如装满出口货物，共纳30万银税是可能的。

这一出口税额相比进口税额应该多许多。这主要因为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出超为主，出口贸易远比进口贸易兴盛。这笔巨额进口税显然没有落到明中央政府的财库里。明廷每年税收记录中从未提到过收到这么大宗的税额。从当时情形来看，出口税主要归作广东地方财政。只有在少数年份，广东地方政府为弥补二万六千两定额之不足，从出口税中拿出一部分上交中央。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明政府对出口税没有实行定额制，而且真正得益的是广东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广东地方政府掌握如此巨额的财政来源，势必会影响与中央政府在税收方面的关系，这应是明中央政府与广东地方政府在控制对外贸易上始终有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亦是与广东地方官员较主动控制贸易、税收，而明委派管理中外贸市舶司权力相对削弱的主要原因。

四、明朝对澳门实施的外贸税制特点

澳门作为国际贸易港在南中国崛起改变了明朝固有的外贸形势，使得明廷实行新的外贸税制，其特点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特的新关税制度。其一，表现为这一系列的对外贸易税制是适应澳门国际贸易特性的。澳门的兴起，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卷入世界商品性的贸易圈中，为此明廷对澳门的外贸政策是有针对性的，并没有照搬朝贡贸易中的税制，而是实行进口丈抽为主、出口主征货税的关税制度。其二，表现为明对澳门实行的外贸税制是独特的，它只适用于澳门为主的国际贸易，不适用于全国其他城市。如在福建，明廷针对国内商人经常出入东南洋贸易，而设立督饷馆，征收饷税，它的征税原则是“凡船出海，纪籍姓名、官给批引，有货税货，无货税船，不许为寇”。^③针对性显然不同。其三表现为明廷对澳门实施征收货币税的关税制度，这是适应货币经济发展的税制。

（二）税制变化较大，缺乏较完整的关税制度。

明廷对澳门实行的外贸税制，无论进出口方面，都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作改变。如在出口税制方面，原规定葡人向明政府交纳关税，后改为由华商代纳；有时出口税在广州交，有时在澳门交。在进口税制方面由不定额的丈抽制改为定额包干制。当然这一切的变化一方面反映明廷外贸税制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反映明廷采取适时的对策，根据不同的情势，改变税制征收的办法。

然而，这一套税制的特点，严格意义上说是它的缺点，缺乏完整而系统的体制，这主要反映在：（1）没有严整而齐全的管理队伍。明廷只派市舶司提督管理包括朝贡礼仪在内的一切贸易，官位低，而且下辖只有二名副提举，这使得明中央政府在对外贸易管理上缺乏一支强有力的领导队伍，在行使管理功能上，多依靠广东地方政府之力；（2）缺乏严格而系统的关税条例。（3）缺乏严格的计帐、统计制度。

（三）对澳门葡人实行较优惠的税收政策。明中叶澳门葡萄牙人开始在澳门贸易、定

居，渐形成居留地。明廷一直对澳门葡人实行严格而宽容相兼的管理。在税收方面，对葡人是很照顾的。

(1) 对葡人实行减税政策。本来明廷对澳门外人所实行的税率是很低的，这一点当时葡商也承认，“在税制方面，中国对入港费和进出口货物所征收的关税仍比葡人在亚洲其他贸易地区要轻一些。”^① 16—17世纪葡人经营长崎—澳门—果阿贸易，每一个贸易过程结束时，他们在返回印度时要向马六甲海关交纳5万金币（相当于一西班牙比索Peso），向果阿海关交纳6万块。而在中国交纳的税额少，而且经常漏欺欠纳，其中有一个贸易年度，只上交九千两的进口税。^② 在进口文抽制中，明廷曾应葡人所请，将船税量减三分。^③

(2) 允许葡人在澳门设关，对出进葡船征税，作为澳葡自治机构的经费。1583年澳门葡人为阻止西班牙人向澳门派驻葡西两国联合政府总督，根据葡萄牙城市自治制度，组织了议事局这一自治机构。为保障澳葡这一组织的运作，他们私设海关向葡商征收进出澳门的货物税，这一举动显然是侵犯中国主权的，后来明廷察觉后曾要求葡人停止征税。但经葡人屡请，明廷最后允许澳葡自治机构只对葡商船货征税，不得向中国船只及代表中国政府的贸易船只征税，而其收入用于澳门本身的支出。

总之，明朝对澳门的外贸税制管理是比较认真的，但我们也承认这一税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然而这一税制对中外贸易的发展还是有促进作用的，较低的进出口税都鼓励葡国等商人来从事可以获利巨丰的贸易，有利于中国产品推向世界市场。

① 《明史》卷七五，职官四。

② 张邦奇《西亭棧别诗序》，《明经世文编》卷一四七。

③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朗机》。

④ 庞尚鹏《区画濠镜保安海隅疏》。

⑤ 霍与瑕《霍勉斋集》卷一一。

⑥ 康熙《新会县志》。

⑦ 李士祯《抚粤政略》卷十，奏疏。

⑧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〇，《海外诸番、入贡口市》。

⑨ 《明会典》卷一一三，《给赐番夷通例》。

⑩ 《明武宗实录》卷四十八，正德四年三月乙未。

⑪ 万历《广东通志》卷七。

⑫ 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二。

⑬ 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餉税考。

⑭ 博克塞《来自澳门的大帆船》（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第17页。

⑮ 博克塞《十七世纪的澳门》（C. R. Boxer, MaCao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第72—83页。

⑯ 周玄暉《泾林续记》，丛书集成本第34页。

⑰ 万历《广东通志》卷七、卷六十九。

⑱ 张天泽《中葡贸易》第102页。

⑲ 霍与瑕《霍勉斋集》，引自《明经世文编》卷三六八。

⑳ 周玄暉《泾林续记》丛书集成本，第34页。

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

骆宝善

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关系问题，不但鲜有专论，且疑窦不少，不辨难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戊戌政变并不发生于袁世凯的告密

以往认为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发生的戊戌政变起于袁世凯的告密，显然有悖于史实。这从后党方面的政变准备，光绪帝与维新党的应变，社会上的舆论等方面均可找到有力的理据。

首先，政变是经过后党周密策划的。到了七月底，后帝两党的活动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康有为自编年谱》、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都做了大体真实的记述：七月底，立山、杨崇伊赴天津见荣禄，“草折请训政，荣禄许之，令杨崇伊持折见庆邸而面商之”。奕劻与李莲英皆请西太后训政。立山等甚至造谣说，光绪帝“派太监往各使馆，请去西后。西后大怒”。致使光绪帝赴颐和园面请西太后开懋勤殿时，遭到怒斥，而在廿九日交杨锐带出密诏，说“位且不保”要维新党人设法相救，并应维新中人之请，颁旨召见袁世凯，以寻求军队保护。荣禄则即调聂士成守天津，以断袁军入京之路，调董福祥军密入京师，以备大举。八月初，两党更是剑拔弩张。光绪帝两召袁世凯，慰谕有加，同时明谕康有为迅速离京。维新党人则连日聚谋，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说其效忠光绪，还拟策动董福祥，又谋求英、美、日等外国势力的帮助。在后党方面，杨崇伊赴颐和园请训政。荣禄在天津伪造海防局势紧张，令袁迅速回防地。初四日，西太后突然由颐和园返城内。初五日，袁世凯请训。

北京城内也沸沸扬扬，人心浮动。叶昌炽说：早在四月底，已“朝局岌岌，不可终日，如蜩如蟪，如沸如羹，今其时矣”。^①《康有为自编年谱》说：八月“初二日，明诏敦促我出京，于是国人骇悚，知祸作矣。”初三日夜，康等维新党人聚议时，杨深秀说：“京师市人皆纷纷传八月京师有大变，米面皆腾贵，并董军纷纷自北门入，居民震恐，乃有纷纷迁避者。”

① 埃德利奇《东方海上霸权的背景》，第155页（F. B. Eldridge）。

② 王临亨《粤剑篇》卷三，《志外夷》。

③ 王世懋《策枢》卷一。

④ 博克塞《来自澳门的大帆船》，第17页。

⑤ 王以宁《东粤疏草》卷五，《条陈防海疏》。

⑥ 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二。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

责任编辑：凌峰

其实，维新党人也很不自安。王照说：康有为等鼓动光绪帝召见袁世凯，“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②汪康年说：“康梁终日到处瞎奔”，“诚恐其奔出大乱子也”。^③张元济说：康梁“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④杨锐致张之洞函说：“近日变法，天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谬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后快”。^⑤杨锐甚至愤懑地认为，戊戌变法是光绪帝“误听于康有为”。^⑥刘光第在政变前数日与人的信中也说：“八月初一日诏入军机参预新政。因有‘参预新政’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⑦康广仁致何树龄信则说：“伯兄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得有成？弟私窃深忧之”。“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⑧事急之下，康有为甚至归诸讖纬，在他出走之前，见住室墙壁倒塌，就窃怪为政变事发、维新失败之朕兆。梁启超等送行之人，亦均恐政变在即，纷纷劝康微服出行，改换装束，从山东南下，避开荣禄控制的天津，等等。

以上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在后党来说，政变的部署已经就绪；在新党来说，已经完全预感到政变的来临。

第二，政变乃是借杨崇伊的奏请训政疏而发生。八月初六日，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为罪名革职拿问康有为，这与杨崇伊初三日所上请训政奏折中对新党的指责相吻合。当时，北京传出的消息也是如此。在北京做官的叶昌炽说，在政变发生后四日，即初十日，他同五六位京官朋友聚会时，“各证所闻，知莘伯（杨崇伊）发难无疑义；并闻先商之于王（文诏）廖（寿恒）两枢臣，皆不敢发，复赴津与荣中堂定策，其折由庆邸递入，系请太后训政，并劾新进诸君植党营私，莠言乱政也”。^⑨赵凤昌说：“八月初六日，西后借一词臣奏请”，“临朝训政”。^⑩

康有为也说，是杨的请训政折促成了西太后的政变决策。康的《自编年谱》谓：“杨崇伊于初二日至颐和园递请训政折，西后意定。上欲保全我，故促我出京也”。又说：“闻五日袁召见，上另有密旨与袁，则不知云何矣。闻袁知变不奉命云”。值得注意的是，康谱在是年岁末写成于日本，但却未说是袁的告密引起政变。

帝后两党和社会舆论均谓由杨的奏折引发政变，且杨的奏折尚在，杨的活动史有明载，当是不用置疑的。

第三，袁世凯的自首来不及成为政变的依据。袁世凯在初五日请训之后，回到天津的当晚，就向荣禄作了全部自首。自首内容的中心之点，就是杀荣为首的后党，并“围园劫后”。这本来可以作为后党发动政变的最过硬的依据，然而，如果从时间差上作具体的辨析，可断定他的自首是不可能在初六日早晨政变发生前到达西太后的耳中眼内的。因为初五日夜二更以后（约22时）至初六日卯刻（5时）上朝实行政变之间，只有七八小时的时间，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和制度来推论，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在政变前向西太后告变的。

后世的记述，道及袁自首内容达于西太后的方式，有三种颇具代表性的说法：1. 费行简说：荣禄“乘火车微服入京，奔颐和园告变”。^⑪2. 胡思敬说：荣禄“遣人变服赍蜡书驰告奕劻，奕劻言于太后”。^⑫3. 陈恭禄说：荣禄在天津得袁告密后，即“电告慈禧”。^⑬就此三说而论，电告说，当时颐和园与宫中均无设电报，无电可告。如电总署转奏，则就无所

谓告密了。此论自然不能成立。蜡书驰告说，京津间三百里之遥，八月初漆黑之夜，无论骑马、坐轿，在此短时间内，都赶不到北京，且还要先报告奕劻再转奏西太后。最快的途径是乘火车进京。经查，京津之间特快火车，1905年12月是行驶三个小时，^⑭想来，1898年的火车不会快于七年以后。此外，从直督行辕到天津火车站，从卢沟桥火车站到西太后所住西苑，至少也要在三个小时以上，再加上转换交通工具必要的耽搁，同样赶不上初六日早朝之前。姑且不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夜间开出专列火车必要的相应交涉，亦姑且不论在当时风声鹤唳的形势下，直督荣禄打破封疆大吏不奉召不得进京的体制。

总之，荣禄在八月初六日早朝之前告变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初四日，袁在北京逗留有五天，且有徐世昌同行。尽管初三日谭嗣同的夜访，袁已初知维新党人的底蕴，但仍有预定的初五日请训，袁尚未完全掌握光绪帝与维新党人的图谋与心态，更不知晓后党的通盘计划，于整个政局机要甚至可以说是懵然的，而且事情直接关系在天津的荣禄，袁一则不敢轻举妄动，在京泄露消息，二则虽有心腹幕僚徐世昌在侧，但此种直接关乎社稷安危、帝后以及荣禄命运的重大机密，自然也不敢派他先行告密。他必须待自己返津后，亲自向荣禄报告全过程，伺机观察风声，表明心迹，以策自身安全。所以，也不会存在初五日夜前袁就自首的可能。

第四，政变上谕加给康有为的罪名也说明，政变亦非因袁的告密而起。上谕说：“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著革职，……拿交刑部治罪”。^⑮并没有“围园劫后”这项谋逆大罪，“首恶”谭嗣同也逍遥法外，并且一直在积极活动，营救光绪帝。假若政变之前西太后和后党就已得知“告密”的内容，给维新党人所定的罪名以及政变后情形决不至如此。只是在西太后得悉“北洋袁世凯自首告密之事”之后，到十四日的朱谕，公布维新党人“大逆不道”罪状，这才正面涉及袁“告密”的内容。

综上所述，可以证明，袁世凯的告密既不涉及政变的直接准备，也不构成政变的导火线。1908年袁世凯将《戊戌日记》（或称《戊戌纪略》）交给张一麟发表。辛亥革命后，袁当了大总统，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以戊戌政变之事请问，袁答以：“何待我来告密”。^⑯两次表明心迹，应该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二、袁世凯的自首在政变中的地位与作用

袁的自首虽不是政变的导火线，但它在政变过程中，却起着某种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袁的自首作为硬证据，坐实了维新党人的罪状，在某种深层意义上改变了政变的性质。如果说因实行新政，帝后两党还带有某种“政争”的面纱，而袁自首的出笼，则使维新党人完全居于谋反的叛逆地位，事态剧转，性质突变，西太后与后党人士一下子使光绪帝和维新党居于万劫不复，束手就擒的处境，甚至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政变的步调加快，温度骤升，“六君子”处决之速，维新党人株连之广，无不导源于此。试看历史事实：

八月初六日政变发生后的三、四天之内，尽管北京城内风声甚紧，但是后党和西太后并没有再采取更多的激烈行动。维新党人甚至还在公开地或暗中积极进行营救光绪帝的活动，杨深秀公然抗疏，要求西太后收回训政，还政光绪帝，谭嗣同在联络北京的侠客，刘光第奔走于董福祥的军队，等等。一切均略呈政争的样子。

然而，在西太后得到袁世凯自首详情后，事态就急转直下了。初九日，下令徐致靖。杨

深秀及军机四卿，“均着先行革职，拿解刑部治罪”。初十日，召荣禄“着即来京，有面询事件”，十一日，“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被捕维新党人，十二日，再加派御前大臣会同审讯，并“限三日具奏”。急如星火，跃然纸上。其实事态的进展，比谕令更快，连一次也没有审讯，即于十四日，“谕军机大臣，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决”。⑦

加给维新党人的罪名也骤然升级而变质，由初六日的“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进而初九日，“杨崇伊又参康有为叛逆不道”。进而十三日，有旨言：“有人奏，若稽时日，恐中有变，即行正法”。⑧进而十四日，“六君子”以“大逆不道”罪处决。朱谕发布维新党罪状，所谓“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并且还追加了一条“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⑨

至于株连之广，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详有罗列，兹不赘。

十三日的“有人奏”（这通常是指台谏官的奏事）所言，可谓深明春秋大义。本来维新党人已经身系囹圄，康梁等幸逃者也不可能有多大作为，再稽时日，也不致有什么危险的。但是，真像已经大白，若再例审讯，在拘诸人，以杨深秀之耿直，谭嗣同之激烈，说出话来，很可能为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刑部和都察院的堂官们所不堪卒听，不敢卒听。为尊者讳，保持皇家尊严与体面，“即行正法”，杀人灭口，是最妥当、最简捷的手段。

对袁世凯本人来说，自首稳定了地位，消除了西太后和后党的怀疑，取得了他们的信用。袁世凯本非维新党人，但是，光绪帝的临危召见，维新党人的蓄意笼络，使后党人士自然对他进行防范。以袁的机变和势利，他自然深明帝后两党力量的对比，他在迟疑了几天之后，选择了后党，用和盘托出，证实自己不是新党，与新党无甚瓜葛，从而取得了信用。八月十三日荣禄答人问，颇具说明意义。问：“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诏中曾有杀公乎？”曰“然”。“然则袁世凯是一同谋者也，既同谋而又自首，首鼠两端，此人不足取也”。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⑩八月初十日，召荣禄进京，命袁世凯护理直督、北洋大臣。八月十四日，停止久已准备的天津阅兵，赏袁部新建陆军银五千两。十一月，再奉密旨入京，廿五日，赏西苑门内骑马，乘坐船只拖船。这些，都可作为荣禄说话的注脚。

袁世凯在《自书〈戊戌纪略〉后》一文中说：西太后“亦天下之君也，况今上为皇太后命之，亦有君臣之义，且有母子之分，天下岂无君无母之国哉”。又说：“自通籍十七年来，只知以道事君，不敢稍涉欺罔，无论人知与不知，而力任劳怨，百折不回。其不忠不孝之言，向不敢出诸口。不料逢此捏机，几涉奇险。然区区此心，意在诛锄误君误国之徒。该党无礼于君，予为鹰鹯之逐，亦人臣之大义”。这就是袁为自己的行动寻找的理论依据。袁的至亲后辈张伯驹曾做一个概括的推想，他说：袁在“请训时，光绪颁给密诏。此事关系项城一身之生死祸福。从旁观来想，何以为之，当不出三途：一，将密诏搁置。但时久必泄，对光绪则有不奉诏之罪，对那拉后则有不告密之罪。二，依诏行事。则尚有聂士成、宋庆之军……是否皆听命。即杀荣禄、封电报铁路，如此大事，尚有外国使馆消息，光绪是否会先被害。三，告密。当是熟虑并与所部将领密商，终出告密一途，卖帝卖友，举国同愤。但此三

途皆不能免罪”。^②此论应是符合实际的。

三、袁世凯《戊戌日记》记事基本属实

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记事情的真伪，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历史疑案。康、梁等维新党人，始终痛诋袁所记纯系为邀功行赏的捏造之辞。许多论者亦认为多系袁为开脱自己的食词，不足为据。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和史实，以及近年来陆续披露的资料做一全面考察，我认为不然。

首先，考察一下《戊戌日记》的出笼。袁自称，日记撰写于“六君子”殉难之日，即八月十四日护直督之时，八月廿五日，又写了“书后”，交给诸子密藏，以存信史。此后，尽管社会上纷纷嚷嚷，但并未公诸于世。十年之后，1908年，光绪帝与西太后相继去世，载沣等皇族掌握朝政，不久即令袁“回籍养病”，罢了他的官。与此同时，朝野喧传光绪帝有遗诏杀袁以报告密之仇。配合着这个浪头，康有为一改仇视西太后的常态，推波助澜，上书载沣，长达三千余言，备说是袁蓄意制造“围园劫后”谬论，陷西太后于不慈、光绪于不孝不明、康有为于不忠。并明言他是以当事人的身份，担负披露历史真象，揭穿袁之阴谋的历史使命的。

近年出版的史料还表明，康氏的上书，并非单独行动，还有梁启超参加。梁致康函谓：“师上监国书奉到时，老贼已败，故措词不能不稍变易，已僭改若干，誊写递去矣，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盖投鼠忌器。今两宫皆殂，前事非复嗣统者所忍言，非伤德宗，伤孝钦，为监国计，实无从理此曲直也。故弟子写信入都，皆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悉由贼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则可以开脱孝钦，而事易办，师谓何如”？^③这样看来：第一，戊戌密谋确有。第二，师徒合作乘时谋袁。

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袁向他的得力幕僚张一麟提供了《戊戌日记》，实际上即是一种公开的形式。张说：“戊戌一案，余入幕后未尝一言询及项城。及其罢官时，乃询及之。项城曰：‘此事余有记载，他日当寄汝一观’。余回后，寄来一册。因其已往事，故未宣布。后见南通翰墨林已排版出版”。^④1926年2月，《申报》发表了张向该报记者提供的本子。人们似乎有理由怀疑《戊戌日记》是袁在1908年所写而假托1898年所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完全是出于袁本人的手笔。

其次，考察一下各家的记述。袁说自不需多言。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说：七月廿八、九日，谭嗣同果知光绪帝无权，大为恐惧，乃谋设法相救。“虑九月天津阅兵即行废立”，“以将帅之中袁世凯”为唯一“可救上者”，又“虑其为荣禄用，不肯从也。先于六月令徐仁禄毅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袁倾向我至甚，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使毅甫以词激之，谓我与卓如、芝楨、复生屡奏荐于上，言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何为与荣禄不洽？袁恍然悟曰：昔常熟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兵大权”。“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八月初三日，林旭交来两道密诏，“与复生跪读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幼博来，经画救上之策。袁幕徐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

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初三夜，谭复生入城后”，“至子刻，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候消息，知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决行”。“闻五日袁召见，上另有密旨与袁，则不知其云何矣。闻袁知变不奉命云”。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事：“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旷代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所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以行大事。……天下健者，唯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一军敌彼二军。保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驰入仆营，传号令以除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答。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得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储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

毕永年《诡谋直记》说：“七月廿九日夜九时，康召仆至其室，谓仆曰：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八月初一日，仆见谭君，与商此事。谭云：兄能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与梁正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询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而行矣。然仆终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谓仆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仆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太后而废之可也。初三日，……午膳时，钱君告仆曰：康先生欲杀太后奈何？……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为杀西太后，康等还急催唐才常入京。^④

此外，杨深秀也说：此事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⑤王照说：康曾打算遣王往说聂士成，王坚辞不去。又遣徐仁禄往说袁世凯，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徐世昌传话，“所征得者模棱语耳”。“梁启超、谭嗣同于初三夜往见袁，劝其围太后，袁不允”。^⑥

以上是当时的一些主要当事人的直接记述，是直接的第一二手资料。基本上原文照录，固然有冗长之弊，但可避免“摘其所要”，以利比较分析。西太后和光绪帝按传统是不会留下详细记述的。谭嗣同等“六君子”死无对证。徐致靖父子、荣禄、直幕及后党其他要人如

杨崇伊、徐世昌等，均未留下详细记述。其他各种详简记述，应该均是直接或间接来自上述各说，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演绎，故可略而不论。

第三，根据以上各说，试作一异同比较。不难发现，新旧两党之说，有许多基本相同之处，也有根本不同，或小有差异之点。其基本相同之点是：维新党人向光绪帝奏荐了袁，要袁在天津大阅时保光绪帝，诛荣禄，还多方设词离间荣袁，袁有应承，有托辞，有婉拒。这些各说认同，当系确有其事。

其根本不同之处是，围园劫后，乃至杀掉西太后之事，康、梁力辩其无，说纯系袁的诬陷。近年已有许多论者详为辨明，证实康梁确有此谋，而且确有行动，袁所记不谬，兹不详论。仅须再简略申述的是：前文引述康梁师徒之谋，以及他们在公私场合下的多次回避或公开否认说明，从康的《自编年谱》、梁的《戊戌政变记》撰写之日起，就立意隐瞒真象而有意归罪于袁的。但事实终归是事实，即使不发现梁致康信，康梁的辩解也是掩饰不了的。维新党人刘光第、王照、毕永年都说有。梁本人也含蓄地说要“肃宫廷”，仅杀荣禄，怎能使宫廷肃呢。康说，谭嗣同等维新党人是痛感光绪帝无权，才决心荐袁、说袁的，仅杀荣禄，大权亦不能就由后手转入帝手。维新党人既冒大险，孤注一掷，其志在谋西太后，这是不言自明的。历代政争的经验几乎都是如此。按说，撇开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直认此举，那才是康梁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勇气的表现。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力量对比，以及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都使他们只能采取此策。

其许多小异之点，它们是：荣禄、张一麟、康、梁等均说袁奉有光绪帝朱笔密诏，而袁避开此事不提，内容也不得而知。^①康等与袁之间对于解救光绪帝还有书信往还，袁有过使康等十分满意的表态。康、谭等议谋说袁，谭夜访袁，均有徐世昌在场。这些也原系确有，但不利袁的表白，自然他避开不提了。徐仁禄奉康命往小站说袁事，康与王照所记述的效果甚不相同，显然康有一厢情愿的轻信之病，王照所说颇近乎实际。袁的日记自然不记这件于己不利且与召见无直接关系的事情，但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与人提起徐仁禄，还深恶此人“冒失”，可见袁在小站对徐仁禄不管说些什么，都纯属应付。毕永年说谭嗣同急催唐才常进京，证实了谭对袁说已“电湖南招集好将”之事。

通过各说对比，可以肯定，《戊戌日记》的记事基本属实，是关于戊戌政变的一种基本可信的资料，似不可因人废言。至于其自我开脱的饰词，是不难看出的，而其有意回避的某些事实和情节，也是不难查证的。

①③④⑤ 《戊戌变法》（一）第528、531、348—349、351页。

② 王照：《方家园诗钞》。

③④ 《汪康年师友信札》（一）第780、782页。

⑤⑧ 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之《杨锐传》及《康广仁传》。

⑥⑩⑤ 《戊戌变法》（四）第70、319、332—333页。

⑦ 刘光第：《衷圣斋文集》第58页。

⑪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⑫ 胡恩敬：《戊戌履霜录》。

⑬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480页。

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及其构成要素

张 国 仪

在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中,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而存在的。中华民族凝聚力也不例外,它作为一种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由其内在的物质力和精神力构成的合力,是一个由其内部互相联系着的各个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其核心问题是把中华民族凝聚力作为一个系统来认识,运用整体观点、联系观点和最佳观点指导我们的行动,切实增强和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凝聚力。

一、中华民族凝聚力作为系统而存在

马克思主义认为,系统的存在具有普遍性。某事物系统不但同周围的事物系统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着,而且其内部各要素也总是处于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之中,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一哲学思想对我们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是客观存在的系统之一,而且是一个由物质子系统与精神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的、动态的大系统。它同别的事物系统一样,具有系统的基本特征。

首先,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系统的整体性。整体性是这个系统最基本的特性,恩格斯说:“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这里的“体系”一词也可以译成“系统”。体系和系统在德文中是同一个词(system)。斯大林指出:“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什么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依赖的各个对象或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列宁主义问题》第630页)这种把世界看作是普遍联系的整体思

⑭ 《大公报》1905年12月25日《要闻》栏。

⑮⑯⑰ 《清德宗实录》卷426、427、428。

⑱ 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3页。

⑲ 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第二首诗注。

⑳ 转引自杨天石《康有为:“戊戌密谋”》补正,《文汇报》1986.4.8。

㉑ 张一麟:《古红梅阁笔记》,《心太平室集》卷8。

㉒㉓ 转引自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光明日报》1985.9.4。

㉔ 近年,有位当年在颐和园随侍西太后,亲眼目睹荣禄告变的太监信修明发表回忆录,见《新华文摘》1993年第1期213页,这个回忆录虽是近侍演说内幕,但是时间、地点、人物活动情节均与史实不符,可信性不大。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科院历史所

责任编辑:林有能

想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整体特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中，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成和发展不是靠单一要素的作用，也不是靠各个要素作用的简单相加，它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之和”，（〈奥〉冯·贝塔朗菲《普遍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转引自《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5页）或者换句话说，这个系统也具有其组成要素所没有的功能。

其次，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系统的结构性。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与其它事物系统一样具有一定的结构，这个结构是由若干层次有机结合而成的。从这一系统的整体结构看，它是代表一个民族的吸引力、向心力，是最高层次。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由一定的物质力和精神力构成的，这是第二层次。而物质力又是由一定的经济、科技、军事、血缘亲缘地缘等要素构成；精神力则由一定的政治、文化、心理意识等要素构成。它们是第三层次。还可以继续划分下去，比如，文化要素又由教育、文艺、哲学等因素构成，这属于第四层次的组成部分。文艺因素又可以分成文学和艺术，等等。分析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的层次结构，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本质，在实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功能最优化发挥时，做到把各个构成要素摆在正确位置，充分发挥各个层次的积极作用。

第三，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系统的关联性。关联性是指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这一系统中各个构成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处于不同层次、不同方式的联系之中。每一层次内部都具有相对的运行规律，又同上下左右的层次发生着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所以，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关联性的系统。同时，这一系统本身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不是绝对孤立和封闭的。与之并列的还有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凝聚力系统。各民族凝聚力系统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它们之间总是处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时刻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因此，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实际上又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它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和善于利用外部条件，努力创造好的外部环境，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扬长避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系统的动态性。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的动态性主要表现在该系统的构成要素是发展中的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联系是运动中的联系，系统和它所处的环境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这就是说，整个系统及其构成要素、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都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既要看到它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得到增强，又要看到它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受到削弱。无视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的变化，认为它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是一样的；或者无视它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认为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增强和发挥，是永远不会受到削弱和破坏的；或者认为增强和发挥它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可变的，面对已有的条件消极悲观，无所作为，等等，都是错误的观点。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的动态性，就是要分析它在发展变化中的形式及其需要的条件，通过我们的主观努力，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或者创造出某些中华民族凝聚力需要的而原先又不具备的条件，使它在最佳的形式中得到增强和发展。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构成要素的划分

中华民族凝聚力既然是作为系统而存在，那么，它的构成要素在这个系统整体中则表现为一定功能的子系统。根据系统论的观点，子系统必须具有一定质的规定性。因此，对它的

构成要素就不能作随意性的划分，而应该遵循一定的准则。这些准则大致有以下四条：

一是与民族利益的密切相关性。构成民族凝聚力的要素，涉及面很广。在所有包括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实力与潜力等事物中，哪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构成要素，哪些不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构成要素，关键看它在与维护和增强中华民族利益的联系上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是否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前途和命运，是否与形成、维护和增强中华民族的利益具有一致性。

二是长期的稳定性。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构成要素，也必须具有长期的稳定性。这主要是由构成要素的功能是否具有长期性所决定的。还是以军事力量为例，从古到今，民族的利益都需要军力的保护，民族凝聚力的强弱都与民族的军事实力密切相关，军事力量这一要素的功能本身，就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因此，增强国防的现代化，是增强和发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长远方针。

三是不可替代性。中华民族凝聚力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区别，除了它们各具特色之外，还在于它们各自功能具有的不可替代性。例如，经济要素对文化要素具有很大的影响，但决代替不了文化要素。同样道理，文化要素也代替不了军事要素，军事要素又不能代替政治要素，等等。

四是相互排斥性。按照逻辑学划分规则和方法，划分后的诸子项必须互相排斥。这就是说，划分就是把母项概念的外延分成若干个小项，子项互相排斥，就达到了分成若干小群的目的，子项不互相排斥，就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例如，当我们把中华民族凝聚力构成要素划分为物质力和精神力两大类，然后，再分别对这两大类的要素继续进行划分，这是正确的。但如果把构成要素划分为物质力、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精神力等几大项，这就有一点不伦不类了，因为物质要素本身就包含有经济的因素，而政治与文化说到底是属于精神方面的东西。

按照上述准则来衡量，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构成要素可以概括为物质力、精神力两大类，依次划分有经济、科技、军事、血缘亲缘地缘、政治、文化、心理意识等方面的要素。具体说：

经济要素是民族乃至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根基，它在许多时候都是起着主要的凝聚力作用的。它包括了民族的经济实力、经济体制、经济关系等。

科技要素在民族凝聚力结构中起着先导的作用，它对加快民族经济建设、提高民族素质、促进民族进步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包括了科技水平、科技进步、科技贡献等。

军事要素是民族凝聚力中保卫民族利益、防御外来侵略的实力因素。它关系到民族凝聚力的大小、强弱，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被视为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军事要素包括了民族武装力量的状况、武器装备、军事科技水平等。

血缘亲缘地缘要素是民族形成的必要条件，是民族凝聚的自然纽带。当然，狭隘的血缘亲缘地缘观念是不可取的，是有害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发挥的。但是，它作为民族组成的主要纽带以及在民族凝聚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所起到的“血浓于水”的作用，却是一种无可否认的客观的事实。

政治要素在民族凝聚力构成中具有核心的重要地位。民族政治力量的性质和状况不仅会影响其它要素作用的发挥，甚至强有力地直接地影响民族凝聚力的强弱。政治要素包括了国

家政权的性质、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政治目的、政治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政府素质和国际政治环境等。

文化要素在民族凝聚力结构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在影响和作用于各个时候的经济和政治过程中发挥其凝聚力作用的。文化要素包括了教育、文艺、哲学、爱国主义思想、民族自豪感等。

心理意识要素和文化要素一样，在民族凝聚力结构中对其它的要素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包括了民族的感情、风俗、习惯、成见、自发的倾向、信念等等。

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中，它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其主要表现在：（1）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共处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这个统一体之中。作为相互联系的一面，它们互为作为、互为制约，共同影响和作用于系统；作为相互区别的一面，它们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一定的条件下独自对系统发生重要的影响。（2）它们既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中又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状态之中，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在一般的情况下，它们处于相持、平衡与静止中；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会发生突变，对系统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和平时军事要素是处于平稳发展之中的，但在战争状态下，民族的武装力量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对系统作用的发挥就会产生尤其重要的意义。（3）它们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统一。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系统中，物质力要素和精神力要素是作为一种合力来起作用的，从而形成系统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但是，它们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各有不同，特别是精神力方面的要素一旦形成，就会超前或落后于社会经济形态而影响和作用于系统。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讲师团

责任编辑：凌 峰

探索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深层结构

——读肖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

戢斗勇

由广东学者发起并在全中国产生巨大反响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系列研讨，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肖君和先生撰写的论著《中华民族凝聚力》，就是其中的力作之一。该书作为探寻中华民族灵魂的三卷本大型学术专著《华魂》第一卷，共24万字，已于今年5月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肖著的最大特色，在于运用系统论、协同论等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深层结构作了系统的探索。作者在“序”中提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实体”，是一个“个别事物”，这一观点是深刻而有独到之处的。因为，把中华民族凝聚力认定为一个“实体”和“个别事物”，就能解释中华文化之所以是世界四大文化源中唯一没有中断、历数千年发展至今的极具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互相融合、共同展发，形成今天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以巨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这也就说明，中华民族凝聚力决不是一种人们的主观虚构，决不是自我的溢美之辞，而是经千百年来历史、文化发展形成的中华民族各成员所共有的民族心理和情结，是体现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和综合国力的物质力量，是对历史和现实客观存在的理性概括。把中华民族凝聚力认定为一个“实体”和“个别事物”，也就能科学地厘定它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体地描述它的深层结构，确切地反映它的历史和现实的形态及其发展趋势。肖著正是从这三方面将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一客观的“实体”展现在我们面前。

（一）肖著概括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涵义和特性。这是第一部分的内容。作者认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概念具有三方面的涵义：第一，它是中华民族精神及其表现形态的总和，这是从其本质和内容来定义的；第二，它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与现实经验的结晶，这是从其构成成份和来源而定义的；第三，它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这是从其历史作用来定义的。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特征有六种：就其自身而言，是可分性和可合性的统一；就其在时间中的存在而言，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就其在空间中的存在而言，是本国性和跨国性的统一；就其存在形式而言，是稳定性和变化性的统一；就其形态分类而言，是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统一。该书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涵义和特性的概括，使读者能够从定性的角度对中华民族凝聚力进行宏观的把握。

（二）肖著揭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深层结构。这是第二、三部分的内容。作者提出，中华民族凝聚力既然是一个实体，是使中华民族全体成员能够在思想感情上凝集、聚合的力

量，就意味着它有一定的结构。作者认定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皮亚杰所谓的结构三特性即“整体性、转换性和自然调整性”，它是一个自然系统、一个协合力体系，一个立体的整体结构。作者从纵向、横向两种形式来解剖这一结构。

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纵向结构来看，这一系统具有六个层次，各有不同的作用和系统内依次递进发展的方向。它们是：大一统的社会历史结构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物质性的社会历史根源；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精华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根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在根据；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直接前提；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表现；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功能效应。作者把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纵向结构分析概括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纵向结构系统论”或“中华民族凝聚力纵向结构六层次说”。

如果说，作者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纵向结构的分析侧重于历史和逻辑的抽象，那么，他对横向结构的分析则主要地是着眼于“力”本身。作者指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横向结构具有五种力：中华民族领导核心内部的内聚力；核心对核外群体、个体的吸引力；核外群体、个体对核心的向心力；核外群体、个体的亲和力；中华民族的总体协合力。它们构成“中华民族协合力体系”。中华民族凝聚力纵向结构的六层次和横向结构的协合力体系的有机结合，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巨系统”。

（三）肖著阐述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实形态和发展趋势，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了可供操作的理论参考。这是最后两部分的内容。该书是一本历史感与现实性相结合的论著，从中华民族形成期的“血缘旋涡”现象和历史上屈原、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冯子材、林则徐、洪秀全等仁人志士的爱国壮举，到1991年抗洪救灾的动人情景，从孙中山先生的“合群力”的呼唤，到今天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概念的提出，无不反映出该书源于历史，基于现实，面向未来。作者指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由三种要素相结合而构成，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在根据，以当代国际国内的现实状况为外在影响；其特点是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强国，追求物质、精神和社会政治三大文明，拥护改革开放，个体群体相结合。此外，作者还提出了要十分注意化解与凝聚力对应的离散力的问题。书中明确提出要运用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具体做法上紧紧抓住繁荣经济，富裕人民；公平分配，共同富裕；搞好民主法制建设；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等五大环节。

作者单位：佛山大学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凌 峰

文学“下海”及其他

——与陈若曦笔谈

〔美〕戈 云

去年兴之所至，曾邀约了纪弦老先生和几位诗坛文友作过一次面对面的有关中国现代诗发展历程的漫谈，从公诸于世所引起的热烈效应看来，这方式似乎不错。故而，今年我又找到陈若曦大姐头上来了。我知道她很忙，但我更知道她是充满写作活力的正值盛年驰骋文坛的女将；当然，还由于我们多年来不曾间断的交往，她爽快地一口便应承了。不过，由于她那机灵精确的作家头脑，霎时便计算出来“时间也宝贵”，便提出与其“多半沦为社交聚会”的对谈，倒“不如我们彼此笔谈，更有效果”；而且，若感“不足或有疑问时”，还可“再来信提出问题”。于是，我们便从七月上旬至七月下旬作了一场范围相当广泛的包括当前海内外华文文学问题在内的笔谈。看来果真省时省事。我不敢窃为私有，仍如既往，整理成章，公之于众，并就教于社会贤达诸公。

第一次笔谈

（1993年7月7日问，7月10日答）

戈云（以下简称“云”）：我与好些文学界的朋友一样，由于近年来没能继续读到像你许多深刻挖掘人性和充满人情百态的已为海内外华人所熟知的精彩的长、短篇小说的新作而感到若有所失。当然，从报刊的报导中，我也略知你近年来的一些想法。这也是每个作家根据自身主客观条件的有所不同的转换而变化的。因此，我已注意到，这几年来你辛勤笔耕的主要成果便是许多短篇散文和杂文之类（包括大量的专栏文章）。这都是十分“入世”而又紧贴现实的精悍之作，有许多观点更与我不谋而合，常感共鸣。因而我想请你谈谈：一、你觉得这类作品除了能够尽情抒发自己主观的思想感情之外，有没有想到要为希图达到某种程度的社会效益而写？特别是对我们美国华人社会而言。二、你的这类文章当然都是文学作品，因而我也很想听听你对直接抒发感情的散文、杂文的文学性的看法。因为有人隐约谈到，这类作品是缺少文学品味的。

若曦（以下简称“曦”）：我自90年代开始，便有出外工作的需要。一则对写小说感到厌倦，也深有无力感。以前一直以为小说有助于移风易俗，至少也可寄托自己的理想或抒发一己的感慨。然而随着岁月的增长，人自是变得聪明了一点，知道个人能力有限，如此重任还是留给年轻一代或是才华之士去担当为是。我虽有心，到底才疏学浅。何况小说读者日趋

下降，知音日少，也是寂寞的事，另外，我以前写作的姿势不正确，患上了很严重的手腕关节炎，不得已改为电脑打字，但也无济于事，反而又加上肩周和颈椎炎……，总之，写字成为苦刑。好吧，写小说没意思，手背又痛，那就少写为是。因此，这三年来，我基本上只维持《明报周刊》的专栏。

从前，我一直拒绝写专栏，觉得这种方块文学不够严肃，也限制太多，难以发挥。然而，我写了这几年，发现专栏写作其实也很灵活，可以事在人为。其间有不知所云的方块，但也有认真耕耘的园地。我是个天生拥抱社会的人，没办法不关怀周遭的人；路见不平，明知无济于事，还是会作不平之鸣。加上出外工作，虽是半工性的兼职，但时间却也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创作小说不易，但用来写千把字的专栏倒是相当合适。专栏非常能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尤其针砭时弊更能“创及履及”，极具社会效益。给你打这封笔谈信时，我方发觉，竟一眨眼也写了快三年的专栏，自己都难以置信！

写专栏当然有缺点。因为要按时交稿，有时人一忙，来不及思索适合评述或议论的题目，于是便把很好的小说素材拿去顶缸——一篇小说，以“千字文”告终，怎不可惜？自写专栏以来，我没写过一篇小说，一半原因在此。

专栏文字（至少，我自己的专栏文字）有无文学性？我没法分析。也没想到去分析。向来是秉承“我手写我口”的原则。不过以前用小说表达，现在常把主题浓缩为“千字文”，这一点也许仍有相通之处吧？不过，我自己并不在乎文章有无文学性或价值。记得十多年前，萧乾老先生出于一番好意，劝我写小说别牵涉政治，一定要考虑到“五百年后还有人看否”。我相信，认真搞创作的人应该有这种志向才是。我自己不行，我没有大志；我对文学，兴趣浓厚但目光很短浅。我只想写的东西能打动当代人，希望对社会民生有点用处，五百年的事便顾不上了。专栏文章较缺艺术性，这是事实，不必辩驳。然而它是否就没文学性呢？我倾向于文学的多元化，但我实不想在这种问题上费脑筋。

云：我知道，近年来你也“下海”兼商。那么，你是否可以从“有利”或“不利”方面谈谈这对你的整体写作生活的影响。因为，我相信你的主体还是一位很富才华的、并正进入盛年的作家。事实上，中国大陆当前也正兴起一股“文人经商”热，张贤亮就为此谈得头头是道。但我总觉得，一个本来以写作为主的、或专业写作的作家，如果一旦把主轴转到了“从商”，这是否会引致“脱轨”的倾斜呢？（当然，对你来说实只“兼商”而已）我看大陆有些作家就已经提出这样的忧虑了。我想你也一定会有所体会的。

曦：其实我并未“下海”从商。房地产仲介是一项服务性行业，（若曦现在的业余职称”应是地产经纪——云注）如律师一般，靠专业知识收佣金，和互通有无并富冒险性和投机性的商业不相同。又如开餐馆是从商，但馆内掌厨和跑堂的则是服务性工作，两者有异。当我发现自己需要一份兼职（Part time）工作时，考虑到房地产仲介的工作时间自由，自己有些主动性，加上这种工作需要经常走动，有利健康，因此选择了它。非常单纯的事。

去年（1992年），有位来自上海的美国大学教授托我公司代卖上海郊区的两百亩地（也是乡书记委托他，他转托我代理），公司用我名义在中文日报登广告。结果问津者众，但都嫌贵，只有台湾一位客商有兴趣去看看。二月中我飞去上海陪客商看土地，台商也嫌贵，并未成交。我回来不久即向教授朋友辞去这项委托，请他们另找高明。由于此地一家中文杂志的记者向我采访大陆的观感，不料事后文章刊出，我俨然成了太平洋两岸的地产仲介人，自

已看了都哑然失笑。真叫捕风捉影。

去年底，杭州灵隐寺后面有一块地，要找人合伙盖十栋洋房，北京的朋友让我找美国文艺界的朋友合资购买。我很快地找到了十二位合伙人。大家劝我成立公司，并代表大家于今年二月去杭州谈判。到时才发现，事先签的草约全被中方片面推翻，临时价格又变相上涨。我当场想了想，毅然放弃。又是白忙了一番，但总算经验了一场。所以，你看，我就是有机会从商，也成不了商，硬是没这个命呢。

大陆作家的“下海”，我自己没有第一手资料，张贤亮来信说得也很简略，很可能是挂某种头衔而已。总之，我不清楚。从商，或从事任何一种工作，对写作都会分心，这是无可置疑的事，端在作者自己如何分配时间和比重而已。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对我的写作便有影响：不利于创作小说，较适合专栏文章。因为这种工作把一周的时间零碎分割了，总投入时间不算多，但空闲时间却显得支离破碎。而小说创作（对我而言）则需要较完整的时间作思考，不宜分心为佳。当然，这可能也和个人的写作习惯有关，我不善于利用时间吧。出外工作也有好处，有机会接触各种人，拓宽社会面，有利写作自不待言。最重要的，作家要能养活自己，生活能独立是前提。尤其在美国，有意写作中文，稿酬相形更低，这是很现实的事。

云：如众周知，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兴起，连带整个文化领域也不能不越来越商品化了，文学艺术也更具消费性了。这可说是必然的现象。但我还弄不清楚：这到底是必然的“过渡”，还是必然地仍会继续“深化”？其结果，会出现一种怎样的情况呢？因为摆在眼前的事实是，由于商品化和消费性的冲击，中国大陆传统性的严肃文学作品不仅出版困难重重，还几乎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所以，已经有人提到文学的衰亡问题了。我不知道台湾文学的发展是否也经过、或者也正在经过这种历程？想请你作一点比较参照。

曦：中国兴起市场经济，连带着文化领域出现商品化，目前我希望是过渡性（至少台湾的经验是这样的），等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人们能“富而好礼”，于是文化呈多元化。这时表现文学上是，严肃文学和各种消闲作品各得其所。但是有一点不可或忘，台湾官方和学术机构一直都是支持并资助严肃文学和戏剧的。我们很希望大陆政府继续支持京剧及重要地方戏剧，还有话剧、歌剧、芭蕾舞、大型文学刊物……等等正统艺术。它们的重要性可和训练参加国际奥运的选手等同起来。只出现女排冠军和长跑国手，没有相等份量的文学家，中国能算世界大国吗？因此，我并不主张文化人都“下海”从商或兼职赚钱。事实上也没有这么多生意好让知识分子去做。我相信，目前的纷乱，部份是以前禁制太凶而出现的反弹现象，为多元文化催生的阵痛。当然，若长此下去则毛病大矣，整个民族一起退化沉沦下去，那将是大悲剧。

云：转入谈谈与我们切身处境相关较大的美国华文文学（以下就简称为“美华文学”）的问题吧。首先，也是与前边谈到过的一样，美华文学在受到商品化与消费性的冲击的同时，却还有受到特定环境束缚的局限。换句话说，美华文学既不可能进入美国文学（亦即所谓“国家文学”）的主流，那么，它的发展前途将如何呢？有人认为，随着我们处于美国少数民族裔的地位有不容改变性，以及我们第二、第三代以后的移民后裔更日益与母国语言文化的疏离，故此美华文学必将逐渐式微、以至消亡。但我从华人在世界大环境中的经济、文化、以至人口地位的日益强化与兴旺，再加上美华文学在美国的可容空间似乎也还有扩展的

趋势，因此，从宏观角度来看，我还是采取乐观、却必须努力奋争的态度的。你的看法如何？

曦：我以为美华文学可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份，也可做为中国文学的一部份。它的前途全系于前面二者。若用英文创作，则属于美国文学。

云：目前美国华人文学界已经明显地摆出了“两翼”的态势：一翼就是以华文写作的美华文学作家的队伍，而另一翼则是以英语写作的美国华人文学作家的阵容。当然，也还有少数是“两栖性”（中英文写作兼备）的作家和理论研究家的。不管那一翼，当前都已产生了一批具有高水准、高知名度的作家，并且都后继有人。同时，还必须看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他们的作品中，仍然是以华人母国文化为背景、为内涵的。即使在华人英语作家中，有些人本身虽然不通（或不很通）华语，但其文化气质和品格主要还是“华人的”。我以为这正是华人文学界在美国得以生存、发展的可靠的根基。遗憾的是，这两翼华人作家队伍，似乎至今仍未有学术性的沟通或感情上的交流。不久前，纽约方面有人把一些华人英语作家聚集一起进行会谈，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想，如果一些有号召力、有知名度、又有双语能力的作家，能够试图来一次把两翼华人作家都拉到一起来互相谈谈就更好了。哪怕只先从一般性的、小规模の座谈做起，也会很有影响力的，其目的只在于鼓舞美国华人文学界的两翼作家都能共存共荣，谋求更为辉煌的发展。不知道我的这种想法是否过于天真？

曦：你说的“两翼”分类，我懂。他们可能不想彼此沟通吧，因为写作和发表环境大不相同了——一个是美国文坛，一个是大陆文坛，而双方又有语言问题。我的一位女文友认识谭恩美，说了要介绍我们认识的，但两年了，全无动静。我也不去催她。要知道，这两种人认知和写作的中国文化背景，层次并不相同，你细读作品便知。

云：中国大陆有研究家说，当前美华文学尚处于“从侨民文学向华文文学过渡”的提法，我颇不以为然。我尤其不能同意，那种认为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美华文学作品，都“仍未脱尽华侨文学的衣装”，“缺乏美洲本土色彩”，不像东南亚华文文学那样，“具备了浓郁的南洋本土”风味等等的说法。因为其所谓的“侨民文学”，实质上就是指没有所在（侨居）国“本土性”，而只有母国“故土”色彩浓烈的文学。但虽然这是对美华文学本土性缺乏理解，尤其未能理解到，世界华文文学中的“本土性”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是有不同的特色的。所以，不管白先勇在《纽约客》中写了多少中国人“浪迹天涯而‘无根’的痛苦”，或者是写了李彤在美国生活中的迷失、挣扎和沉沦，其实都正是在鲜明的美国风土人情底下产生的美华文学中所特具的，也就是在当前历史阶段中美国华人移民所必然凸显的处于美国“本土性”的特色，这正正就是我们华人“在中西文化‘对话’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特异文学”，而不可能为别的地区的华文文学所代替。这怎么会“鲜有本土性”呢？同样的，我读过你的长篇小说《突围》、《纸婚》以及其他许多描写美国华人移民的短篇小说如《贵州女人》等等，都无不感到充满了美国本土性的描写，这是在其他华文文学中寻觅不到的。这不仅是指作品的风土人情而言，连人物的思想感情也都随着环境的变迁和生活岁月的增长而“本土化”了，只是程度或有深浅不同而已。即便是在当前颇为引人瞩目的美国华文诗坛新秀刘荒田的许多描写唐人街的诗作中，或者如我自己劣拙的散文中——比如《矜谷人》、《且说麻将》等等，也都不可能不感到“本土性”的存在。这都真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特异文学”。你在创作实践中是否也有这种理解？

曦：本土性，你的分析很好。我无补充。

云：许多年来，你在中国两岸各地作家与美国文学界的联系、交谊和沟通上做了很多贡献；同时，你对海外华文女作家联谊会的工作也做得很有成绩。我想请你谈谈最近的情况和感想。

曦：80年代，在两岸作家和学人的接触和沟通方面，我是略为多尽些力，因为那时双方尚无正式的沟通。进入90年代以来，能做并肯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多了，我便比较省心省力。关于“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联谊会已改为协会），我们已有百多名会员，入会的资格已提高（如须有出版物）。戴小华今年在马来西亚主持第三届年会（主题是女性文学）后，将升为正式会长。我曾在三年前亲去新、马和非三国考察物色，然后向二届大会推荐她，看来是个人选。我们协会今夏出版小说和诗及散文两本书，收集会员的一篇代表作。这两册书在台湾和大陆各有版本。总之，会务推动得不错。

第二次笔谈

（1993年7月20日问，7月22日答）

若曦在百忙中，几乎以第一快速的时间给我回答了不少问题，实在感激之至！

她的笔谈，正如她的为人和文风一样，是坦率而诚挚的，感到十分亲切、中肯和深入；略嫌不足的只是，她对美华文学的问题似乎仍是谈得少了些。特别因为她在回应我的笔谈的同时，更寄赠了她今年新出版的两本新著：《柏克莱传真》（散文集）和《走出细雨濛濛》（近年短篇小说新作集），使我对她这些年来取得的新的文学上的业绩有了更多的了解。粗览之下，更觉得她对海外华文文学和华人文学的发展前途的关注。除了散文集中已收入了她的几篇有关此类的文章之外，我手头还有她的一篇未见入集的《华文写作大有可为》的佳作。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请她再来一次着重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笔谈，也许还可为当前景气尚属低迷的美华文学打打气呢。

云：我在1991年参加中山国际华文文学研讨会提交的《美国华文文学之兴盛与隐忧》的学术论文中谈到，经过80年代美华文学的第二波兴盛之后，90年代开始，由于两家全美性的华文大报的倾倒，因而随之消失了两个大型文艺副刊之后，好些附有文学园地的社区性的华文报纸也跟着站不住脚而倒下了；同时，这十数年间，美国几乎没有一份公开发行的华文文学专业或综合的杂志办得下去的。强劲的政治之风压倒了荏弱的文学之风！尽管美华文学堪称质高而量多。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在上次笔谈中我也谈到，从宏观上说，美华文学的发展应当是乐观的，却仍须有所努力，有所奋争，也才能有所前进。

纵观这一两年来，美华文学的发展趋势应已有所回升。好些颇具规模的新的报章文艺副刊园地出现了。可见文学作品仍是华文报纸读者不可缺乏的精神食粮，其容量也是可观的。可惜的只是，其中两家销量最大的华文大报的大型文学副刊，都是分别从台湾和香港编版或移版过来的，后者容纳美华文学的作品量更少。（只见发表过诗人刘荒田少数几首诗）同时，有的报章的文艺副刊，看来对发表有关文学评论的文章也缺乏兴趣，也许由于“硬性”的理论文章，总比不上“软性”的文学作品更能招来读者吧？这对推动和提升美华文学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其次，我对你在《作家需要经纪人》一文中说到“一稿两投”的问题也很有同感。在整个文艺领域中，我想最“贱格”的恐怕就是文学这一门了！你看：一部电影，一齣戏剧，一幅画作等等，都可同时或不同时地轮番在不同或相同的地方放映、上演或展销，（更不必说电视剧作播映的多家重复和多次反复性了！）为何小小的一篇稿酬低微的文学作品在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的报刊发表就不能容许呢？编辑大人不仅会为此“怒形于色”，更有视同“罪犯”而大加挞伐的！相反，既然作者不可以一稿两投，而编者却可以“刊用与否一律不退”一句话即对稿件随意积压，甚至置之不理，往往只能让作者看着自己的作品“无疾而终”！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又怎能鼓励海外华文作者有志于写作呢？在这方面，我倒觉得曹又方在主持美国《中报》“东西风”副刊时，是相当开明而实际的。她公开言明：只“请勿在美洲本土一稿两投”，除此，悉随尊便；稿件也处理得相当利落而负责，甚至离职时还给作者一一发出“辞别信”，并把剩下稿件予以清理、交代。真使我难忘！还有令我难忘的是，王渝女士主编《美洲华侨日报》“海洋副刊”时，收到我的第一篇的散文投稿便立即给我来了信，以后更经常为稿子的事互通音讯，直至她到西岸访友拉稿，也不忘邀约我们这些并非名家的作者晤面相叙。这就常常使我想起，现在国内许多文坛名人，便是在这样一种报刊编辑、作者的互相扶掖中成长起来的。我认为，80年代美华文学之盛旺，这些副刊编辑实在功不可没。

近年来还兴起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作者向副刊投稿都得附上社会安全号码。这意味着一切未有打工身份的入境者（包括逾期居留来美讲学访问和旅游探亲者等等），都没有写作投稿的权利；据说这是美国国税局为了防范偷税的规定，自然报刊也属无奈。但最近，某家华文大报竟还要求连作者居留证（绿卡）或公民证的号码也得报上，否则便先扣除百分之二十的稿费作税金！众所皆知，于此电脑资讯时代，许多个人资料便是从这些个人独有的身份号码中取得的，如此一来——天啊！稿子还未知可否发表，个人的隐私权早就没了！这家大报的一个天天见报的小说专版副刊的征稿启事中，更明示要作者“用标准（何谓“标准”？）稿纸，繁体字书写”等等的颇为苛刻的条件。更难理解的还有：从一个由香港移版美国来的大型文艺副刊《稿例》中看到：它除了要作者提供香港身份证号码之外，未满十八岁的学生投稿，更得“填报监护人资料”呢！如此一来，编者的精力恐怕不是放在“审稿”，而是放在“审人”上面去了！对此，你有何感想？

曦：关于美华文学的前景，我自己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加添的意见。此地报纸要投稿人通知社安号码，是为了报税，实也无可厚非。至于要绿卡或公民证号码，果然匪夷所思——是否因为没有社安号码之故？我固知有些企业被查税，可能造成杯弓蛇影的后果。

要监护人资料，那是人格侮辱了。什么报刊？我真想骂它几句。

云：包括美华文学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都应有一个自知之明的“历史定位”。那种认为海外华文文学仍属中国文学之“边缘文学”固已脱离现实，但那种要求一切海外华文文学都应跻身于所在国的“国家文学”的主流之中才算“生根”，更是不切实际的。世界上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都可能有华文文学之兴起与发展，但并不可能都由此成为某个国家的“主流文学”。然而，华文文学“走向国际化”却是日益明显的不争事实了，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们实在也不必“有妾身未明的苦恼”。就美华文学而言，它肯定是不可能成为美国主流文学的一部份的，但它显然已发展成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的“强势文学”，这就是一件非常值得重视

的事情了。你说得好：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使命是刻划我们民族（于所在国生活——云附加）的真实面貌，延续并发扬中华文化”——这当然指的是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份，而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文化观。因此，从广阔的文化视野来说，我也不赞同有人提倡的所谓海外华文文学的“多元中心”说。我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只有多元区域性的发展，而并无所谓“多元文学中心”的存在。所谓“中心”，实际上就是“设地自限”和“自我标榜”之谓，很易于形成对立，是不利于海外华文文学之发展的。

曦：对，我赞成华文文学有区域性，不必搞甚么“中心论”了。

云：黄文湘先生最近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到：“目前，美国华文文学作家队伍正在老化，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居多”，“美国华文文学事业需要接班人”（此处，他特别加上了两个“！”）我想，从长远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而美华文学事业接班人的主要来源应当是：至今仍在大量流入的来自中国两岸三边的各种移民和留学生。但会不会有一天，移民和留学生流入的自然状态都陷于饱和或停滞的景象呢？果如此，美华文学当然就会出现危机。你是否也作过何种情况的估计？

曦：从世界人口分布看，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会处于人口过多状况，因此，对外移民应是长期性——甚至可说是恒久性吧——的现象。最近掀起的偷渡潮，即是一证（国内经济差固要外移，经济好转且环境宽松，更利于外移）。所以，大陆留学生和经济移民还会源源补充过来，其中必有要笔杆的，相信不会后继无人的。

再加上科技的日新月异，更兼商业无国界，以致华人足迹遍及地球村的各个角落……我倒以为海外华文文学的队伍只会日渐壮大，更有利于世界华文文学的酝酿和成熟。

云：你提出“集思广益地把华文文学推向全球，且更上层楼”，无疑就是所有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义不容辞的职责与愿望。而集思广益的最好形式，当然就是有效地、广泛地把海外华文文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多年来，在美华文学界中也陆续出现了不少。我很高兴地知道，你们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的会务推动得很不错。这是由于你们多年来大家都踏踏实实地做了许多工作，既无宗派或党私之争，也无名位或私利之图，有的就是互助、互爱与互容，以求共存共荣。这种情况，你们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不知道是否真的因为女性先天的单纯性所致？年来，我多少也算积极参加了一点美华文学界的组织活动，我见到的“男人世界”就复杂多了，情况使人不寒而栗！有的人就只为了名位、私欲与风头而把持虚有其名的“组织”，根本没有任何推动会务的心思，全都是“议而不行”或又“行而不议”，把一些人拉来，为的只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自封为什么“领导人”等等！只抓了巴掌大那么一个可供发表作品的地盘，就化上好几个笔名每期都把自己的“大作”往里塞，别人的文章则丢到垃圾桶里去！难怪人们常说，中国人就是那么一些天生只知“争权夺利”的动物，请你对此指点迷津。当然，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名利思想和观念，我反对只是损人利己的“利令智昏”而已。

曦：我就是有感于华人的一些劣根性，因此被推动组织“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时，我便希望以身作则地提倡多做事少当官，不计名利的风气。譬如制定会章时，我建议会长不得连任，每次年会只选副会长，由她主办一次年会后自动升任会长，如此来锻炼行政能力。十一月我们将在大马开第三次年会，戴小华出于“敬老尊贤”的好意，曾安排了我这个创会的老会长和现会长于梨华于开幕时上台致词20分钟。我立即传真去辞谢，坚持把宝贵的时间让给她人。试想，往后的卸任会长们都这么样走过场，大会还有多少时间作学术讨论呢？

以上是我的一点小小试验，权当抛砖引玉吧。

云：这几年，你由于手腕关节毛病而改用中文电脑写稿。记得你也曾劝我不妨学学。说实在的，我是学不来了。我相信，这无疑是一种可以大大提高写作效率的现代化写作方式，看你也是用得相当熟练和方便的。据说，大陆许多作家也都用起中文电脑写稿了。不过，最近我又看到报上的一则消息说，他们之中又有不少人改回手工作业了，认为还是传统写作模式好。因为文学创作常常需要很大的改动，手改比用电脑来得方便；而且，创作的灵感常如万马奔腾和电闪雷鸣般的，机械的电脑操作，有时反而可能使文思突然发生故障。我没这个经验，所以也想请谈谈这种现代化的写作方法与传统模式的比较。

曦：中文电脑写作，我相信是今后的大方向。当然，这当中有个适应和习惯的问题。我是天生的机器盲，十年来家中已淘汰了两台电脑，今年买了最新性能的IBM，有色窗和滑鼠，但迄今我也只会开机和关机。每次买新机，都麻烦懂电脑的朋友来安装和研读中文软件使用法，（他们没有一位需要用电脑写中文，仅是这点已令我深具罪恶感！）思之于心不安。

头两年我对电脑有心理障碍，屏幕跳动和不停的机器声首先就搅乱了我的文思；不小心或莫名其妙地碰了一个键，全体字幕忽然消失了，呼天抢地也叫不回来，真是气急交加，又欲哭无泪。六年了，我到今天还是电脑恐惧狂。本来写长篇连载小说还颇感兴趣的，用了电脑后，根本不敢想到长篇——短篇都吓得写不出来，《贵州女人》短篇小说集中，有几篇是用电脑写成的，出版以后整四年，才又结集出版《走出细雨濛濛》，而实际上我已将近三年不写小说了。

对我来说，电脑似乎较适合散文，尤其是杂文的写作。加上时间零碎，我很习惯于用电脑写专栏文章，即俗称千字文。和你说的恰恰相反，电脑写作的最大好处是：修改容易。我现在的毛病是，没有电脑便不想写文章——写短信尚可。一则手痛，而修改也太不方便了。

台湾作家很多已转入电脑写作，大陆文人这两年也紧跟形势。1989年我便接到邓友梅的电脑打字信。我知道王蒙、谌容……也都用电脑打字了。戈云老友，劝你赶快“迎头赶上”吧！

我们的笔谈，就这样犹如闲话家常般结束了；虽无警人之语，亦无深奥之谈，但想来也不无可以醒人耳目之处。为此，让我再向若曦大姐说声谢谢！

——一九九三年七月廿八日至八月五日，
整理、贻正于旧金山湾区梦思阁。

责任编辑：童 轩

略论台湾“文学文化化”的趋向

朱 双 一

近年执编《联合文学》的台湾诗人初安民，在该刊1992年元月号以《文学文化化》为题，首次明确提出“文学文化化”的口号，称之为未来两年《联合文学》所要追求与努力的方向，并引用维克多·赫尔所著之《文化理念》为“文化”下了如此定义：所谓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模式及心态，以及为经营某种生活所酝酿出的种种精神及物质层面的活动。”无独有偶，1992年6月，在另一重要文学期刊《中外文学》创刊20周年纪念专辑上，总编辑廖咸浩撰文表白其办刊宗旨亦写道：“我们也意识到文学与文化的不可分割。因此，探讨文学的文化意义，实践文学的文化使命，也将成为‘中外’的关怀焦点。”再观察一下这一年的文坛状况，就可知所谓“文学文化化”，已不仅是期刊主编们的口号和理想，而是明显的事实和发展趋向。

比如，文学杂志、报纸副刊上综合性文化内容明显增多，就是“文学文化化”的明显表现。《联合文学》实行了内容重心的倾斜，延续和新辟了一系列文化性专栏。如励志类有星云大师口述的、将现代人生感悟和佛教义理揉合在一起的《话缘录》、尹明的有关道德、法律、社会关系等论说的《观念作业》，傅佩荣辩证地讲解人生道理的《人文小品》等；艺术类有翁嘉铭等的将流行歌曲歌词的阅读作为“观察大众社会集体情绪的表征”的《流行歌店》，而王文华概括被称为都市雅辈新人类族群共同特征的《欢笑PUB》，伊说回溯传统农业社会的风土人情、婚姻习俗、家庭关系的《小说内埔》，也具有较浓郁的文化品味。此外，还推出了《梦文化》、《旅》等专辑。后者包括《映像之旅》、《文学之旅》、《美术之旅》、《心灵之旅》……等，拓展了传统游记的文化内涵。报纸副刊原本较多刊登小说、艺术散文，这一文学园地现已为讨论和反映社会文化问题的论述类、报导类作品所充斥。以1992年6月21日至27日一周内的《中时晚报》为抽样，其专栏名目竟有“传真篇”、“办公室涂鸦”、“台湾观察站”、“拆除大队”、“校园小耳朵”、“后视镜”、“文化笔记”、“学生无住屋系列”、“滑翔梯”、“全球零时差”、“东瀛物语”等，涉及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1992年内几家报纸新任的副刊主编也显露了对“文化”的格外注重。如《台湾时报》的王家祥决定“将风格走向定位在环境保护、自然保育、本土文化和社会关怀上”。《自立早报》将副刊分出“地球村”和“台湾岛”两个版面，后者着重本土文化，用乡土故事和报导文章让忙碌的都市人回味乡土的亲切和温馨；前者则针对世界性、国际性现象和问题，提出概念并加以讨论。《自由时报》的张启疆针对传统副刊的文学本位，指出副刊应属于文化性版面，拓展文化的领域。

实际的文学创作也出现“文化化”倾向，并带动文学书籍出版向此倾斜。小说家张大春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80年代的台湾文坛出现三个新的文学潮流，即“新马潮”、“仿昆潮”和“后设潮”。“新马潮”是仿学奎斯的“魔幻写实”，“仿昆潮”是模仿米兰·昆德拉小说中充满大言汹汹的雄辩和议论，“后设潮”则是不断暴露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过程。这三种作品显然都包含着较丰富的文化内涵。如“魔幻写实”常向原始神秘色彩的民族传统文化领域纵笔；仿昆作品的议论往往涉及文化、哲学的广泛问题；而后设小说对传播媒体和语言本身的质疑，正是当前资讯爆炸的后现代文化环境的反映。此外，一些倾向写实主义的创作，同样极为关注台湾社会的文化环境问题，而这类作品也为文坛所重。如纵笔于下层边缘、隐密社会的异文化领域的一些作品，像姜天陆《夜祭》、廖嘉展《月亮的小孩》、曾淑美《青春残酷物语》等在大报文学奖上获得青睐，就是例子。在出版方面，涉及人生文化方方面面的宗教禅学、畸型异色情调的作品，导引生活的励志散文、笔记、杂志、极短篇等，占有最广大的读者市场，各出版社纷纷以不同的风格来争取读者的更多认同，“举凡政治的、宗教的、演艺的，等等，都以迹近文学形式的包装，拓展了文学的可能领域，同时也混淆了文学的界定内容。”（初安民《新品味》，《联合文学》1992.2）

1992年台湾文坛“文学文化化”的第三个表现在于，文学批评领域也出现了宏观把握文学现象和社会文化思潮，将文学研究放大为文化研究的趋势。如《联合文学》举行的前一年度“十大文学好书”评选活动，组织百名作家和一般读者的选票，并与书店畅销书排行榜相比照，从而指出社会文化品味的特征和流变。在对具体作品的评析方面，如罗智成评蔡诗萍的《三十男人手记》作序，从蔡著中概括出当前台湾社会的“浪漫、困惑、年轻、自恋”的时代精神特征；杨照评析阿盛《秀才楼五更鼓》，指出其“逐渐放弃旧式以帝王将相等政治人物、事迹为历史重心的观念，转而朝向社会史研究一般平民生活面相的方向靠拢”，都显出从社会文化角度诠释作品的用心。在推介大陆文学作品方面，纯文学的先锋派作品亦从未在台湾真正流行过，最为风行的乃是中国文化品味十足的“寻根派”作品。

“文学文化化”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颇为复杂。一方面，它是一批富有文化使命感的作家面对益发严重的“物质巨人，精神侏儒”的文化沦落现象而作回应，也是他们的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为大众消费文化的侵蚀和纯文学的萎缩。从历史观点来看，当前的这一趋向其实早在20多年前即已开始其进程，并经历了不同时代环境下的复杂演变而成为今日的景观。

二

当代台湾的“文学文化化”进程首先是伴随着60年代末乡土文学思潮的崛起而发轫的。70年代初期以“现代诗论战”为中心事件的对6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普遍反省运动，可说是它的第一个浪潮。论战的强势一方所揭橥的关切现实生活、接续民族传统的方向正是对现代主义的具有高层文化性质的纯文学倾向的反拨。它以更广泛关注“文化”来取代纯文学对文学本体的注重，通过对作品充实现实内容来纠正偏重于艺术实验的形式主义弊端。在破的方面，他们批判现代主义只在那儿玩弄语言、色彩和音响上的苍白趣味，絮絮不休地缠着些形而上学的“理论”和“哲学”，而犯了思考和知性上的贫弱症。（陈映真《现代主义的再开发》）在立的方面，他们普遍要求民族性的归属，而民族性乃是民族历史文化多元整合的结

晶；又要求现实性落到实处，认为：“文学活动就是人类文化的一层，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地盘上，它必然要有牢固的支柱：一定的时空因素，一定的社会内容，才能撑张起它做为辉煌的上层建筑……文学必要依循着社会的需要，决定它创作和发展的路线。”（赵知悌《现代文学的考察·序》）这样，他们就将文学与“文化”……融聚着历史和现实、物质和精神诸因素的生活模式、心态和活动一一结了缘。这论战本身的特点亦显出“文化化”的倾向。此次论战与以前数次诗坛论战全然不同，焦点已不仅在于形式的新旧之争，语言的晦涩与明朗之辨，结构的完整和破碎之分，而是在于什么样的文学才能影响社会生活，造成社会的进步。

稍后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为代表的由“小副刊”、“冷副刊”向“大副刊”、“热副刊”转变，或者说由“文学”副刊向“文化”副刊转变的所谓“媒体革命”，是70年代“文学文化化”的又一重要体现。前此的台湾报纸副刊，可说基本上延续着林海音50年代在“联副”所确立的纯文学路向。而高信疆接办“人间”副刊却一改前此副刊的刻板印象，走出了旧有的“文艺”格局，开创了崭新的“文化”天地（向阳《副刊学的理论基础建构》）文化评论家詹宏志曾概括了高信疆主持的人间副刊的导向及其对70年代台湾文坛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一是本土文化的认同：它最早以副刊探讨社会问题，报导乡土民俗，肯定民族尊严，引起民众对本土文化反省与认同的热潮；二是现代文学的反省：它发表关、唐等人对现代诗批评的文章，引起现代诗的争辩，对60年代文坛的西化浪潮，作了强烈的修正，影响和推动了新一代的乡土写实的创作；三是提倡报导文学，引起很大反响；四是塑造典型人物，如报导洪通与朱铭的人物与作品，创造了新闻人物的新形象；五是提供知识分子向百万群众发言的园地。由于“文化诸层面的社会功能”的开拓，“使得副刊不再只是文艺青少年的读物，而广为文化界喜爱。”（詹宏志《纸上风云第一人》）

推动报导文学使之蔚然成风是人间副刊的一大功劳，也是“文学文化化”的重要方面。报导文学是文学与新闻联姻的“边缘文体”，其形式本身已超出了“纯文学”的范畴。而台湾的报导文学，由于崛起于特定的时空，从一开始除了反映现实，特别是底层民众和特殊族群的困窘处境外，这纵笔于环境保护，人文关怀等领域，组成了台湾报导文学的三大题材系列。以后者为例，许多台湾报导文学作者，如林清玄、邱坤良、马以工、李利国等，致力于历史文化、先民古迹、乡土风情、民俗技艺，以及具有各种专业特长或特殊精神品质的文化人的挖掘和描写。环保系列和人文系列的形成，使70年代台湾的报导文学超越了大陆30年代的报导文学作品而具有更为开阔和深邃的文化视野。

1977年爆发的“乡土文学论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将70年代的“文学文化化”推向一个极端。其实，这场论战早已不是一场“文学”的论争，而是涉及了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意识形态诸领域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双方对于艺术表现等文学本体的问题几乎全无涉及，争论者至多只涉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是应歌颂还是暴露、“人性”是普遍的还是阶级区别的等文学外缘的问题，更为耸动视听的，却是关于台湾是否属于殖民地经济、台湾目前是繁荣安乐还是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严重的黑暗面等问题的争辩。由此可知，这场论争实际上是以文学为藉口和主要载体而展开的对当前台湾社会性质的辨析、对社会现状的审视以及对社会未来方向的讨论。它说明这时的“文学”与60年代的“纯粹”状态不同，担负了推动社会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的重任，而其本身也成为这个思想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

分。

尉天骢对70年代台湾产生“文学文化化”现象的回顾堪称精辟。他指出：“七十年代前后，由于台湾经济成长所带来的激变，和本地中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再加上钓鱼台事件对海内外中国青年的刺激，以及联合国事件后有关台湾问题的思考，便使人不仅对现代主义的思考方式作了检讨，也同时对于工业主义和消费制度作了一番探索。它的第一步便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我们的文学，乃至我们的政治经济，在外力巨大的影响下，应该选择怎样的方向。第二步，由于科技文明高度的膨胀，制造出种种问题（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战争危机、道德败坏），遂令人不能不去思考：怎样的生活方式才是人类最理想的方式？怎样的艺术才能有助于我们生活气质的改变？这样，便由文学的反映的问题进而至于作家的道德问题和信仰问题；由西化文学的传统问题进而至于中国文化传统重新建造的问题。而关于这些方面的思考，台湾原有的现代主义是无能为力的。这样，它就必须有限的局面中走出来，这就是乡土主义兴起的原因。”（尉天骢：《由漂泊到寻根》）这同时也就是台湾文坛“文学文化化”的原因，因为“文学文化化”就是伴随着乡土文学思潮的兴起而出现的。

70年代的文学、文化思潮某种意义上是相对于“西化”倾向的一种本土化运动，而这个运动的产生，源于台湾社会矛盾的激烈震荡：一方面有人越是急着取得外国籍，越是急着把财产转置国外，越是不择手段地求取暴利；另一方面就会有人更激烈地抨击崇洋媚外，更急切地呼叫热爱乡土，更狂猛地向特权与黑暗势力挑战。蒋勋自称自己的出国留学，正是带着“那一时期台湾地区的中国人共有的不安、彷徨、困惑、焦虑、与郁怒出去的”，因而难于把持自己民族与其它民族平衡的对等关系。为了解决这不健康的情绪，他“扩大了自己原来专注于艺术史的研究，开始扩大地旁涉到文化史各类别中的关系”，并“开始用泰纳治艺术史的方法来分析自己民族的历史”以及自己所处的历史坐标——20世纪的中国。蒋勋从而较早地指出：“台湾地区今日中国文化发展的问题，当然是鸦片战争以来整个中国文化问题不可分的一环。但是由于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历史经验，它在文化上所呈现的复杂性也是中国其它各地区所少有的”。它大致包含几种不同的系统，即：原住各山地民族的文化特色、荷兰与西班牙短期占据所遗留的文化，明郑以后中原大量汉移民建立的文化体系、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的文化影响、1949年以后中原各省习俗在台湾的又一次融合、近二三十年来大量涌入的美日商业文化等。这复杂的文化现象可归结出必然的发展趋势。如在目前，“原住山地同胞，荷兰、西班牙的文化遗留，甚至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的文化影响都已经慢慢不再是主要的文化力量。剩下的就是明郑以来各时期中原汉移民建立的文化体系与近二三十年来大量涌入的美日商业文化之间的一场决战。”人们事实上“还继续着鸦片战争以来‘封建余孽’与‘假洋鬼子’相争持的问题，努力的重点还是继续着‘反封建’与‘反帝国主义’这五四以来的一贯工作。”

对时势的危机感和忧国忧民的使命感，使部分台湾作家不甘于再蹲守于纯艺术的“象牙之塔”，而力图从“文化”的宽广视野，对社会做更深邃、广阔的观察，找出社会问题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症结所在，从而为社会的改革和进步奠定努力的方向。这正是70年代台湾“文学文化化”的主要目标、性质和正面意义之所在。

然而，70年代台湾“文学文化化”也不可避免地带着自身的某些缺陷。龙泉明在《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一书中认为，中国现代作家以“现实功利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使得

“中国现代文学缺乏个性焕发的理想色彩和无边无际的艺术想象，缺乏严格的内在推理式和深致的理论探索，缺乏超现实功利目的的更高层次上的艺术审美观照”。刘纳也认为，文化批判和文化追寻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意义指向的重心，以“文化”为切入角度的思维方式，不但几度支配着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思维，也主宰着作家的创作思维。随着社会现实的急剧变化，将“文化”狭窄化与泛化的倾向交替出现，而文化视野、价值取向的转换不断为作家提供着新的文学表现的可能性，同时又总是从另外的角度限制文学的表现范围和表现深度，“因而，当我们肯定着现代文学在文学批判与文化反思方面的意义时，我们又不能不指出正是这种充当‘文化’载体的意义取向限制了中国现代文学向更深邃的精神领域和更广阔的艺术空间的开拓。”（刘纳《文学和文化的组结》，《读书》1993.5）这一对五四以降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整体性评价，移用于承续了这一新文学传统的、以乡土文学思潮为主导的70年代台湾文学，显然也是恰当的。

三

“文学文化化”的趋向在80年代仍继续发展。1983年，刊行了近20年的《台湾文艺》改组，由纯文艺转为兼容本土文化、民俗民艺的探讨。在80年代初开始执掌《自立晚报》副刊的向阳则从社会的多元化、读者取向的逐渐受到重视、编辑人生命的更加恢宏等三个方面，主张“文化的关注（文学退居于其中一部分）乃成为有理想的副刊编辑之着眼所在”。同时，这几年有的大报文学奖也增设了文学评论奖。80年代的“文学文化化”出现的新特征和变化，主要表现在它分化为若干脉流而有各自的发展，并相辅相成地构成新的文坛生态。

首先是继续着70年代“文化反思”方向发展的一脉。它承继着70年代的改革社会，提升人的道德生活品格的文化理想，同时又有了某些新的变化，由较偏狭的层次向着更恢宏的境界发展。70年代关注着社会文化的“乡土派”作家，其改造社会的勇气和理想固然是可敬的，但他们的创作或立论常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社会、描写社会，其眼光常注视于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而忽略了“文化”的其它更丰富的内涵。到了80年代，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修正。如尉天骢就明确提出80年代的台湾新文学要开始“从文化的层次来思考”，批评了泛政治主义和孤芳自赏的狭隘乡土趣味，强调作家需具备“世界的眼光，文化的眼光”（尉天骢《由飘泊到寻根》）。显然，随着台湾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向着美式福利社会方向的转变，文坛的理论焦点已不再停留于穷人与富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或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立场选择问题上，而是从劳资矛盾等阶级斗争问题，转向更广泛的社会制度、法律道德等文化问题，将整个台湾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纳入视野。龙应台从事社会文化批评的杂文、马森等作家围绕文化所作的论述等，均为显例。又如80年代兴起的高山族作家的“山地文学”，将政治问题置于更广大的文化背景中。魔幻现实主义和科幻作品在80年代的兴起，显然也与文坛的涵容历史和未来的新的文化视野有关。境界的扩大、焦点的转移再加上时代变迁的因素，使某些作品在气质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们一反作品中以政治经济、社会阶级斗争素材为主的常例，而融入了更多的知识性、人文性材料。80年代环保文学即是将一般社会问题扩大为整个人类生存问题的观照，同时又包含着丰富的人性题材的典型例子。

70年代的环保文学，以报导性作品最为常见，兼含诗和散文作品，到了80年代扩大到了能对人性进行更深入刻划的小说等领域。如韩韩、马以工合著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就

显出感性和知性的融合，兼具词藻之美和科学之真。环保诗则常有人性的杂揉，白礁的《白鹭鸶的抗议》寄托着遭受威胁的生命对于生存的企望和挣扎。环保小说常将环境污染与政治问题结合在一起考察，如宋泽莱的《废墟台湾》描绘出一幅台湾岛在极端黑暗的专制统治及日益加剧的严重环境污染中毁灭的可怕前景，使小说超越了一般仅触及环境污染表面现象的作品而具有更强烈的批判性。

环保文学扩展其文化视域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刘克襄的“鸟散文”和“鸟诗”，因它将环保这一80年代台湾的社会焦点问题，与赏鸟和鸟类知识的搜集等人文活动结合起来。刘克襄像漂鸟一般历遍台湾的山山水水，数十年如一日从事鸟类的观察、摄影和报导，而这并非纨绔子弟的闲情逸趣。他赏鸟活动及相关的文学创作至少有以下实际意义。一，有关的撰著将成为台湾当前所缺少的经过长期完整调查而又有文学意义的生态书籍，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周围花草鸟兽的认识，而这正是全体民众“参与生态危机共识的基础”。二，其赏鸟活动本身就具有提倡“知性旅行”的表率作用。他曾针对海水浴场万人麋集而半里外的赏鸟现场形影孤单的反差而发出忧虑的叹喟：“几十年来，同胞们对自然的态度一直未改，无法将感官的游乐方式转变得有益于教化，形成知性旅行的风尚。这种恶习继续不变，每过一代将会付出巨大痛苦的代价。”这显然已超出了一般的揭示环境污染的报导性作品，而具有更广泛的文化意义。

80年代，随着台湾的都市化进程及都市文化意识的强化，“文学文化化”有了新的发展和新的内涵。它由原本比较执一的方面转而反映更广阔的、包罗万象的社会文化现象，从而将多元混杂的都市景观展露无遗。如黄凡《伤心城》、王幼华《两镇演谈》等小说作品中，有意在情节主线外插入大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资料。在一些“新人类”作家笔下，已少见富有个性的人物，而偏重于性格划一的都市人群象的描摹，从而更直接地呈现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也就是文化的风貌。新崛起的都市文化不仅影响了文学作品的内容，还在其它方面发生作用。比如，资讯传播的发达，是在工业文明逐渐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台湾都市社会对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影响并波及文坛的重要方面之一。部分作家尝试采用各种现代传播手段，使原来流传于小圈子内的“尊贵”而又“纯粹”的文学走向大众。诗坛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现代诗人一反对诗的“纯粹”性的严格要求（如诗与歌的分离、避免科学术语等非文学因素入诗），而求“不纯”地为大众提供精神食粮（参见《阳光小集》第十期社论《在阳光下挺进》）。进入80年代后，将诗与各种现代传播媒体相结合的尝试蔚然成风。如1980年6月，《联合报》策划《水调歌头》“诗与歌之夜”；1981年7月和1983年1月，《阳光小集》举办“中国现代新诗与民歌欣赏会”等活动；1983年1月，诗人画会在西门町闹市区广场上举行“艺术上街”活动；1984年12月，新象艺术中心主办的“中、意视觉诗联展”；1985年“中国现代诗季”中“诗的声光”演出，运用摄影、幻灯、8cm电影、默剧、柳叶琴伴奏、布袋戏等媒体来“朗诵”新诗，同时举办“现代诗与大众传播”座谈会；1986年3月，罗青、白灵等策划“诗的声光——现代诗多媒体发表会”；1986年9月，《文星诗页》举办“诗路之旅”活动；1987年5月，台湾各大学17个诗社参加“现代诗的复式艺术演出”交流展览会。此外，洛夫等一些诗人的诗集首发时均举办演唱会。此类活动到90年代仍不绝如缕。这些活动运用激光、录像、录音等现代科学手段，将演、唱、吟、朗诵乃至绘画等融为一体，使原本十分“尊贵”的诗文体，以较为可亲的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

中西小说的渊源与形成过程

饶芃子

中国古代“小说”这个名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指的是与高言宏论相反的琐屑之谈，不具有文体的意义。东汉初年，桓谭在《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首次在文体意义上运用“小说”这个词。稍后，《汉书·艺文志》也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所谓“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也就是“丛残小语”，就是琐屑的形式短小的“短书”。这一观念，后来因袭下去，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人对“小说”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从汉到清二千年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中国的古小说多为形式短小的琐语。《四库全书》将小说分为三类：杂文、异闻、琐语。把各种杂著称为小说，却不包括清以前的唐传奇和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这说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小说”概念，同现在作为文学概念的小说是不相同的。现在所指的小说，具有叙事性、形象性、虚拟性、散文性等基本要素。我们正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点，来追溯中国小说的渊源及其产生、形成过程，并以它同西方小说的渊源和产生、形成过程进行比较的。

—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很早就出现叙事文体，如神话、史诗、寓言、实录、故事、传

然而，“文学文化化”的这种大众取向，在当前台湾社会中有完全变质的可能。在大众消费文化的挟带下，文学固然也有广泛引入各种文化资源的表现，但这主要用于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以及文学产品本身的行销目的。如特受青睐的感性散文，追求篇幅短、文意浅、影像多、题材和表达方式为读者所习见。而历史人文、宗教禅学等文化资料，成为畅销不衰的人生小品、爱情散文的重要佐料。工业产品的包装策略也被用于文学作品的产销上，这时的文学书籍特重影像包装，偏重于文学的美感排列和大量精心设计的插图，而书籍内容反成为无足轻重的配角。这样的文学产品表面上似乎与“文化”有更密切的关联，而无形中已抽空了70年代那种扩大社会关注层面，提升社会人文情怀的文化理想。

“文学文化化”近20多年来的发展，紧紧对应着时代的变化，至今呈现着益发蓬勃的面貌，预示着它还将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台湾文坛重要发展趋势之一。它既有密接大众和社会现实的特点，同时也面临着庸俗化的陷阱。应如何顺应时势调整文学观念，而又努力保持文学和文化的某些永恒不坠的理想，在这二者之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均衡，已成为台湾文学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所幸的是，我们已看到了这方面的努力。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

责任编辑：陶原珂

奇等。但是，小说作为叙事文体最成熟的类型，却是很晚才出现的。在中国，唐传奇是最早的小说；在西方，小说的形成是在文艺复兴前后，它的成熟和繁荣还要更晚一些。

西方小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的神话和史诗。古希腊的神话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在各个部落流传了几百年，现在通常所见的神话是从奴隶制古典时期各种古籍中搜集、编写的。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方面的内容：神话故事主要是关于开天辟地、神的产生、神的系谱、人类的起源和神的日常生活故事；英雄传说是关于远古的历史、人和自然斗争的各种英雄故事。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出现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公元前6世纪正式写成文字，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重要作品。荷马的时代是欧洲社会从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过渡的时期，荷马史诗中有不少古希腊的神话。荷马史诗中有“人类童年”时代才可能有的天真美丽的幻想，也有人类早期那种朴素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这两部史诗包括了各类史诗的特点，是近代欧洲史诗的典范，后来欧洲的许多作家都从其中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取得素材。古希腊的神话和史诗，在后来的悲剧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同时也直接影响到西方小说的产生。

中国古代没有象荷马史诗那样的作品，但有丰富、美丽的神话传说，它们是中国小说产生的源头。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有许多是记载远古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人们借神话歌颂敢与自然搏斗的英雄，传播与自然斗争的经验，寄托战胜自然的理想。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鲧禹治水等神话，都集中体现了远古人民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这些神话是劳动的产物，神话中的英雄，是远古人民智慧、力量和愿望的化身。它们开始在民间口头流传，经过群众长期的艺术加工而日益丰富和系统化。这些神话传说没有专门的集子记载和保存。屈原的《离骚》、《天问》、《招魂》、《九歌》等诗歌里，有不少神话传说的材料。《庄子》、《韩非子》、《淮南子》、《列子》等哲学著作里，也保存了一些神话传说。《山海经》、《穆天子传》记载了许多神话传说，可视为这方面的“专书”。《山海经》记述名山大泽、奇花异草、珍禽怪兽，以及鬼神灵怪。《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游猎中之所见，明胡应麟说它“文极赡缛，时有可观”、“颇为小说滥觞”。①《山海经》和《穆天子传》是后世志怪小说的发端。

中国唐传奇以前的小说，通常称为古小说。古小说还不是小说，而是小说的原始形态。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是古小说发展的基础。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没有明显的界限，而且互相渗透，不少神话中的英雄在民间不断流传加工，后来就变成传说中的人物。但同神话相比，传说中的人物较接近现实的人，情节也相对曲折些。神话传说本身是故事，有简单的情节，有人物形象，这些都直接间接地为后世小说的产生奠基。

中西小说都是在古代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同的是西方古希腊就出现了最早的叙事文体“史诗”，神话传说对后来小说产生作用主要是借助于“史诗”；而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虽多，但记载杂乱疏略，对后世小说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志怪一类。

二

小说与西方早期叙事文学在形式上的区别在于，小说是一种散文作品，而西方早期叙事文学是诗体的。中古时期欧洲出现的少数用散文写作的叙事文学，是从史诗向后世小说过渡的一种文学形态。中古欧洲的英雄史诗中，有一类是反映氏族社会末期生活的，主要是歌颂

部落的英雄，多以神话或历史的人物事件为依据。在这一类史诗中，冰岛的《埃达》、《萨迦》占有重要的地位。《埃达》是诗体。《萨迦》是散文叙事文学，内容包括史传、英雄传说、旅行记、家族史话等。这些作品保存了北欧神话传说和史传故事的丰富材料，向来为欧洲文学史家看重。作为西方较早用散文写作的少数叙事作品之一，《萨迦》在小说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应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除此以外，十二三世纪，在西欧骑士文学的繁荣时期，也出现了散文体的骑士传奇。当时，骑士文学最兴盛的是法国，但法国北方骑士文学的主要成就是骑士叙事诗，一般篇幅较长，内容多是写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情，也有写他们冒险和征讨的故事，情节离奇，在虚幻的故事中表现骑士精神。在这些骑士叙事诗中，写大不列颠王亚瑟和他的圆桌骑士的作品比较多，十三世纪还出现了这一题材的散文体骑士传奇。当时流传的《奥卡森和尼柯莱特》，就是一部用散文和诗交错写成的作品。亚瑟传奇在当时最闻名，它们的结构形式、人物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等，对后来欧洲的长篇小说有一定的影响，而它们当中的散文体作品，在语言形式上同后来的小说应有更直接的联系。十三世纪以后，用散文写的更多，便逐渐发展成为故事小说。

西方早期的叙事文学，最发达的是史诗，从史诗到小说，有一个从诗体向散文体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最发达的是史传文学，它本质上是历史，是用散文写的，不是诗。中国的史传文学，对后代的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对小说影响的角度看，《左传》以写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见长，且有许多戏剧性的故事和场面；《战国策》以记言为主，当中有许多奇行异智的记述；《史记》的人物传记，以写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人物性格鲜明突出，又有比较完整的故事结构，人物活动背景也很广阔清楚，达到了史传文学的高峰。在那些刻画人物的传记中，已包含着小说的某些因素。所有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小说都有重大的影响。

小说之所以能够完成史诗无法完成的艺术使命，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就是因为它是散文语言为工具的叙事文学。用“诗”叙事，只能粗略地摹写，“空白”太多。而以散文为语言工具的小说，在这方面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能自由地创造出富于价值和美感的艺术世界。用散文体叙事是小说同史诗和讲唱文学的区别，也是小说的艺术规定性之一，从西方早期史诗到散文体叙事作品的出现，也成为催生小说产生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小说同实录文学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描写的是“虚拟的人生”。所以，中国古代的史传文学，虽然在当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它们写的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不具有艺术的虚构性，还不是小说，只能说它们当中孕育有小说的因素，为后来小说的产生提供了某些借鉴，使中国小说在其酝酿、形成的过程中获得了特殊的营养。

三

中国小说的最早形态，是魏晋南北朝的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形成，直接受到史传文学的影响，还没有最后摆脱依附历史著作的状态，只能说是小说的雏型。为了把它区别于唐传奇以后的小说，人们通常称之为古小说。古小说大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大类。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把小说分为六种：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②现在看来，丛谈、辨订、箴规三种，不具有文学意义，是笔记。传奇始出于唐，也不在古小说范围，他举的例子，除个别篇目外，主要也是指唐人作品。在古小说范围内的只有

志怪和杂录二种，而这二种正是唐前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

鲁迅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也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涂，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④他指出了志怪小说的兴起与社会上宗教迷信的风气密切相关。志怪小说内容十分庞杂，大多属于神仙灵异、佛教因果报应，人鬼交往的故事。这些故事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是炫耀地理博物之琐闻（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等）；二是夸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如托名班固的《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等）；三是讲述鬼神怪异、人鬼交往的故事（如干宝的《搜神记》）。这些故事最有小说意味的是第三类。《搜神记》中有许多美丽的民间传说，其中《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斩蛇》等，是人们熟知的作品。此外，刘义庆《幽明录》中描写爱情的故事，也很动人。志怪小说在文学史上留下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们为唐代传奇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志人小说的兴起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东汉后期，上层社会形成了品评人物的风气，魏晋以后，士大夫好尚“清谈”，品评人物的风气臻于极盛。因此，就有人把一些知名人物“清谈”的内容、风度影响等记录下来，编成志人小说。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它把汉末至东晋间士阶层的遗闻轶事，分为36类进行记述。志人小说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情态；善于即事见人，通过生活中的某一场面、一次精彩的对话，用细节描写出人物的特征，语言精炼生动。这类作品对后来《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有直接影响。

艺术内容的虚构性是近代小说的规定性。在小说的雏型阶段，志怪小说比志人小说有更多的小说因素。志人小说基本上是记真人实事，志怪小说则是虚构的，有丰富的想象和幻想，有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相对完整的情节。这些因素在后来各个时期各种条件的作用下，不断增长、扩大、完善，到了唐代，又吸收《史记》等史传文学刻画人物的手法，随之演变出相当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传奇。唐以后，白话小说兴起，志怪题材仍占极大比重，宋话本有灵怪、烟粉、神仙、妖术诸类，明清章回小说有神魔小说。其它小说同样含有程度不同的志怪成分，在艺术想象和表现方法上接受了志怪的启示和影响。

在西方，中世纪欧洲流行的传奇故事，对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主要是开拓了艺术想象的世界。神话和传奇都具有活跃不受限制的思维特点，但神话“是一种无意识虚构，而不是有意识虚构；原始精神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创造物的意义”。^⑤传奇是有意识的虚构，作者通过虚构在作品里创造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具有早期小说的本质特征。

十一二世纪，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已完全确立，出现了骑士阶层，与此相适应，出现了骑士文学。骑士文学包括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同后来小说有密切关系的是骑士传奇。骑士传奇不同于英雄史诗，没有史实根据，出自诗人的虚构，大多是从民间传说和古希腊、罗马的故事延伸出来的，主要表现骑士的生活理想和爱情观点，表现冒险游侠的精神。骑士传奇题材狭窄，多以一、二人物为中心组织故事情节，重视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腻描写，人物对话较生动活泼，故事较长，在艺术上已具有近代长篇小说的框架。

小说的发展，与商业文化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分不开。在西方，最早的城市文学是韵文故事。西欧各国从十一世纪开始，随着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城市，形

成了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阶级。城市文学是适应市民阶级文化娱乐的需求而出现的，其主要特点是反映社会面广，故事性和讽刺性强，当时最流行的《列那狐传奇》就是显例。它把动物人化，赋予他们以人的思想、感情、语言和行为，借以影射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表现当时新兴市民阶级的某些意识和观点。在城市文学中，长篇故事诗《玫瑰传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玫瑰传奇》约写作于十三世纪上半叶。由于作者洛利斯未写完就去世了，后由墨恩续作，所以上下两部思想内容极不相同。上部写的是骑士爱情，下部则是表现市民阶级的思想，触及了当时的许多社会问题，批判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谴责教皇和贵族，是中古时期有影响的作品，也是中古欧洲最早表现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品之一。中世纪的城市文学表现了市民对世俗生活的兴趣，具有较多的现实主义因素，它所创造的是与现实有重合之处的虚构世界，这些故事的主题和模式，为后来的小说提供了表现现实的基因。可以说，传奇是小说的“幼年”，它的虚构是超现实的。当它发展到面向现实的时候，小说就产生了。

拿中国小说的雏型——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同西方小说的初级形态——骑士传奇和韵文故事比较，它们在中西小说形成、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十分相似。如果说，志怪小说和骑士传奇对后来小说的贡献在于它们的虚构性，那么，志人小说和城市文学则为后来的小说展示了叙事的客观性；而虚构性同叙事的客观性的结合，正是小说同纪实文学、抒情文学以及戏剧的区别。

四

中西小说都是在古代故事的土壤上孕育形成的，故事是类别最广的文学形式，小说是讲故事的一种特殊形式。小说和故事明显的区别在于：小说不仅讲一个故事，它还通过故事塑造人物，反映社会生活，抒发和分析感情，展示人物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反应，并给这一切灌注以作者的思想，使其具有结构和审美的意义，其整体效果能引起读者感情的共鸣，启发读者对人生现实社会历史等各种问题的思考。

从中国小说的发展史看，中国小说正式形成的标志是唐传奇。唐传奇直接继承了六朝志怪小说的传统，又接受了史传文学的哺育，从而有了巨大的发展。鲁迅说：“小说也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元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⑤这是符合实际的论断。

唐传奇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从初唐到盛唐，是唐传奇的兴起和初步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写的仍属于奇闻异事，艺术上未脱尽六朝志怪样式，但篇幅已较完整，描写较细致，颇有故事性，已初具传奇规模。这时期的作品只留下《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游仙窟》三篇，都不能算是好作品。二、中唐时期是传奇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名家辈出，佳作甚多，代表作有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等。这些作品艺术上相当成熟，不但结构完整、情节曲折动人，而且开始刻画人物性格，并且有了显著的成就。三、晚唐时期是传奇进一步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作品的成就不如上期，但数量大大增加，还出现了一些专集，如牛僧孺的《玄怪录》、薛用弱的《集异记》、裴铏的《传奇》、李复言的《续弦怪录》等。这表明传奇已成为独立文体，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内容上除了写志怪爱情婚姻外，还出现了大量豪侠主题的传奇，如《红线传》等，但这类作品有较大的局限性。

唐传奇的繁荣是从中唐开始的。中唐以后，城市经济在盛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长安、洛阳、扬州等地手工业、商业繁荣，城市居民大增，优伶娼妓也多起来，文人士子与她们的关系相当密切，写反映他们生活的传闻轶事，以及某些民间爱情故事，一时蔚然成风。这是爱情题材传奇产生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唐代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很多，宦官专政，党争迭起，失意文人因为对功名的幻想破灭，从而产生逃避现实的心态，人生如梦，求仙访道，颓废感伤的情调浓厚起来。沈既济的《枕中记》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一类作品是其反映，这些作品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讽刺了一些知识分子热衷功名的思想，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

唐传奇之后，白话小说取代了文言小说，成为小说的主流。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变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小说本质上是一种市民文学。中国小说之所以诞生于唐代，是因为唐代出现了工商业繁荣的城市，产生了市民阶层，小说是同他们文化生活相适应的文学。但唐传奇是用文言文写的，出于文人之手。到了宋代，市民阶层壮大了，为适应市民的文化生活需要，“说话”业十分发达，“说话”艺人同书会文人合作，共同创造了用白话文写的话本。宋代话本往往是相传颇久的集体创作。它们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某些要求，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其中最突出的两点是：揭露冤狱，鞭挞官场的黑暗和表现妇女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行动，《错斩崔宁》和《碾玉观音》就是这两方面的代表作。

宋代话本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开端。到了明、清两代，又演进成章回小说，并产生了许多伟大的著作，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红楼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发展的最高峰。“五四”以后，西方小说创作方法传入，同中国传统结合，形成了新小说。有学者说：“从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到小说正式诞生的唐代，经历了千余年；从唐传奇到章回小说，经历了四五百年；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经历了约二百年；从《红楼梦》到‘五四’经历了百余年……从这历程看，小说的发展，从一个阶段到下一阶段之间的间隔，越到后世时间越短。”^⑥这一论断是符合中国小说发展实际的，但没有揭示出这种现象的原因。现在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社会前进的步伐日快，外来文化影响增多，小说在面向社会现实以后自身影响的扩大等各方面的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同中国小说的诞生相比，西方小说的诞生差不多要晚四五百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小说的出现，都是与商业文化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分不开的。文艺复兴标志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萌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人文主义者主张一切以“人”为本，来反对神的权威。“中世纪把思想体系的一切其他形式……都合并于神学以内”，^⑦资产阶级为了反对教会，就要肯定现世生活，肯定人的价值和权利，要求个性解放，提倡平等。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新文学也是以人文主义为思想内容的。这种文学是欧洲资产阶级文学的开端，注重反映现实，艺术上抛弃了中古的象征的梦幻文学，用写实手法发扬和丰富了欧洲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为近代欧洲文学的各种体裁奠定了基础。欧洲早期具有近代特点的短篇小说，围绕一个或几个主人公的经历展开，并以广阔的现实社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都是这时候出现的。

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在欧洲开了近代短篇小说的先河。《十日谈》那十个青年男女讲的一百个故事，有不少取材于中古的民间故事，通过这些故事，作者揭露了贵族的罪恶和教会的腐化，否定了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观和禁欲主义道德观，表现出文艺复兴初期的民主倾向。艺术上它发展了中古的短篇故事，不仅叙述事件，还塑造人物，对现实作生动的描摹和概括；重视结构技巧，用框形结构把一百个故事镶嵌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用散文写作，语言丰富，文笔精炼优美。《十日谈》对欧洲后来的小说影响很大。此后，意大利短篇小说风行，许多小说家都继承薄伽丘的传统，写出了反映现实的作品。

文艺复兴时期最早出现的一部长篇小说，是法国拉伯雷写的《巨人传》。16世纪的法国，骑士阶层衰落了，骑士传奇已不受欢迎，人们从听故事转为读故事，散文故事和小说应运而生。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巨人传》，就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作者以赞赏的态度描写巨人的享乐的人生观，嘲讽禁欲主义，揭露宗教迷信如何妨碍社会的发展。这“巨人”是人文主义者拉伯雷理想的化身。小说共五部，结构并不严密，人物塑造未脱类型化的影响，明显有口头文学的痕迹。但这部巨著开创了欧洲通俗小说之路，对后世的作家影响很大。

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产生了流浪汉小说。流浪汉小说是城市发达的产物，它们多描写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代表作是《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简称《小癞子》。小说由主人公小癞子自述他的经历，通过他曲折的流浪史，描写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物，讽刺、揭露僧侣的欺骗、贵族的空虚、西班牙社会的腐败。叙述生动自然，语言简洁流畅，作为当时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小癞子》问世后，被译成各国文字，模仿它的作品不胜枚举。SSOKC L. RUBCIW在他著的《英国小说发展史》中说：“这种流浪汉文学就是文艺复兴初期那狂放的言论走入近代小说的一条大路。”⑥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最有成就的小说，是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如果说《小癞子》一类流浪汉小说是对骑士传奇的间接攻击，那么，《唐·吉珂德》则是从正面毁灭“传奇全部有害的荒谬”。⑦小说故意模拟骑士传奇，通过写唐·吉珂德扮演游侠骑士，结果闹出无数荒唐可笑的事情，辛辣地讽刺、抨击了骑士制度和骑士传奇。由于塞万提斯在小说中对人物刻划的成功，唐·吉珂德成为欧洲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一个著名的典型。这一成功，又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是英国文艺复兴的繁荣期。这时期的小说创作，主要继承中世纪骑士传奇和韵文故事的传统，其中最出色的是锡德尼的《阿刻底亚》。还有一种是反映流浪汉生活和经历的，如纳施的《不幸的旅客》和狄罗尼的《纽伯利的热克》，后者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先声。17世纪中叶以后，约翰·班扬的寓意小说《天路历程》，也相当有影响，它通过一系列寓意形象反映现实，采用人民口语，语言生动有力，情节和人物也比较鲜活。

18世纪是欧洲的启蒙运动时期，在文学中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启蒙文学和英国现实主义小说，而18世纪英国文学最主要的贡献也是小说。这个时期的小说主要是现实主义的。它继承了流浪汉小说的传统，面向现实生活，反映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社会问题。笛福、斯威夫特、理查生、菲尔丁、斯摩莱特等是这个时期最有成就的小说家。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是以第一人称写的长篇小说，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这部作品的成功，使笛福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运用了象征影射、直接谴责、反语、夸张、对比等手法，讽刺、

抨击了英国的政治和殖民主义。理查生的《帕美拉》以书信体写成，小说突破了以主人公的经历作为主要线索的传统写法，从日常生活中提炼情节，在描写人物行动时注意分析描写人物情感和心理，能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18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菲尔丁的代表作《汤姆·琼斯》，通过弃儿汤姆·琼斯同乡绅女儿苏非亚的恋爱故事，展开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真实的人生图画。全书创造了40多个人物，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层。18世纪出现的这些小说，已不再是脱离现实的虚构的故事，而是从现实生活取材，以普通人为主人公，小说语言一般是日常生活用语，情节结构虽未能完全摆脱流浪汉小说的影响，但已注意集中和概括，重视艺术的真实性，塑造了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而且为后世提供用自传、日记体和书信体创作小说的成功经验。所有这些，标志着西方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8世纪以后，小说的河流日益开阔，到19世纪获得了更蓬勃的发展，出现了大批的名家名作，汇成无法阻挡的巨大洪流。

比较中西小说的渊源和形成过程，可以得出下列的结论：1、小说本质上是一种市民文学。中西小说的出现，都与城市建立、市民聚集、市民文化兴起密切相关。2、中西小说的形成，都是综合了神话传说、纪实文学、寓言故事等文体的特征发展而成的。3、中西小说的前期，多是叙述神怪、荒诞不经的事，后来才写人世间的事，进而经历了一个由事及人到写人做事的过程。关于“事”的叙述，在中国主要出于史传，在西方主要出于史诗。而“人”的描述，中国是出于志人小说，西方是出于世态散文。在人和事的叙述上，西方还有一个从韵文到散文的转变。4、中西小说在形成过程中，都是从无意识虚构到有意识虚构。立足于现实生活的虚构情节的出现，是小说形成的一个标志。5、传奇在中西小说的形成和发展中有特殊的意义。但西方的传奇是“神话的”，是叙事文学中超现实想象的一个分支，它在西方小说形成过程的作用在于：拓展了有意识的艺术虚构，使叙述的“事”具有了情节的性质。中国的传奇是现实的，当中虽也有不少怪异的事，但都是作者用以体现、说明人生的。

① 《少室山房笔丛·三坟补遗》下。

② 《少室山房笔丛》两部《九流绪论下》。

③ 《中国小说史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7页。

④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

⑤ 《中国小说史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5页。

⑥ 徐君慧：《古典小说漫话》，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9页。

⑦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6页。

⑧ 《英国小说发展史》，五洲出版社1969年版，第12页。

⑨ 塞万提斯：《唐·吉珂德》自序。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责任编辑：陶原珂

论广东文学作品中的“南腔北调”现象

罗康宁 叶国泉

一、“南腔北调”的形成

“南腔北调”是双语现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反映。广东作家绝大多数操双语，其母语是本地方言，普通话只是后学的，因此，他们运用普通话进行文学创作，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包涵自身地域文化心理特点的母语影响。

广东方言，包括粤语、客语、潮语在内，都是特定历史、地理以及文化诸因素的产物。例如粤语，历史上虽然也是汉族移民从中原带来岭南的，但当它流行开来之后，新的环境、新的事物便给它带来了新的成分，同时也淘汰了原来语言中不适用的成分，使之与中原地区的语言产生差异，从而形成自己的地域特色。从“五胡乱华”起，中原地区受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达270多年之久，其汉语也就受北方游牧民族语言的影响，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粤语和中原汉语的距离就进一步拉开。今天，粤语中有不少词语，集中反映了这个地区人们在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人伦关系等方面的心理特点，所有这些，用普通话是很难替代的。例如，杨羽仪的散文《水乡茶居》就这样谈到粤语“叹”字的地方特色：

水乡人饮茶，又叫“叹”茶。那个“叹”字，是很有学问的。

“叹”茶的“叹”字，我以为是享受的意思。不论“叹”早茶或晚茶，水乡人都把它作为一种享受。他们一天辛勤劳作，各自在为新生活奔忙，带着一天的劳累和溽热，有暇“叹”一盅茶，去去心火，便是紧张生活的一种缓冲。我认为“叹”茶的兴味，未必比酒淡些，它也可以达到“醺醺而不醉”的境界。

一个“叹”字竟引出这么多联想，可见这方言词所蕴含的文化心理特点何等丰富。如果改为“饮”或者“喝”，这种文化心理特点也就荡然无存了。张承志说得好：“无论是书面语（包括文学语言）或是口语，一旦在它们表达着使用者和使用民族和心境、情绪、特定意识、弦外之音、独有的生活、基于传统和文化的只可意会的心理素质的时候，它们就是很难甚至是不可翻译的。”（《美文的沙漠》）语言与语言之间如此，方言与方言之间同样如此。

广东作家夹用方言进行创作，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古代言文严格分开，也就谈不上运用方言。从“五四”时代起，白话文登上大雅之堂，并取代了文言文，这样，就遇到如何对待方言的问题了。30年代，广东有些作家提倡“粤语文学”。当时欧阳山主编的《广州文艺》就明确宣布：“尽量用广州话中劳动人民大众底语言来创作”。欧阳山本人就创作了好些用广州话写的小说，如短篇《跛老鼠》，中篇《单眼虎》等。在《生的烦扰·序》中，他提出：“在文学方面，我们要求建立中国的多元性的方言土语文学。”这一主张虽有偏颇之处，却将方言与人民大众口头语统一起来，比后来有些人提倡“人民的语汇”，却反

对运用方言的自相矛盾的观点，要高明得多。这种“粤语文学”，其实是带有汉民族共同语因素的粤语，即初具“南腔北调”形式的粤语。

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之后，我国所制订的一系列语言政策，都是围绕“规范化”这条道路而进行的。应当肯定，这些政策对我国语言尤其是汉语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但是，在一个时期有些人片面强调标准语，将普通话看作一种不带任何方言成分的纯之又纯的系统，这就严重束缚了普通话自身的发展，尤其是严重束缚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地方特色。可喜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欧阳山等一批广东作家仍坚持在文学作品中适当运用方言。1962年，欧阳山在与《新闻业务》记者的谈话中，明确地提出“古今中外法，东西南北调”的主张。他说：“如果一种文学语言任何地方成分都没有，那就会显得很空泛、很一般，事实上这也是不大可能的。”黄伟宗《欧阳山创作论》中阐释道：“所谓‘东西南北’，实际上是为了要求民族性与地方性的辩证统一，是既以普通话为实体，又突破这实体而吸收各地方言；既吸收各地方言的实体，又超越每种方言的实体。”“它的内涵和实质是实体性与超越性的辩证统一。”这种观点，比起30年代提出的“建立中国的多元性的方言土语文学”无疑是个飞跃，反映了广东作家在方言的运用上已经摆脱了盲目性。

1981年，广东文坛已经进入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吴有恒在《羊城晚报》发表的《应有个岭南文派》一文，则提出了“南腔北调”的主张。他说：“广东人讲官话，非其所长，我宁可避其短。然而，也不仅仅是为了避短。我们有责任把我们这地方语言中的精采的东西介绍给全国。”“汉语是集纳东南西北各种方言逐渐形成的。……广东作家应努力以广东式的普通话来写作，力求保留地方语言的特色，而又力求使北方人也看得懂。”这种主张一提出，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运用方言的问题，成为广东文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许多中青年作家，还以其创造性的实践使作品的语言产生了新的突破，例如杨干华的《天堂众生录》、《天堂挣扎录》等小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理论和实践，标志着广东作家在语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二、“南腔北调”的三种形式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南腔北调”属于一种艺术变异现象，是作家出自塑造艺术形象的需要而对语言常规的突破。

文学语言是作家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其主要功能不在于告知而在于“感知”，因此，作家多半不囿于语言常规，而适当地运用变异的艺术符号，以寄寓自己的情感，启发和激活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使读者从中领会到“言外之意”，“南腔北调”就是艺术变异的一种方法。由于广东文学作品的语言基本上以普通话为主体，在普通话中杂糅方言形成南腔北调其中包涵浓厚的地方文化心理特点的方言词语或句子，便使其他地区读者感到陌生与新奇。对于本省读者，这种包涵浓厚地方文化心理特点的方言成分则可以引起他们特殊的亲切感。

“南腔北调”在形式上丰富多彩、不拘一格。笔者试归纳出三种，逐一加以分析。

（一）炼话式

“炼话”一语出自鲁迅先生的《门外文谈》：“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津津有味。”

“炼话”就是选用方言中经过反复锤炼的精采的词语、熟语以至谚语。例如：

这八个少年，一直在附近的横街窄巷游逛卖懒，谈谈笑笑，越走越带劲儿。年纪最小的是区卓跟何守礼，一个十一岁，一个才八岁，他们一路走一路唱：“卖懒，卖懒，卖到年三十晚，人懒我不懒！”（欧阳山：《三家巷》）

“卖懒”是广州市井的一种习俗，这一词语很难用普通话中任何一个词语来替代，勉强替代了，其内涵也就荡然无存。作者将这一方言词汇用于此，前面加上个“游逛”，北方人虽然一时不十分明了，也不至于摸不着头脑。这样就恰到好处，可以引起读者的注目和联想。后面那首充满地方特色的《卖懒歌》，更为有声有色。八个少年的情态，跃然纸上。

“老弟，别傻乎乎的。喝酒吧！我刚来城里时也扮演过你这种傻乎乎的角色，后来学精了，也就慢慢混出来了。进了城要学着当精仔，不要当乡巴佬。虽然这城里的人原来大多数都是乡巴佬，可是绝对瞧不起乡巴佬。要在这城里站住脚。就得赶快屙净你的蕃薯屎。懂吗？废话少说。”（纵雯、陈国凯：《都市的黄昏》）

广东农村尤其是山区，在过去很长一段岁月，大米缺少，靠蕃薯（白薯）充饥，因此，吃蕃薯还是吃饭成了区别农民和市民的标志。“屙蕃薯屎”这个熟语表现了鄙视农民的心理。作者通过这一熟语，将吕大光和李少华从农村跑到都市时为摆脱“乡巴佬”身份而不择手段的那种特殊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几个方言词的运用，使整个语段充满浓厚的地方生活气息。

（二）融会式

“融会式”就是将方言成分融进普通话中，使作品的语言成为一种“地方普通话”。

陈恩泉《论双语制语境下普通话的两个模式》一文指出：“汉语各方言的特有成分不断地渗透到普通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中来，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地方普通话。”“虽然地方普通话与普通话相比较，无论在词汇或语法，尤其是语音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南腔北调，但仍保存着普通话的基本结构，并不失去作为汉语各方言区人们之间进行交际的主要语言手段的作用。”这种“地方普通话”在广东人日常语言交际中用得最为普遍，作家将它加以提炼，用于文学作品，便形成融会式的南腔北调现象。

吴有恒在谈到自己创作的体会时说：“我的习惯是：措词用名，先用广东话构思，然后译成用普通话读得通的文字，必要时，宁可用文言文的字眼搭成之。”（《应有个岭南文派》）然而，他在“译成用普通话读得通的文字”过程中，有意保留一些广东话的词语和句式，又不露斧凿痕迹。例如在他的《北山记》中：“我就喜欢你这种有碗数碗有碟数碟的人。”《山乡风云录》中：“你恶极也只能杀了我。”等等。前例融进了粤语词汇，后例融进了粤语句法，但北方人读起来并不感到别扭，广东人读起来则倍感亲切。再看《山乡风云录》一段歌谣：

山稔子，开红花；双成姐，会织麻。织麻拜七姐，坐轿去娘家。七担油糍三担果，一盒槟榔一盒茶。行到石桥下，落轿骑白马。驳壳枪，两边挂。捉住番鬼子，打马转回家。……

这首歌用具有浓郁粤味的普通话写成，广东人读起来亲切，北方人读起来也明白，其作用与上述《三家巷》中那首为渲染气氛的《卖懒歌》有些不同。

刘西鸿作品中那种带有浓重都市气息的地方普通话亦令人耳目一新。试举其成名作《你不可改变我》中一段：

我看亦东吃橙子，满手滴着汁，就说：“他有个东洋名，叫食野太狼。”我指指我

自己，“我叫中意银纸，或者中意金戒子。”

虽然“食野太狼”和“中意银纸”这两个外号只有懂粤语的才懂得其隐含意，但不会给异地读者带来太大障碍。这种融青年人语气和南方都市语汇为一体的南腔北调，使小说充满了南方都市生活情趣和现代生活的美感。

（三）调侃式

调侃作为一种语言表现方式，古已有之；它的兴起，则是80年代以来的事。过去，封闭的社会造就了严格规范的生活，也造就了严格规范的语言；当这种封闭被打破，调侃也就应运而生。

在广东作家中，最善于运用调侃这种语言表现形式的，当推杨干华。在《天堂众生录》与《天堂挣扎录》中，方言土语已经不再仅仅是表现乡土气息和地方风味的手段了，它们的指称功能已几乎完全隐退，变成地道的艺术符号。它们和那些同样是作为艺术符号的各种语汇，包括貌似庄严实则荒唐的极左政治术语，当棍子使用的“语录”及诗词，经过巧妙地斩头去尾甚至改装得不伦不类的古语，等等，以超常组合方式杂汇在一起，形成一种悲喜交融的独特美学品格。试举《天堂众生录》楔子中一段：

到了公元一九五八年，有不少志士仁人宣言向天堂挺进！挺进！再挺进！他们一个个踌躇满志，道德伟大，文章标青，不说才储八斗，学富五车，也是非常的精通革命，熟稔建设。他们指出，你们的祖先寻找天堂几千年，没有寻找到，是有一个科学的主义，而是葬坟山，讲风水，其愚昧也如此，荒唐也如此，可悲也如此。现在呢，我们是讲革命，讲斗争，最科学，最可靠。这样的精辟达理，天堂人谁不开了眼界，听出耳油？而且，跟着就宣布天堂实际已经建成，革命的三面红旗比愚昧的铁拐杖真是神通得多。比风光雷火还快的速度，使天堂人来不及多想，就捧起了饭碗，领上了工资，在山顶上唱歌，在梯田里跳舞，一派的娱乐升平和满地的莺歌燕舞。也是来不及多想，谁也没说现在还不是天堂，或又郑重声明，天堂的日子暂时结束，仓里便告无米，锅里便告生锈，大锅变成小锅，小锅变了烂铁，人开始消瘦，发肿，一夜天光四脚八直。

这是一段十分出色的调侃式语言，也是一段十分出色的南腔北调式语言。作者巧妙地穿插运用一些方言词语，有效地增加了调侃的效果。例如，形容那些“仁人志士”的文章，作者用了个粤语词“标青”，显得似乎有点不协调，然而，这种超常组合跟上面的“道德伟大”联系在一起，便使读者从中体会到一种强烈的讽刺。“听出耳油”也是如此，看似赞赏，实则挖苦。用“一夜天光四脚八直”来表现“死去”，则是在俏皮中蕴含着一腔辛酸。总之，作者以娓娓道来并尽情渲染的笔墨，为我们勾勒了一出荒唐可笑的闹剧。

再从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举一例子：

这委实是个农民的度假村。当然，你很难从衣饰上判断哪个是“大乡里”，哪个是“大城里”，因为农民的服饰不但十分“光辉”，而且一改过去大红大绿的常态，讲究起衣料的柔细、软滑，色彩的明艳、和谐。（杨羽仪《情满白藤湖》）

“大乡里”是粤语区人对乡下人的一种蔑称，但作者用于此，并没有轻蔑的意味，它跟后面那个超常改装的临时词语“大城里”相对应，给人以轻松的感觉，表现了80年代珠江三角洲农民的特殊心态。

当然，将“南腔北调”分为上述三种，只是实验室里的剥离，在具体作品中往往是合二

为一甚至合三为一的，很难严格分开，并且未必限于上述三种。

三、“南腔北调”与语言研究

“南腔北调”是广东作家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运用语言的成功路子，它对建立具有广东地方特色的岭南文派，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然而，广东作家运用语言在规范化问题上的突破，并没有受到语言学界应有的重视。由于结构语言学将语言看作一种不含社会属性的静态的符号系统，而将含有社会属性的动态的语言现象称作“言语”并排斥于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外，研究者从这种符号系统中找出规范，又用这套规范来分析其符号系统，其结果是导致语言学与社会分离。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为其追求目标的作家们创造的被公认为一流的语言，却在语言学研究中受到冷遇。即使有所涉及，也只限于其中合乎语言学家所制定的规范那一部分，而对其中突破规范的千姿百态的语言变异现象，则视为“例外”，甚至斥之为“污染”。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界只好提出“超越语言”这一概念。钱钟书说：“在常语为‘文理’欠‘通’或‘不妥不适’者，在诗文则为‘奇妙’而‘通’或‘妥适’之至。”（《谈艺录》）杨干华也有类似的体会：文学语言，“妙在通与不通之间。”试问：如果作家笔下的一流语言在语言学的“规范”看来属于“不通”，这种“规范”又有多少价值可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语言成功与否的标准决不在于是否合乎“规范”，而在于是否得到读者的认可和喜爱。

语言学这种自我封闭的做法，也使某些人在推普中将普通话看成一个封闭的符号系统，看成不带任何方言成分的“纯之又纯”的人工语言。本来，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它是在汉语各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人为地靠政策制造出来的。普通话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必须不断吸收汉语各方言的精华来丰富、发展自己。日本语言学家藤原与一在《方言学之原理》一书中指出，应当“把人类方言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作为生活文化、语言文化来加以掌握。”我们也认为，所有的汉语方言，包括北方方言和南方各方言，也都应视为“生活语”，视为人民群众的口语，它们所包含的文化心理特点都应当受到重视。如何将这些包含文化心理特点的方言运用于文学创作，自然也应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事实上，在文学创作中运用方言，早已成为北方作家的共识。例如老舍文学作品语言中的“京味”，赵树理等山西作家笔下语言中的“晋味”，都是众所周知的，也是世所公认的。只不过在文学评论中被称作“人民的语汇”，而并不称为“方言成分”罢了。南方尤其是广东作家如果运用当地人民的生活语，则被视为“不规范”、“不纯洁”，这是不公平的。这种在语言运用上的倾斜，严重地扼杀了广东作家的创作个性，使不少广东作家在语言上或追求“纯洁”，或邯郸学步，使其作品中的人物或开口政治报告，说话犹如公文；或脸在南方，说话腔调却是北方的。当然，由于广东各方言与普通话差异较大，广东作家在方言的运用上应比北方作家谨慎，应有所选择。正因为这样，对广东文学作品在语言运用上的可喜的突破，广东语言学界理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并给予认真的研究。

作者单位：广东人民政府参事室

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试释《文赋》“怀霜”“临云”

吴承学

陆机《文赋》开篇有一段著名的话，谈到作者在创作之前的准备：“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认为作文之由，总归两途：一感于物，一本于学。下文紧接着就说：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授笔，聊宣之乎斯文。

此数语即是就上文“玄览”“典坟”二端分别铺陈而言的。其中“遵四时以叹逝”至“喜柔条于芳春”明显就是上文“伫中区以玄览”的演绎；自“咏世德之骏烈”至“嘉丽藻之彬彬”无疑是“颐情志于典坟”的细写。这是历来学者的共识。

问题在于“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的含义属不属于“伫中区而玄览”的内容？

据张少康《文赋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收集的资料来看，历来学者对“怀霜”“临云”二句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基本上沿用了李善的注解：“懔懔，危惧貌；眇眇，高远貌。怀霜临云，言高洁也。”认为意指作者应具“高洁”的志向。为了论证这种解释，李善还引用了孔融《荐祢衡表》“志怀霜雪”和《舞赋》“气若浮云，志若秋霜”二语。何焯则说这两句说的是“文章之本”。方廷珪也说：“怀霜，心之洁；临云，志之高。心志无杂虑，方能尽读书之趣。”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对此的解释大致相同：“怀霜、临云，喻心志之高洁，心志高洁则文品愈高洁。”此书还明确地提出，“遵四时”四句就感物言，“咏世德”四句从“颐情志于典坟”生义，二者皆能引起文思，故中间用“心懔懔以怀霜”二句以贯串之。《文赋集释》总结道：“陆机在这里是强调创作之前，作家应当有高尚的情操与远大的志向。”

窃以为，“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二语其实与上文“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二句应是连贯一气的，均演绎“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一语：上二句言春、秋二时之感，此二句言冬、夏两季之情，并非强调作家的情操与志向。其含义有必要从具体的文体形式去理解。赋体表现方式的特点是铺张陈述，写法往往是连类排比、纵横交错；面面俱到地描写各个方面的事物和事物的各个方面；描写事物发展的进程和进程中的每个层面，以充足文章的气势。其铺叙方法，往往一落笔就是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上下内外、远近高低、四面八方分门别类纷迭而来，“斯于千态万状，层层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赋概》）《文赋》此处既点明是“遵四时而叹逝”，下面描写季节景物理应各就春夏秋冬“四时”铺陈下来。假如写“四时叹逝”只写春秋二季，当然也无可厚非，（以“春秋”代全年，在古代诗文并非罕见。）但却没有“用足”赋体“吐无不畅，畅无或竭”的表现方式。其实，魏晋南北朝就有专门铺写四季景物及它们给人感受的赋。比如江淹的《四时赋》就是通过四季的变化，“测代序而饶感，知四时之足伤。”（《全梁文》卷三十三）李颀亦

有《悲四时赋》。（《艺文类聚》卷三）受其影响，其它文体如诗歌也出现了这类四季歌，如顾恺之的《神情诗》：“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寒松。”（《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四）

四季变化引起人们不同的感情和创作冲动，这是六朝文论家的普遍见解。《文心雕龙·物色》：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刘勰这段话与陆机的话意思是相同的，行文方式也相近，也是对一年四季的铺陈。看来，刘勰此语是以陆机的话为蓝本的。钟嵘《诗品序》亦云：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有类于此，陆机上文“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应是总写，以下四句分写四时景物给人的不同感受，刘勰、钟嵘可作旁证。陆机上文从句式来看，前二句与后二句不同，但其内在的模式却是大同小异，都是有季节代表性的景物引起特定的感情：落叶——悲；柔条——喜；霜雪——凛凛；云峰——眇眇。不同之处是前二句明确而直接出现“劲秋”、“芳春”二季节的名称，而后二句则只出现有季节特征的景物。“怀霜”是说在冬天，面对霜雪使人心怀危惧、意气肃然，此即刘勰“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之意；“临云”是说在夏天对着云峰使人意志高远。而“霜”与“云”则分别借代冬夏。霜，即是霜雪。傅玄《大寒赋》：“若乃天地凜冽，庶极气否。严霜夜结，悲风昼起。飞雪山积，萧条万里。”就是以“严霜”和“飞雪”作为冬季最有代表性的景物来写的。至于“云”的借代义，六朝的大量文献资料亦反映，当时不少文人的确是把“云”作为夏季最有特征的景物之一。如：

顾恺之的《神情诗》分叙四时景物，以“夏云”“春水”“秋月”“冬岭”相提并论。

钟嵘《诗品序》写“四候之感诸诗者”，以“夏云暑雨”作为夏季的代表性景物，也特地拈出“云”来。

江淹的《四时赋》则说：“至若炎云峰起，芳树未移，皋兰生坂，朱荷出池。”亦把“云”放到夏天景色之首。

李颀《悲四时赋》写夏天也说：“云郁律以泉涌，雨淋漓而方簴。”

我想这些材料已足以说明问题了。夏季天气多变，夏云变幻莫测，使人产生“眇眇”即高远的感觉是很自然的。此外，陆机用“云”来借代夏天，除了上述因素外，恐怕也有写作上的原因：“上文已用了‘坟’‘纷’‘春’数字，这里用一个‘云’字押韵正合适。

以上所陈，仅为读书时的献疑臆解，不敢自是，本之“疑义相与析”的心愿，谨以此求教于方家和广大读者。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当代编辑主体的创造意识

张建平

编辑的创造性,从一般意义上说,是不成疑义的。当代新闻出版业的急剧发展和演变,编辑观念的更新,开始越来越明显地表明,编辑作为新闻出版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其地位和作用已开始发生明显的改变。这一改变的基本趋向是,编辑主体地位和编辑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化,编辑创造在整个新闻出版创造活动之中,由局部环节上升为基本的决定要素。众所周知,激烈的新闻出版竞争中,制胜的根本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数量的竞争,而且是信息、信息载体和信息效应的综合的竞争,也是数量与质量一体化的竞争。结果必然是,从新闻出版的价值取向到策划、创意、风格、效应等构成报刊的诸多要素之中,编辑的作用开始成为中心,编辑的“身影”(个性、特质)已从文字底层“浮”现出来,成为报刊时代风格与个性的首要标志。过去那种“删削润饰、剪裁取舍”式的工匠式编辑程式不再是衡量和判定编辑水平的主要标尺,策划和创造作为当代编辑的关键性素质,如同艺术一般,使编辑的价值和地位达到了另一种境界。

当代编辑的创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总体的策划和设计。

一个报刊,在它尚孕育腹中的时候,编辑的创造已经开始。当代的实践表明,当人们把报刊视为一件综合性的完美的精神产品来制作而不是仅看作一种单纯的载体的时候,编辑的创造构想必须超前,正如一座大厦先要蓝图,一个产品先要设计稿一样。一种报刊在创办之前,它的创办宗旨、目标追求、基本风格以及市场定位,已经鲜明地反映出编辑者的全部创造和追求。近十年来,许多新兴的报纸、刊物,在它诞生的第一天,就体现出一种新的创意和追求。如,一炮而红的期刊《南风窗》,是标榜着观念变革更新的旗帜而问世的,那句深入人心的刊首语——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已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和价值追求的格言,成了刊物全部创造和追求的灵魂。又如,80年代中期间世的报纸《现代人报》,也是以“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根本”这一全新的创意走进报林,并较快地以独特新颖的编辑主体风格在当时的读者群中形成共鸣的。毫无疑义,强调主体性,是一种现代文化的主流,不论是文艺,还是新闻出版。而这种主体性,首先是主体的创新性,在报刊出版中,就是编辑主体的创造性。《广州日报》的改版和扩版,在全国是较早也是较为成功的一例。它的这一改革,并不仅仅在于版面和信息的扩充,而在于办报观念和价值追求的创新。《南方周末》作为党报改革的一种大胆的尝试,它的一举成功也导源于编辑者对现代生活和现代读者口味、需求的超前判断,和对报业发展的未来趋向的准确把握之中找到的创新的座标。所以,有否一种整体性、超前性、独特性的创意和创新追求,成了新一代编辑的基本的素质要求。世界广告趋势表

明，创意是成功之本。这句话，也可以用于报刊和它的编辑者，一个不能创造在前的编辑，不可能在报刊活动中唱出动人的旋律。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代编辑的创造性，首先体现在对报刊出版的总体设计、策划之中，办报刊的宗旨必须同时也是编辑的创意，只有这样，报刊才能真正获得个性。

二、价值的发掘与升华。

一般来说，编辑比记者或作者更了解面上的情况，对一定时期方针政策和中心工作以及对广大读者群的需要也比记者或作者把握得准一些，因此，对稿件价值的判断会比较准确。编辑既可以从大量稿件中筛选出价值较高的稿件，也可以在稿件中某些有价值的内容被一大堆次要的材料淹没时，通过创造性劳动，将其突出出来。这种创造性的劳动，是决定稿件成为作品的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从报刊生产的全过程来看，尽管稿件对记者来说是“成品”，而对编辑来说却是“原料”。编辑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将这些“原料”加工成有价值或价值较高的“成品”，这是对原作品的一种增值性的创造。有的稿件虽有一定的价值，但表达的方式（如视角、形式、方法等）运用不当；有的稿件写作时机选择得不好；有的稿件枝蔓太多，主题反被淡化；有的稿件文笔不顺，写作枯燥，等等，这就使原稿的价值体现不出来。编辑的工作就是要消除这些缺点，不仅去其糟粕，存其精华，而且将有价值的材料升华，使得稿件的价值大增，有的甚至可以从“死稿”变成了好稿、重点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编辑对稿件标题的处理，是一种最具增值性的创造工作。所谓“看报看标题”，标题是文章的“眼睛”。题文一致、一语破的、简洁明快、旗帜鲜明、生动活泼，是标题制作的基本要求。编辑制作标题，往往费尽脑汁突出稿件最新颖的、最重要的、最有特点的、最本质的事实，用最精炼的语言表达，达到最具吸引力和“诱惑”力。有创造力的编辑手里产生的标题，本身可能就是一篇很好的“袖珍作品”。标题制作得好，可使稿件熠熠生辉，对读者产生强烈的吸引力。这方面，《羊城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等报纸的实践，就很有特色。其中《羊城晚报》把标题制作（创作）作为编辑的重要任务，刻意追求标题的鲜明性、新颖性和艺术性，其所收到的新闻效果，已远远超出了标题范围，成为整个报纸编辑风格创造的一大特色。

在我们谈到编辑的创造性在新闻的价值发掘与升华中体现时，应该看到，当代编辑主体的参与与介入，不仅体现在新闻价值的发现和“加工”过程，而且日益明显地体现在报刊出版的全过程，包括从采编方针的确定到稿件的判断选择、技术的处理到版面布局的建构等一系列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并且主导着全过程。诚然，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这是永恒的真理。编辑的主体性，或者主观参与介入，不可能也不应当是脱离生活真实和新闻客观性的。相反，越是强化主体的创造性，越是与深层的真实性、客观性的发掘与把握交融在一起。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报道开始摆脱浅层次的事实罗列，而采取了一种多视角、全方位或者与采访写作者的主观评述交融的写作方式时，我们或许开始隐隐约约地感到，这已不仅仅是报道，同时也是创作。当然，这不是艺术创作，而是对新闻真实的本质的发掘或拓展之中的创作；也不仅是采访观念和方式的变更，同时也是编辑观念的变更在采访中的折射。越来越多的编辑，开始在确定选题和采访意向、选稿要求中，不知不觉地按照时

代的要求，依从读者扩大、升级了的需要，在新的层次和视角上来反思以往的许多既定的编辑职责和规范。一个有挑战性、创造性的编辑，首先必须积极介入和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前沿和深处，就像一个引导者举着火把，引导记者、作者或与他们一道去捕捉新闻中的亮色。编同采的高度交融已使编辑从单一狭小的“文字匠”角色中解脱出来，成为手持多棱镜、多方位把握社会生活的艺术师。这是编辑在发掘与升华新闻价值中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创造性劳动。

三、现代风格和形式美的创造。

编辑的创造性，体现在报刊的版面上，就是对形式上风格上的美的追求。编辑编排版面，不是多篇稿件的随便拼凑，而是按照编排思想，赋予它们相应的表现形式。这种编排思想是办报办刊的指导思想和某时期的报道思想在版面上的具体体现。编辑在版面上的创造性，首先表现在编排思想上。譬如，随着报刊读者阅读水平的提高，以往那种说教式的对政策图解式的报道已令读者生厌，而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引起群众越来越多的关注。当代编辑把握住这一生活的脉搏，独创性地运用各种编排手段，反映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使这些问题能够通过版面的重处理给读者以深刻印象。这亦是编辑群众观点在版面上的体现。

编辑在版面上的创造性，还表现在编排方法上。编辑在安排版面时，需要对整个版面全盘考虑，考虑如何安排重要稿件与次要稿件，长稿件与短稿件，将稿件加以集纳；调整长短大小、题文关系；配发图片、资料 and 进行美术处理等等。这些手法的运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的劳动，它要求编辑尽可能以适当的、新颖美观的形式来体现编排思想。整个版面稿件的通读过程，实际上就是版面的设计构思过程，整个版面的构思过程，实际上就是编辑在版面上的创造性的发挥过程，这种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就是内容与形式相一致的新颖、大方、美观的版面。现在，不少追求现代风格的报刊编辑，正在摒弃以前那种四平八稳的版面风格，而追求轻重反差大，给人以较强的视觉刺激的版式。《粤港信息日报》小文章配大标题，图片说明用深网白字的重处理来突出版面的强势。《北京青年报》则用大至四栏，甚至六栏的照片，来抢读者眼目。至于有些社会生活报刊，也在版面上以大板块、粗线条、大图片来表现新的节奏和意念，突出时代潮流和现代美。这些版式是编辑现代审美意识的无声流露，它赋予版面以浓厚的现代美的色彩，编辑的主体创造性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编辑的创造性在报刊总体工作中应该起到决定作用。没有创造意识的编辑，便无法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刻意地追求编辑的创造性，是当代编辑观念更新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代报刊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也可以视为是一种编辑主体决定论。90年代，中国的报刊业已群雄并起，摆开了决战的阵势，没有主动自觉的创意，没有一群具备强烈创造意识和表现欲望的编辑群体，那种百家争鸣、千姿万态的报业繁荣局面是不可能形成和存在的。

作者单位：南方日报社
责任编辑：石 成

深圳“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研讨会”述要

1994年1月26日至28日，纪念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两周年暨“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深圳举行。研讨会是由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广东省社科联和深圳市委共同发起的。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专家学者、企业界新闻界人士与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到会祝贺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是贯彻了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对外开放，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就是打破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敞开国门，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人才和资金；对内开放就是抛弃实践已经证明不利于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传统的落后的计划经济模式，放权搞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实际上就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他强调指出，今后能否继续坚持这“八字真经”，是能否继续胜利前进，实现第二步以至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

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深入、系统地探讨如何把我国大中型企业变为市场主体，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讨论中有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现代企业制度最突出的特点有五，即产权清晰；财产责任明确；所有权分解；企业无上级，或说政企分开；实行公司制度，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制，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形式。

另一种观点是，从日本股份制企业的情况来看，现代企业制度至少有四大特点：股东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法人股东持股率高；个人股权分散；企业自有资本比重低。这些特点又可从两个层面去把握。其一，经济实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其二，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塑造关键是要形成经济主体的自负盈亏机制。现代企业自负盈亏的机制已不单纯是个人产权问题，实际上，股东与财产蒙受损失之前的那道防线才是自负盈亏机制的核心问题。为此，那种认为必须把产权量化到个人的，试图从个人产权上找到建立自负盈亏新机制的观点，至多只是一种小业主式的自负盈亏观。构建现代企业的自负盈亏机制，必须把侧重点由个人产权调整到“利益防线”的构筑上来，即在确认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前提下调整利益关系，形成一道经营者和职工的“利益防线”。

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是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与会者认为，股份制企业的产权组织特征是最終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的分离，国家掌握大多数的最终所有权，即股份所有权，而企业掌握法人所有权。这样，企业既有法人所有权，又有经营权，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完全独立自主权的企业法人，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在实行股份企业制度后，国家所有制不再是原先那样的国家直接所有制，而是国家股份所有制或国家最终所有制。

也有的同志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从深层次上清理好目前困扰着国有企业改制的三大历史包袱：冗员过多；资金积欠；社会负担太重。

著名学者于光远、马洪、安志文、吴敬琏、刘海藩、杨启先、吴家骏、梁钊、张江明、张元元等出席了会议。

（郑英隆）

广东精神文明学会成立

1993年12月19日，广东精神文明学会成立。成立大会选举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张汉青担任会长，蓝红、张难生、梁渭雄、吴群策、马镇坤、李权时、李辛生、马中柱、余少波、叶汝贤、范英等11人担任副会长。学会邀请一批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知名专家学者郭荣昌、黄华华、杨应彬、黄浩、欧阳德、李兰芳、曾近义、于幼军、钟阳胜、张江明、梁钊、肖如川、张磊、刘嵘、黄蕊华、周圣英、刘陶、关国栋、周无忌，以及一批企业家贝兆汉、程受煜、杨小鹏、伍星河、伍锡辉等担任顾问。香港南源永芳集团公司董事长姚美良先生专程从台湾赶回广州接受大会邀请为顾问。成立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90人，其中团体理事80人，个人理事110人；常务理事会理事26人；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秘书长范英兼任学会秘书长。

广东精神文明学会的成立，对加强我省的精神文明建设研究，推动我省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是一件大事。

张汉青同志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有机组成部分。最近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强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加强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于全书的各个篇章。如何加强对邓小平同志这个战略思想的研究，是摆在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和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同志们的一项重要任务。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和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作为根本的是要抓人的素质建设、着力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或者叫人的现代文明素质；并配合法制建设，抓好法制教育，增强法律意识，使我国成为民主和法制充分健全的国家。如果我省精神文明学会能够在这两个根本问题的建设和研究上尽一份力，做出一份贡献，那么，对于全社会的文明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姚美良先生在大会上致贺词，表示要大力支持省精神文明学会的活动和建设，并决心要使学会在东西方文明的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上搭桥筑路，做出积极贡献。

(冯宁整理)

广东教育哲学研究会成立

由广东省社科联、广东教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师范学院、广东省民主促进会等单位有关人士联合发起成立的广东教育学会教育哲学研究会，经过两年的筹备，已于1993年12月11日于广州正式宣告成立。

广东教育学院院长、哲学教授梁琼芳同志被选为教育哲学研究会首任会长，梁渭雄、孔棣华、郭思乐三位同志为副会长，周峰同志为秘书长。聘请广东教育界老前辈杨子江同志、黎克明教授、李锡槐教授为广东教育哲学研究会顾问。

教育哲学研究会成立后初拟于1994年春夏间在广州举行一次全国教育哲学年会。

(周峰)

第四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在港举行

两年一度的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自198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首届会议，1989年在广州，1991年在澳门接踵举行第二届第三届研讨会后，1993年12月17—19日，又在香港城市理工学院举行了第四届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香港城市理工学院和香港语言学学会共同主办。到会宣读论文的各国（地区）学者近一百人，规模比历届都大。

是次研讨会特邀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华裔学者余德芹教授作主旨演讲。题目是《粤语研究的当前课题》，她在回顾了粤方言研究的历史后，提出粤方言研究最迫切需要考虑的是以下三个问题：①大量搜集粤方言的资料；②对粤方言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③粤方言的历史研究。余教授特别强调方言资料的重要性，她认为象目前这样除了广州话（包括香港）以外，两广地区五、六十个县（市）所说的粤语，大都缺乏语音、词汇、语法全面材料的情况，对于进行粤语的比较研究和粤语的历史研究都是不利的。

出席这次研讨会的广东学者达三十余人，包括高华年、詹伯慧、李新魁、唐启运、陈慧英等知名粤语学者。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宣布下一届（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将于1995年在广东举行。

（柏 葳）

ISSN 1000-7326



9 771000 732000

主办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者: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3345916 邮码:510050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广东佛冈印刷厂

发行者: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 399 信箱

国内统一刊号:CN44-1070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7326

广告经营许可证:粤工商广字 01044 号

邮发代号:46-64 定价:每册 2 元

本刊每逢双月 25 日出版